


# 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 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

[英国] 格雷厄姆·格林 著

恺蒂 译

我的日记从196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共有八百多页，
我从其中选择出了《我自己的世界》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的自传，
以“幸福”始，以“死亡”终，是一个怪人过去三十余年的生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Graham Greene

◆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从隔壁的房间里

电视在与我说话

关于病痛，风疹和草药茶

我的呼吸逐渐虚弱

就像熏衣草中的床单叠起

我的终结

如同儿时的茶点那般到来

**特别收录**

恺蒂：与格林同梦

余斌：遭遇格林

唐诺：入戏的观众



ISBN 978-7-5447-0629-2

9 787544 706292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18.00元

# 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 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恺蒂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英)格林(Greene, G.)著;恺蒂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0
(格雷厄姆·格林作品集)
书名原文: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ISBN 978-7-5447-0629-2

Ⅰ.我… Ⅱ.①格… ②恺… Ⅲ.自传体小说—英国—现代
Ⅳ.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7252号

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by Graham Green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6-298号



书　　名　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
作　　者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恺　蒂
责任编辑　张远帆
原文出版　Viking Penguin, 199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5.625
插　　页　2
字　　数　131千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629-2
定　　价　1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导读 与格林同梦

恺蒂

## (一)为格林加注脚

在现代经典作家中，格林是最杰出之一。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一直到1991年去世，跨度六十年，作品五十多种，涉及小说、戏剧、电影、散文、游记、评论、诗歌各个领域。他又是最为冒险的一个作家，他的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他的作品也就是世界各个角落的重大事件的记录：墨西哥对于天主教徒的清剿[《权力与荣耀》(*Power and Glory*)]，荒原般的西非[《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二战时期的英国[《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医生爸爸”独裁统治下的海地[《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哈瓦那的情报战[《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冷战时期的越南[《沉静的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殖民地时

期的刚果[《精疲力竭的病例》(*A Burnt-Out Case*)],等等。他下笔到哪个大洲，那本书中就肯定充满了那个大洲的浓郁的气味和氛围，例如刚果热带丛林中的那道河流,西非寸草难生的炙热的干燥的土地,墨西哥闷热潮湿的雨季,越南交错着鸦片烟馆和妓院的小巷。

格林著作等身,然而又本本不同,在主题风格和故事上从未有重复之处(不像有的作家,祖母和母亲的故事能反复写无数遍)。格林是在小说布局故事发展和文字修炼上最讲究的一位作家,所有的情节都是环环相扣,每一个场景都经过深思熟虑,写下来的每句话都经过了千锤百炼。他的小说都可以说是密度极强的,对于笔者来说,阅读格林的小说是一种很奇妙的过程,每本都非得读完才能释手,读完之后紧接着想去再拿下一本,然而,拿起下一本来却无法马上就开始读,因为上一本还控制着你的全身心,容不得下一本来打扰,你得等上三天五日甚至是一个星期,才会觉得你刚读过的那本慢慢在你的脑海肠腹中得到了好好的消化,现在,你可以有思索的空间再去读下一本了。

读惯了格林的小说,乍一读格林这本薄薄的《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以下简称《梦之日记》),第一个感觉是惊讶,惊讶于它文字之平淡,结构之稀松,情绪之毫不渲染,惊讶于它竟然如此朴素。小说家格林从故事到情节到语言到所要传达的信息到氛围的营造都是全副武装的,而这本《梦之日记》,呈现给读者的则是一位没有任何文学武装的格林,与那位写尽五大洲的文字大师相比,这位平铺直叙的格林可称是"解甲归梦"了。

然而,不要以为这位平淡的格林真就缴了械,真就不与读者玩

游戏了，他仍然要以他去世之后出版的这本小书来撩拨读者的想象力。在《梦之日记》的自序中，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的自传，是“一个怪人过去三十年的生活”。格林向来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人，他的一生中有很多隐私和秘密，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写过一本完整的自传。所以，这个“自传”当然也不是直截了当的自传，他在里面提到的人和事都是通过“梦”这个渠道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所以，亦真亦假，扑朔迷离，让读者刚刚觉得和他有些接近，随即他又把你推远，让你不得不马上追问一句：“真是这样的吗？”阅读这本书，就如同通过一面镜子看格林，而且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这镜子有时是放大镜，有时是哈哈镜，有时又是毛玻璃镜。让你不停地猜想：这位梦中人究竟有百分之多少是格林真正的自己？又有多少是假装的他，想象的他，他自己创作出来的他？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就一直在想，格林梦中之事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格林梦中之人与他的实际关系究竟怎样？是什么样的境遇和经验让他做了这样一个梦？所以，一边翻译，我也就一边找到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格林的传记和材料，加了许多脚注，做起了填空游戏。所以，译本中的注释除了一条是伊芙·克罗伊塔原注外，其他都是由笔者添加的。

## （二）少年爱梦

梦对格林来说一直非常重要，从性格上来说，格林是那种很敏感、很内向、很重感情、很情绪化的人，他的情绪常常在极度的兴奋和极度的忧郁之间大起大落，从来就没有“中庸”的时候。也许这样

性格的人，梦的磁场也就特别厉害，预测力强，影响力也大。

格林出生于 1904 年，父亲是一所私立中学的校长，在他前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儿时的格林因性格孤僻内向，极度敏感，所以很不合群，他不喜欢去学校上学，父母亲虽然担心他，但是如同当时许多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与他并不很亲近。格林从小就把恐惧和害怕都隐藏在心里。1918 年，还不到十四岁的他被送往圣约翰学校寄宿(他父亲是那里的校长)，对他来说，那是充满创伤的经历，他视之为折磨，他称那里是“一个充满了离奇风俗和不可理喻的残酷的野蛮国度”，而他则是那里的一个“外国人”。他与众不同，不喜欢参加体育活动，所以他成了那些称王称霸的孩子们虐待的对象。他试图以伤害自己来引起父母亲的注意，曾经有过好几次自杀的企图，例如他用小刀割破自己的膝盖，他一口气吞食了二十片阿司匹林，还有一天早上他吃了一大罐烫头发的油，后来他以逃学为反抗的武器，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陷入忧郁症之中。当时，他的二哥雷蒙德正在牛津学习医学，在二哥的建议下，他的父母送他到肯尼思·里奇蒙德那里接受心理治疗，在当时，进行心理分析还是很新鲜的事，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记录他的梦的日记。

里奇蒙德算是一位“受过伤害”的医生，自己曾患过忧郁症，所以，可能对格林的心理更能了解。格林在他们家里住了六个月，他给格林展示了一种知识分子波希米亚般自由的生活，也鼓励他写作，把他介绍给一些作家朋友。里奇蒙德对格林的治疗很简单，每天早上十一点，格林会到里奇蒙德的书房里，对他讲述他前一个晚上所做的梦。格林在他的自传《一种生活》(*A Sort of Life*)中这样描述他的

经历：

> 这位满脸麻子更像位音乐家的医生总是坐在他的书桌后面，手上拿着秒表，等着我进来……我开始读给他听我记录下的梦，然后我要说出我所联想到的东西，他会用秒表记下这之间的准确时间。然后他会讲一些关于心理分析的基本理论，讲起束缚着我们的传统势力。

里奇蒙德对格林的梦以及梦的联想都没有多加分析，“对于我的梦以及这些梦的联想，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他很耐心地等待着我自己在那条长长的路上找到自我，我也开始感觉到了这种寻找所带来的兴奋与刺激。”

格林这段时间记录梦境的笔记本早已丢失，但是在《一种生活》和游记《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中，他对这个时期的梦都有回忆。他常常梦到时间公主，她的周围是一些极美的颜色，尖顶的高塔，会有一个看不到身体的声音高声宣布：“时间公主，您是不受任何束缚的。”时间公主的仆人是“一群黑色皮肤的年轻女孩，手上捧着一触即死的有毒的花朵”。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格林说许多年后，他还能感觉到他有意碰了那些花后手掌上所留下的疼痛。时间公主象征着善良，也象征着毁灭。在另一个梦里他用别人给他的一本皮封面的祭祀之书和一把匕首杀死了她，但是她还是在他以后的梦里起死回生。在他所有的以恐惧、飞行、坠落、打开的门开始的梦中，梦总是要以她的出现结束，既冷酷，又让人觉得放心。

里奇蒙德的妻子佐伊很漂亮，那年三十一岁，伊芙·克罗伊塔在前言中提到格林梦到过他的心理医生的妻子赤身裸体的梦，此梦在《一种生活》中有所记录：

> “现在，”在讨论了一些理论之后，里奇蒙德说，“我们该谈谈你昨晚的梦了。”
>
> 我清了清干燥的嗓子：“我只能记得一个。”
>
> “说给我听听吧。”
>
> “我躺在床上。”我说。
>
> “在哪里？”
>
> “就在这儿。”
>
> 他在他的本子上记了些什么。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脱口而出：“有人敲门，是佐伊进来了，她赤裸着身体，她向我俯下身来，她的一个乳房几乎碰到了我的嘴，我醒过来了。”
>
> “乳房让你想到什么？”里奇蒙德问，并同时按下了他的秒表。
>
> “地铁。”我想了很久之后说。
>
> “五秒钟。”里奇蒙德说。

格林的钦定传记作家谢瑞说这个梦与格林的母亲有关，因为格林一直渴望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母亲的爱抚。但是也有别的传记作家认为当时格林与佐伊关系暧昧，佐伊可能就是少年格林的性启蒙老师。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情爱之梦，少年梦少妇，再自然

不过，这里的乳房绝对是一个性爱的器官，而不是哺乳的工具，所以，此梦应该与格林的母亲无关。当然，格林和佐伊之间是否真的有染就不得而知了。

从那时起，梦就在格林的生活和以后的创作中占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梦总是很鲜活生动，而且很有预测能力。格林在《梦之日记》的自序中谈到他能在梦中感觉到灾难性，七岁时他梦到过泰坦尼克号遇难，以后，他又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1921 年，格林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一两天前，我梦到了一起沉船事件，我所坐的那艘船开在爱尔兰海上。醒来后我没有多想此事。如同平常一样我们这里没有报纸，昨天我才看到一张旧报纸，得知“卢温”号在爱尔兰海遇难的事。这让我非常吃惊，我再去仔细看我的梦的日记，注意到我的那个梦就是在星期六晚上做的，而沉船正发生在那晚午夜之后。

1925 年 12 月 11 日，二十一岁的格林在给他未来的妻子维维恩的信中这样写道：

星期三夜里我没有梦到沉船，但是我梦到我是在一艘船上，我因一件什么事而受到惩罚，我必须从船上跳到海里去。我倒不是害怕淹死，我更害怕从游船最上层的甲板上跳下去时我要遇到的风。今天，我在诺丁汉杂志上读到星期三晚上有一场

大风暴，约克郡海岸附近有一艘船触了礁，船长命令工作人员们跳船逃生，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但是只有两人生还，其他的人都被淹死了。这真让人觉得可怕。在这种惨祸发生之时，肯定有很强的充满恐惧的脑电波，我的头脑好像特别容易接收到这种被淹没时的恐怖的电波。

魂牵梦绕，格林的头脑绝对是一个天才和怪人相结合的头脑，以后，梦也就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和驱动力之一。

## （三）梦与写作

格林的潜意识对他的创作影响极大，他在《梦之日记》的自序中说，他有几个短篇小说就直接使用了他的梦。伊芙也在前言里说，"每天晚上上床前，他会重新阅读他上午写的那部分小说或故事，让他的潜意识在夜间工作。有一些梦帮助他克服写作中的障碍，有一些为他提供了短篇小说的素材，有的甚至带给他长篇小说的构想。"最典型的梦为他打开创作的闸门，捋顺他的思路的例子，是《精疲力竭的病例》。伊芙说格林是把自己的梦赋予了主角奎瑞，格林的好朋友，杜兰牧师在他写的格林传记中也证实了此事。

格林当时写那本小说写得非常吃力，这是他最为内省的一本书，主人公奎瑞人到中年，功成名就，是一个在事业、爱情上都达到最高峰的建筑师。他突然厌倦了一切，打算放弃一切，到无人知晓的世界的尽头去。他来到非洲，来到没有路再往前走的地方，那是刚果的一个麻风病人小岛，在那里，他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人生、宗教、事

业、爱情的思考，那里的医生称他为几乎无可救药的精疲力竭的病例。此书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的格林的处境与奎瑞的非常相像，所以，奎瑞的许多思考也正是格林自己的思考。他写到一半时突然文思枯竭，挣扎了几天之后，格林做了一个梦，正是这个梦打破了他创作上的僵局，于是，格林就把这个梦给了书中的奎瑞：

>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醒来时他充满恐惧。他顺着一道长长的铁轨走，在黑暗中，在一个阴冷的地方。他必须很快赶到一个牧师那里，他要向牧师解释，虽然他穿着一般的衣服，其实他也是一位牧师，他得做忏悔，得弄到些圣酒，这样他可以主持弥撒。他接到了修道院院长的指令，他必须在这个晚上主持弥撒，第二天就太晚了，他会永远失去他的机会。他来到一个小村子，他离开了铁轨（那个小火车站已经废弃了：也许政府早就取消了这整个火车线路），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那个牧师的门前，那是扇厚重的中世纪的大门，上面布满了如罗马硬币般大的钉子。他敲门进去，一些虔诚的叽叽喳喳的女人们围着牧师，但牧师友善且容易接近。奎瑞说："我必须马上单独见您，我要与您说件事。"他已经开始感觉到他忏悔之后的巨大的轻松和安全感。他几乎回到家了。牧师把他带到旁边一个小房间中，里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壶酒。但是还没等他开口，那些圣女们穿过门帘向他们拥来，满是虔诚且怪异的举止。"我们必须单独在一起，"奎瑞哭喊道，"我有话要与您说。"牧师把那些女人们推回到门帘后，她们前后倾斜摆动，像是衣橱里的挂着的一排衣服。总算

> 没有人来打扰他们了，他的眼睛盯着那壶酒，说："牧师……"但是正在这时，正当他要卸下所有恐惧和责任的负担时，另一位牧师进来了。他把第一位牧师拉到一边，开始告诉他他的圣酒用完了，他得来借些他的，他一边说，一边拿起了桌上的酒壶。奎瑞崩溃了，仿佛在这个路口他有约在先，充满了希望，但是他迟到一步。他如同受伤的野兽般大哭起来，他醒了过来。外面下着雨，雨点敲打在铁皮屋顶上，闪电时，他能看到他的蚊帐造成的一个囚室，如同棺材那般大小，附近的一个麻风病人的房子中有一男一女在吵架。他想："我太晚了"，这个着了魔的句子不停浮现，就像挂在水下看不见的鱼网上的一个软木塞，"谁在乎?""谁在乎?"

格林的梦很能影响他的情绪，好梦让他兴奋，坏梦让他沮丧。传记作家谢瑞能为我们做证。例如，1983 年冬天，谢瑞开始在安提贝斯的格林的家里对他进行一系列采访，最后一天早上，他来到格林家里时，情景是这样：

> 我访问的最后一天的早上，格雷厄姆很兴奋，可能是因为当时已是早上十点，他觉得我对他的考问马上就要结束，也更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两个梦。我们的谈话一开始他就满面笑意，他的口音也有种很奇怪的改变：昨天晚上我做了两个梦，两个梦都是关于写小说的素材，做梦梦到小说素材让我很放松。第一个梦我已经完全忘却了，第二个梦是关于一个非常

奇怪的大房子，这个大房子多年失修，故事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参与到故事中，直到读者意识到他们还从未进过阁楼……

这个梦在此书里就有记录。

## （四）释梦：格林梦中的一些意象

这短短的四万字的《梦之日记》是格林从二十五年的八大本日记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挑选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所以，这些梦并不是一般杂乱无章的梦，它们大都有章有法，有因有果，每一个梦都是一个小故事，格林把他们串连起来，以“幸福”始，以“疾病和死亡”终，于是，这些梦就成了他“某种意义上的自传”。

白日所想，为夜间所梦，格林也不例外，他的梦的世界是他的普通世界的反映和折射。这个世界虽有其特殊的规则和气氛，但是读者对这个世界并不陌生，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早已熟悉。作家和政治家们频繁出现在他的梦里：奥登变成了游击队的首领，被伊夫林·沃给击中；格林与亨利·詹姆斯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乘上一艘去波哥大的轮船；T.S.艾略特批评他的诗作；赫鲁晓夫对作为天主教徒的格林星期五晚上吃肉提出异议；他与卡斯特罗同时面对一位丧子的父亲，卡斯特罗无神论的话语不及他在胸前画个十字更能让那位父亲得到安慰；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会说英文；他还有一次被任命为西敏大主教，但是他的过去要因此而受到审查。

战争和间谍活动是格林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梦中充满了

危险和恐惧的时刻，他一次次在梦中再去他在现实生活中去过的危险的地方：越南，墨西哥，海地，马来西亚，西非，其间他总是要受到追捕，盖世太保，克格勃，英国情报局，美国军队，墨西哥游击队，而他总是借着梦能醒来这个长处，一次次逃脱。宗教也是此书的很大一部分，格林梦到过好几任罗马教皇，而且，他并不掩饰他对于这些教皇的看法，他对他们的喜好和厌恶。他的梦还反映出他的创作焦虑，他带着怀疑论的宗教观，他左倾的政治观以及他冒险的激情。

格林的梦中有许多意象，我在这里略挑几个常常出现的，结合他的真实生活来做一些详细的解释：

### 俄罗斯轮盘赌

格林在《梦之日记》中两次提到俄罗斯轮盘赌，一次是他在海地，还有一次是他写了一部很糟糕的书。在 1924 年到 1925 年之间，格林在五个月之内玩过六次俄罗斯轮盘赌。他曾经在一本俄国作家写的书中读到过这种游戏，白俄的军官们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无聊日子，就在左轮手枪的六个弹孔中放入一颗子弹，然后转动旋转弹膛，然后对着脑袋扣动扳机，生与死的机会是五比一。

格林开始玩这种玩命游戏，因为他在哥哥雷蒙德的柜子里发现了一把左轮手枪。

1981 年，在接受他的传记作家谢瑞的采访时，格林谈到此事，他没有觉得自己拿了手枪去玩命有什么不好，让他愤怒的是他的一位堂兄居然把这支枪送给哥哥雷蒙德，这位堂兄 1917 年战死在法国，所以，他把枪送给雷蒙德时，雷蒙德只有十六岁。格林第一次玩俄罗

斯轮盘赌时，雷蒙德正在英格兰北部的湖区登山。格林在他的《一种生活》中这样写道：

> 我把左轮手枪放进口袋里，下面我能记起的是走过伯克汉姆斯特的大草地，朝着山毛榉树林走去……山毛榉的橄榄绿的树皮很光滑，还有去年的树叶子覆盖的沼泽地，颜色深如古旧的铜币……我把一颗子弹放入弹膛中，把左轮手枪放在背后，转动了弹膛……我把枪口对着右耳朵，扣动了扳机。我听到轻轻的咔嗒一声，我低头看手枪的弹膛，我看到这时子弹正在被发射的位子上。我因只差一颗子弹而逃生。

后来他把手枪偷偷带回了牛津大学，在下面的几个月里继续玩这种游戏：

> 在很少有人光顾的乡间小路上，左轮手枪在我的背后，弹膛旋转，枪口鬼鬼祟祟地快速对准我的耳朵，在冬天黑色的树下，我扣动扳机。

格林还曾为这种玩命游戏写过一首题为《赌博》的诗：

> 我在枪膛中放进一颗子弹
> 共有六个弹孔
> 然后转动枪膛

最后一次投出死亡的骰子
生存为五
双眼紧闭手指颤动
枪口对准我的头颅

扣动了扳机
是否会是一股轻烟和死亡
在这条夕阳西下的弯路上
还是生命更为加强
因为曾与死亡如此亲近
我总是会赢
这是一场我不会输的赌博

格林为什么要玩这种致命的游戏？是他真的想自杀吗？还是因为对于生活太厌倦？这个游戏的结果可能是死亡，但是如果不死的话，那就会带来一种绝对的刺激。他的好友克劳德·科伯恩说："他并不是不想活了，他只是想活得更刺激。"

也许，格林玩这个游戏，是与二哥雷蒙德在竞争，雷蒙德从小就事事成功，充满自信，能诗会文，擅长各项体育运动。他们同在一个寄宿学校，雷蒙德是学生会的主席，而格林则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格林开始玩俄罗斯轮盘赌时，雷蒙德正在登山，在进行另一种冒险。格林曾在 1925 年 12 月 11 日给未婚妻维维恩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对雷蒙德有一种很荒诞的竞争情结，他常常在学校杂志上发表文

章，他的诗也在学校里得奖，为此我也写作，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得过奖……后来雷蒙德开始各种冒险活动，他成了第一流的登山运动员……对我来说，他的登山运动就如同一根刺，我总觉得他会死在登山运动上，这样在探险这方面我就永远比不上他了，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那时我实在很无聊，所以我开始玩那个左轮手枪的游戏。第一次让我非常刺激，我觉得，虽然雷蒙德不知道，但是，我敢说这种刺激肯定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1933 年他和表妹一起去了利比里亚后，有人问格林为什么要去冒此险，格林回答说：“因为它就在那里，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这个回答可能与雷蒙德1931 年攀登喜马拉雅山不成功有关。

或是求死，或是要活得更刺激，这种极端不求中庸的态度，就是格林的生活哲学。对他来说，人生最可怕的不是死，而是百无聊赖。也正是这种生活态度，贯穿了格林成年之后的生活，他不断地旅行，总是去最危险的地方，总是要去赌一下他能否生还，如他在《梦之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这是他成年以后的更为复杂的俄罗斯轮盘赌。他在《一种生活》中写道：这种游戏的结果，或者是死亡，或者“是经历一种超乎寻常的巨大喜悦，就像是黑暗肮脏的街上突然亮起了狂欢节的彩灯，我的心怦怦直跳，生活充满了无数的机会。这就如同一个少年第一次成功地获得了性经验——就是在那山毛榉的树林中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 间谍活动以及金·费尔比

格林的间谍身份向来神秘莫测，有人说格林天生就是当间谍的

材料，因为如果他有什么秘密，别人就绝对不会知道。其实，格林小时候就做过间谍之梦，他曾经梦到被一个中国间谍追杀，他和一位全副武装的侦探躲进一个小棚子里，正当他终于觉得安全时，他低头去看侦探的手，看到的却是那个中国间谍的长长的手指甲。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格林妹妹伊丽莎白已经在为英国军事情报六局(MI6)工作了，经过她的介绍，格林也于1941年加入了MI6。当时MI6正在物色人选到在塞拉利昂的西非办公室里工作，格林非常合适，因为他已经对那个地区很熟悉。在英国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他就被派到塞拉利昂的弗里敦，他的代号是59200，他的密码系统来自一本书，他后来在文章中写道："我选择波伊斯的一本小说做我的密码，因为里面有充足的色情的句子可以供我娱乐。下一次货车到来时也会运来一个大保险箱，还有它的使用说明书和我的密码。"他在那里的工作并不很忙，每天早饭之后他先去集市逛逛，然后去警察局(算是他的工作单位)取伦敦发过来的电报，这些电报都是密码写成的，他回到家里后根据他的密码书解密，然后回答有关问题。他的工作应该还包括雇用培训当地的间谍，从当地间谍处收集情报，向敌方提供假情报等等。也许因为格林小心遵守了《国家机密法》，他当时的日记很少有关于他的间谍活动的记录，1981年，在接受谢瑞采访时，他说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搜集人名，归档，在卡片上做记录，这些都非常无聊，和一般坐办公室没有什么区别"，他说他并不喜欢当时的工作。在《梦之日记》中，他也提到他在梦的世界中的间谍生涯更有趣，更惊险，更刺激。

1942年底，格林回到英国，在MI6圣奥本的办公室里工作，他

的顶头上司是双料间谍费尔比，同事中有后来成为他的好朋友的特立弗·威尔逊（费尔比和威尔逊是进入他梦中世界的两个过去的间谍同事，格林戏称可能《国家机密法》也控制到了那里），他们那个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反间谍活动，也就是向敌方的间谍提供假情报。

费尔比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在剑桥读书时就被苏联克格勃雇用，是著名的“剑桥间谍”之一。他在为英国情报局工作的同时，也在为苏联提供情报。1963 年，他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叛逃苏联，余生在莫斯科度过，没有再回过英国。费尔比和格林在做同事时并不很亲近，但后来逐渐成为好朋友，他们之间的友谊从来就没有中断过。1944 年 6 月，费尔比为了在 MI6 培养自己的亲信，要提升格林为部门主管，格林没有接受，反而辞职。对于格林的辞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格林当时已经对费尔比的身份有怀疑，他的辞职是因为他不愿意在出卖朋友还是出卖国家之间做选择。格林后来说如果他知道费尔比是克格勃的间谍，他“作为一个朋友，会给他二十四小时让他逃走，然后会举报他”。费尔比叛逃后，格林仍一直与他通信，1969 年，费尔比的自传《无声的战争》(***My Silent War***)出版，格林为之作序，费尔比很是感动，这对格林来说，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之举，许多人批评他为国家的叛徒说好话。格林在序言中写道：“我记得在圣奥本的那无数个快乐的星期日午餐，整个部门在他的领导下放松下来，连续几个小时喝着酒……”格林又说费尔比“确实背叛了他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有人的一生中，谁没有在某种情况下叛变过比国家还要重要的什么人或什么事呢？”他曾多次说费尔比所做的一切都不是出于自私的原因，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他的从未失去过的共

产主义信仰，这很难能可贵。费尔比一直把格林视为知心朋友，他叛逃之后，有人问他如果他有一根魔杖，他会实现什么样的愿望，他回答说："格林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我们当中是一瓶好酒。"1986年，费尔比梦想成真，格林受戈尔巴乔夫之邀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他们俩再次见面，只是桌上的好酒由伏特加取代。

格林并没有因离开MI6而结束他的间谍生涯，以后，在他无数次去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冒险旅行中，英国情报局或是外交部都与他联系过，请他顺便收集一些情报。所以有人认为，格林虽在名份上早与MI6没有牵扯，但是他们的合作关系一直就没有中断过。

## 宗教

宗教是格林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评论家们常常把格林和他的好朋友伊夫林·沃并称为英国两大天主教作家，虽然格林向来就不同意这种称呼，但是他的重要作品几乎都与天主教有关系，有的直接以天主教为主题，例如《布莱顿硬糖》(*Brighton Rock*)，《权力与荣耀》和《问题的核心》。

然而，格林并不是那种传统保守的天主教徒，他皈依罗马天主教，是因为他当时苦苦追求的维维恩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为的是要让这个姑娘看上自己一眼。当时，他的好友克劳德·科伯恩提议道："那你也相信不就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科伯恩后来承认，他的提议几乎是半开玩笑，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皈依天主教对格林来说将是多么严肃认真的事情。关于此事，格林在他的自传《一种生活》

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梦：

> 我们三个人站在一个屋子当中，克劳德建议我们做一些黑色巫术，我一开始觉得这很可笑，然后同意试试。我们站在那里，用力思考，突然我一下子很害怕，我的头脑里一片漆黑，只有一小点火星，这些小火星上下蹿动，我变得非常狂乱，从墙上抓下一张画，使劲扔在地上。然后我看了它一眼，这一看就又突然把它弄回到墙上，我有一种巨大的逃避感，惊醒过来，充满恐惧。

所以，与其说格林是宗教的，还不如说格林是迷信的，但是至少在天主教上，格林是做到了“从一而终”。然而，在格林的小说中，人性首先是第一位的。他笔下的人物即便是宗教的烈士，也会有许多平常人的弱点，例如无法拒绝酒精或是女色的诱惑（如同生活里的格林自己），所以，他的所谓“天主教小说”往往不受罗马梵蒂冈的欢迎。格林在《梦之日记》中也提到《权力与荣耀》受圣职部审查禁封一事，具体原委如下：

《权力与荣耀》出版于1940年3月，因为当时正是二战时期，所以，一开始影响不大。此书写的是墨西哥对天主教徒进行大清剿时，一位酗酒的牧师如何被追捕、逃亡的故事。二战之后，此书逐渐流行。它的法译本非常畅销，有两位法国的红衣主教觉得书中描写天主教牧师酗酒通奸生有私生子，这样的牧师最终竟被格林推崇为烈士和圣者，他们觉得这是对天主教的亵渎，所以，就对此书进行谴责。1953年，英国红衣主教格里芬把格林召到西敏寺大教堂，他向格

林宣读了一封罗马教廷圣职部的红衣主教皮萨多写来的信,信中要求格林对《权力与荣耀》中的有些部分进行修改。红衣主教接着说《恋情的终结》一书也应该受到谴责,他说:“对于你和我这样的成年人来说,那些性爱的描写无关紧要,但是对于年轻人……”格林回答说他承认他最早的性启蒙确实来自于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这样的名著。红衣主教无言以对,他最后举着一封他的亲笔信说,他在他权力所及的教区之内不仅要谴责《权力与荣耀》,还要谴责《恋情的终结》以及《问题的核心》。第二年,罗马教廷圣职部公开谴责此书,要求格林对书中的内容进行改动。格林的好朋友大卫·麦休大主教帮助格林起草了回信,信中说因为《权力与荣耀》已经出版十多年,所以任何修改都得由出版社进行,为了表示自己愿意帮助圣职部的诚意,信中还附上了所有出版社的名称和地址,圣职部可以直接和它们联系。

此事格林在他的传记《一种生活》以及回忆录《逃避之路》中虽然轻描淡写,但是对他来说却至关重要,所以他在这本《梦之日记》中还要再次阐明他的立场。他曾经向伊夫林·沃倾吐他的愤怒,虽然沃与格林比起来是个更为虔诚、更为传统的天主教徒,但是他还是对格林表示毫无保留的支持, 在 1954 年 5 月 2 日他在给格林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格雷厄姆,自从你给我看了圣职部的信,我就无法抑制我的愤怒,此信不但愚蠢而且不公,是对这本杰出的著作的恶毒歪曲。你要不要《权力与荣耀》的仰慕者们进行一次大游行?我会非常乐意组织这样一次游行。”他在信中又说:“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你应该按兵不动,看圣职部下一着会如何。又不是你向他

们要出版许可，是他们自找麻烦要修改此书，所以，他们得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这只会让他们贻笑大方。他们花了十四年时间才给你写了第一封信，你也应该过十四年以后再给他们回信。”

后来，格林与教皇保罗六世（在《梦之日记》中，格林提到对他极有好感）做过一次交谈，教皇告诉格林说他已经读过他的小说《斯坦布尔列车》，现在正在读《权力与荣耀》。格林说："陛下，您在读一本圣职部的禁书呀。”教皇问他是谁禁的，格林回答说是红衣主教皮萨多，教皇摇摇头，露出一丝诡秘的微笑说："格林先生，你书里的有些部分是会让一些天主教徒觉得不舒服，但是你不用太在意。”

## 创作的焦虑

在格林的《梦之日记》中，他的间谍生涯，他的战争经历，他的犯罪活动，他的危险和恐惧的时刻，都没有让他产生过多的焦虑，他的恐惧总是充满一种冒险和愉快的成分。在他的梦中让他焦虑的，是他的创作，他的剧本，或是他当电影导演的时候。这该是一位典型的作家的心理和潜意识吧。

例如他在梦中希望他早期的两本极不成功的小说从来就没有出版过，一本是《行动之名》（*The Name of Action*），另一本是《黄昏流言》（*Rumour at Nightfall*），分别是格林的第二部与第三部小说。《行动之名》写作于 1929—1930 年，出版于 1930 年 10 月，总共只卖掉两千本。出版之后的第五天，格林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评论太糟糕了，整个情景实在让人非常丧气。”1980 年，七十六岁的格林强迫

自己重读了此书,他承认几个月后他已经不记得他的女主人公最后的命运究竟如何,他说:“她是死是活真的无关紧要。”关于他的男主人公,格林承认他“只是一个年轻而浪漫的小说家头脑中的白日梦,要经过无数年的沉思,内疚,自我批评和自我辩解,才能洗尽眼中那层迷茫的希望和梦想,以及那种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

《黄昏流言》写作于 1930—1931 年,出版之后只卖出一千二百本,评论也极糟糕,有一篇评论这样写道:“格林先生有一个好故事要告诉我们,但是他是如此一个不屈不挠用心良苦的浪漫的作家,这让人很难相信他所写的每一个字。他用狂欢节的各种颜色装饰他笔下的心理戏剧,他的人物的情感波折都是舞台化了的,可以说,他达到了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顶点。”后来,在《一种生活》中,格林提到他的《黄昏流言》中的人物是“煽情的硬纸板的平面人物”,并且说当时的他因为“满足于追求这种二手的浪漫故事,所以才会有如此灾难性的结果”。

格林不仅是小说家,他对电影和舞台也一直很钟爱。二战之后他开始涉足好莱坞,由他编剧,卡罗尔·里德导演的电影《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获得 1949 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奖。1935 年到 1940 年间,格林写过许多影评,风趣幽默,又不乏真知灼见。格林也写过好几个话剧剧本,1953 年他的《起居室》(*The Living Room*)和 1957 年的《制陶工棚》(*The Potting Shed*)的演出都很成功,但是,1964 年的《刻雕像》(*Carving a Statue*)却是格林的一个大败笔。在那期间,他曾好几次梦到《刻雕像》的男主角拉尔夫·理查森与他捣乱,他居然想到用马鞭子把理查森的脸打开花。

此剧 1964 年 9 月 17 日开始在伦敦的皇家剧院上演，但是非常不成功。当时《笨拙》(*Punch*) 对此剧如此评论："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位颇有声誉的剧作家最糟糕的剧本。我实在不懂为什么皇家剧院会同意上演此剧，为什么拉尔夫·理查森和罗兰德·卡尔瓦会同意在里面担任角色，为什么彼得·伍德会同意当导演，为什么格林先生竟让这个剧本走出他的书房！"《笨拙》在打翻此剧后还得再踩上一只脚，评论接着说："此剧故事平庸，剧情发展愚蠢，人物的刻画敷衍了事，关于上帝的理论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无知简单……"关于理查森的表演，评论有好也有坏，但是格林后来把此剧的失败全部怪罪在理查森身上。当时，格林给理查森写了一封信，说他对角色完全不理解，指责他的虚荣心在作怪，说是因为他只想着自己的形象而让整个一出戏都砸了锅。1979 年，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格林谈到演员可以让一出戏成功，也能让一出戏失败。他说："一个演员，不用改动一句台词，就能毁掉一出戏，或是让一出戏充满生命，这种变化的魔力真让人费解。"1980 年，他在《逃避之路》中写到："第一幕完全变成了闹剧……男主角对这出戏的看法和我大相径庭，他以为他是在演易卜生呢。"

据说理查森把格林 1964 年的那封信贴在英国雕塑家亨利·莫尔的一本画册里(《刻雕像》舞台设计的雕塑就是莫尔风格的)，放在厕所里。1981 年，谢瑞写信给理查森请他陈述他的故事，理查森回答说："格雷厄姆是个巨人，我是个小老鼠，从我这个小老鼠的角度我又能如何谈论他呢？……你能从我的老鼠洞里偷偷地窥见一点：我还活着，但是我不咬人。格雷厄姆一直在喂我，我怎么会咬他呢？"

## 情妇和妓女

格林在《梦之日记》的前言中说，为了不牵连他曾经爱过的人，他没有选择与情爱有关的梦，但是，这本书的背景中，总是有一位美丽的情妇，她或是幽雅地坐在MI6的会议室里，或是与犯罪的格林在一起，或是听格林朗读他刚写下的段落。这个情妇无名无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妇很漂亮。

格林可谓是一位情种，他的一生中，有几位比较重要的女性，第一当然是他的妻子维维恩（他们1927年结婚，1948年他们正式分居，因为天主教的原因他们从未离婚）；二是他40年代的情人多萝西；三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情人凯瑟琳，《恋情的终结》就是以格林与她的关系为原型，而且是题献给她的，格林与她的关系从40年代一直持续到50年代）；四是瑞典女演员安妮塔（1955—1958年间与格林是情人关系，《梦之日记》第十一章中提到的那个瑞典名字）；最后一位是伊芙·克罗伊塔（她60年代成为格林的情人，一直陪伴格林到去世，这本《梦之日记》的前言作者）。其实，对公众来说，格林的这几位情人都不是秘密。谢瑞曾有机会阅读格林的整整八大本梦之日记，他说里面有很多的梦是关于凯瑟琳和伊芙的。但是在格林精选的这本《梦之日记》中，只有伊芙的那条塞特种狗占有一席之地。

相比之下，格林对于他造访妓女这一事实倒是更坦诚，在自叙中他就写到带着一枚金币去拜访妓女，最后还是把这枚金币给了另一个女人，圣母马利亚。他还写到他最令人不愉快的经验之一是选了一位年老的妓女。在西方，对于所谓正人君子来说，嫖妓可是大

忌，属犯法行为，但格林根本不把嫖妓看成是什么不光彩的事。1932年11月28日，他在日记中提出一个问题，他不是问究竟是妻子好还是情人好，他问究竟是妓女好还是情人好，因为妓女的责任就是要取悦人，而情人得被取悦，所以，有时，可能一个花钱买来的性伙伴会更好。二战期间，伦敦到处都是妓女，她们的鞋底钉着钉子，走起路来咚咚作响，她们手上拿着的小手电筒如同萤火虫一样，照亮她们腿上穿的透明丝袜，她们或是快速打亮一下她们的打火机，以表明她们的存在。格林当时虽然有妻子在乡村，又有情人在伦敦，但是光顾妓女也是常事。在《恋情的终结》中，他描写了男主角在街上寻找妓女的过程，显然就是他自己的经历。格林还存有一份名单，上面列举着曾经与他有过关系的妓女的名字，共有四十七位，有一些是女子的名字，有一些是地名，有一些是对女子的描述，例如"穿着俄国皮靴的"，"高挑，金发，友善"，"镜子前的女子"等等。从这点上来说，最有隐私的格林显然又是最光明正大的了。

有趣的是，二战时，格林在塞拉利昂当间谍时，曾经向他的上司提议开一家妓院，并且说他已经找到了一位非常能干的鸨母，因为通过妓院可以收集到许多很有价值的情报。很可惜英国军事情报局没有采取他的建议。

## （五）阅读快乐

导读写到这里，突然想到，格林大师的在棺之灵肯定要说我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格林在自序中谈到另一位大师史蒂文森和他的

梦时写道:“奇怪的是普通世界中的史蒂文森,在他自己的世界中常常像是个陌生人,他自我的故事让他本人迷惑不解。”对于格林来说,普通的世界和梦中的世界没有界限,他梦中的世界从来就没有让他迷惑不解,梦中人和做梦者是合二为一的,他们一样经历着充满冒险的生活,他们同样拥有着极度矛盾的性格,他们同样会内疚,会焦虑,也会感觉幸福。对于格林自己来说,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必去问,“这梦中的事情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呀?”

伊芙在序言里说,格林“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时间就是花在这个项目上的,这让他兴趣盎然。对他来说,挑选这些日记,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所以,这也应该是一本让人快乐的书。”我要说,翻译此书,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所以,对于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阅读快乐!

# 前言

在格雷厄姆·格林去世前几天，我和他的女儿卡罗兰[1]在瑞士维维[2]的省医院里陪伴他，他要我整理他的梦之日记准备出版。我曾有言在先，答应过为他写序，所以，我在此执笔完全是出于要兑现这一许诺的强烈愿望。此书出版在他过世之后，标题《我自己的世界》是他命名的。

格雷厄姆生前对他的隐私严加防护，对别人的隐私也同样尊重。他以《一种生活》[3]“在二十七岁时结束了有关自己的记录”，之后他一直拒绝再写自传[4]，究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自传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其他人生活的隐私。而梦境这一私密的世界，他却一直悉心呵护，每天都要坚持记录，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从未间断。

从那几大本日记中，他深思熟虑地精心筛选出这一小部分公之于众。他生命中最后几个月的时间

1 ◎ Lucy Caroline Greene，出生于1933年12月。

2 ◎ Vevey，瑞士日内瓦湖边的一个小镇，格林生命的最后几年在这里度过。

3 ◎ *A Sort of Life*，格林的自传，出版于1971年。

4 ◎ 格林1980年出版的回忆录《逃避之路》(*Ways of Escape*)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但有很强的自传性。

就是花在这个项目上的，这让他兴趣盎然。对他来说，挑选这些日记，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所以，这也应该是一本让人快乐的书。

在这个潜意识的充满想象力的世界中——他常常称这个世界很奇奥——一切都超越了时空，互相交织缠绕，格雷厄姆显然感到轻松和幸福。他在序中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的自传。"确实，他秘密的梦中世界和他所生活的现实世界区别很小，它们之间没有障碍。这里，他可以说别人的闲话，他探险的激情和荒谬的喜悦可以信马由缰。做梦就像是给他自己放假。他曾经向一个朋友这样坦白："如果能记住整个梦，那将是一种极大的娱乐，你仿佛被俘虏进另一个世界里一般，让你觉得有意识的世界中的许多责任都非常遥远。"

有一次我对他说，他能如此清晰地记住他的梦，记住每一个准确的细节，这很让我惊讶。他解释说这种记忆的习惯来自于他最早对于梦境的记录——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曾接受过心理分析的治疗，心理医生要求他记录梦境(有时结果很让人窘迫——例如有一次他得坦白他梦到与心理医生的漂亮妻子的情爱场面)[5]。后来，在他重又开始记录梦之日记时，他床边的小桌子上总是放着铅笔和纸，他一般每夜要从梦中醒来四五次，他会很快记下关键词语，这

5◎ 少年格林接受心理分析治疗一事，详见导读。

样，上午他能根据这些记录重构他的梦，然后写进梦之日记中。我仍记得他的第一本梦之日记——那是本深绿色皮封面的笔记本，是一个朋友送他的礼物；另外还有一本是波尔多酒的颜色。

格雷厄姆向来对梦很感兴趣，这众所周知。而且，他的潜意识对他的创作也有着很大的影响。他常常早饭之后立即开始写作，一口气写出五百字（最后这五百字会被减少到二百字）。每天晚上上床前，他会重新阅读他上午写的那部分小说或故事，让他的潜意识在夜间工作。有一些梦帮助他克服写作中的障碍，有一些为他提供了短篇小说的素材，有的甚至带给他长篇小说的构想（例如《战场上》和《名誉领事》）。正如他所写的那样，“有时，你与小说中的人物如此认同，你开始做他的梦，而不再做自己的梦”——他在写作《精疲力竭的病例》[6]时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他把自己的梦境赋予给主角奎瑞[7]，从而避免了叙述中的僵局。

他的梦境中最令人吃惊的一面是它们能预兆未来。我记得有一天他看上去很沮丧，我问他为什么会如此苦恼，他答道：“我梦到了一场大灾难，我希望我的家人亲戚与好友都安然无恙。”几个小时后，我们听到一架飞机坠毁在科西嘉和尼斯之间的消息，离他在安提贝斯的公寓只有几英里，据说所有的乘客

6 ◎ *A Burnt-out Case*，出版于1961年，这是格林写得最吃力的一本书。

7 ◎ 关于奎瑞的这个梦，详见导读。

都不幸遇难，其中一位是康尼将军，格雷厄姆在越南时和他很熟悉。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惊恐，紧张或是幸福——在他的脑海里留下非常生动的印象，每一个细节都如此清晰，有时候它们会纠缠着他，在他醒来之后的好几个小时仍然会影响他的情绪。

今天回忆起来，我无法不想到他的一个反复出现的如同谜语般的梦，现在看来，这梦其实有着很强的个人信息。在《一种生活》中，他提到在他父亲1943年去世之后他常做的一系列梦，他写道："在这些梦中，我的父亲总是被关在医院里，与他的妻子、孩子相隔离，只是偶尔才能回次家。他是一个沉默孤独的人，一直没有被治愈，所以永远生活在流放之中。直到今天，这些梦依然非常清晰，有时我得做番努力才能让我自己相信父亲从来没有进过医院，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直到他去世时，他与我母亲一直在一起。"对他来说，也许这种不断要进医院只是巧合，但是很难不把这些梦看成是他自己未来将要忍受病痛的预兆：半个世纪后，在他生命将尽之时，他自己被迫流放于医院之中，因此而备受痛苦。

在他最后的这本书里，他让我们一瞥他充满激情的内心生活，他创作的隐秘源泉，那个因为害怕造访者破坏"地毯上的花纹"而紧紧关闭的世界。作为

一种告别，格雷厄姆为我们打开了这扇通往他自己的世界的门。

格雷厄姆——

在《权力与荣耀》中你这样写道："太空中，那些闪闪发光的星球如同一种希望，地球并不是宇宙。在那里，可能有一个耶稣没有死去的地方。"

如果这样一个地方果真存在，那你已经找到了。

伊芙·克罗伊塔

维维，瑞士

1991 年 10 月

# 目录

附录:

# 自序

有时，知道有一个完全自我的世界，这种想法很让人觉得宽慰。这个世界中的一切经验，旅行，危险，幸福，都不用与人分享，没有见证人，没有诽谤罪。我所遇到的人物没有与我会面的记忆，没有记者或自许的传记作家们来核对我所说的一切，政府无法因那些间谍活动绳我于《国家机密法》。我曾在一次晚宴上与赫鲁晓夫谈话，我曾奉特工部之令去刺杀戈培尔。我没有撒谎——那些与我共享此景的证人们，没人能够依据他们的个人经验证明我所说的不是事实。

我的日记从196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共有八百多页，我从其中选择出了《我自己的世界》中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我的自传，以“幸福”始以“死亡”终，是一个怪人过去三十余年的生活(此书中所写到的战争是60年代的，而不是40年代

的)。但是,其他传记作家们无法使用这些材料。有时,为了让我自己满意,我也会记下一些特殊事件和特殊会面所发生的年月日。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原先想把1988年春天与亨利·詹姆斯在玻利维亚一艘船上的会面作为全书的开篇。但是,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因为1989年1月,在我开始记录这个私人世界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经历了幸福。在我自己的世界中,伟人多如牛毛,真正毫无意义而且无法解释的幸福——这却是我唯一的一次记录。

人们常说鸦片可以帮助打开或是关闭通向这个世界的门,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50年代我在越南和马来西亚时常抽鸦片[1],当时我忙于记录的日记大都是有关普通世界中的种种暴力,我记得在我自己的世界中,也只有过一次"非凡"的经历,它的"非凡"在于时间的回溯——我回到了公元1世纪。

那时我住得离伯利恒不远,我决定步行到那个小镇上去造访我所熟悉的一家妓院,我带着一枚金币,用来付给我所选中的女孩。快到城里时我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一群穿着东方服饰的男人们在鞠躬朝拜并奉献礼物,对象是谁?原来是一堵墙。没有人接受他们的礼物或与他们打招呼。我站在那里看了许久,然后不知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我把那枚金币也

1◎ 格林第一次抽鸦片的经历是在1951年10月31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说:"第一次抽了鸦片,我很喜欢。回到河内后,我的感觉很好。"在《逃避之路》中,他提起是一个法国官员带他去的,他写道:"爬上楼梯时,我能闻到鸦片的味道,感觉就像是第一次看到一位漂亮的女人,而且你意识到你会与她发生关系……"

投向那堵墙，然后我转身离去。

我自己的世界中的时间可以过得很慢，也可以过得很快。在这个例子中许多个世纪转瞬而过，我发现自己躺在床上阅读《新约全书》，里面有个故事是关于一群东方的君王们前去朝拜伯利恒的一个马厩，正是我所见的情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到伯利恒去，原本是要把金币送给一个女人。看来，虽说我所见的只是一堵墙，但这金币果然是给了一个女人。"

这是自己的世界富有想象力的一面，与普通世界很不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2]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化身博士》这一奇怪例子时说："有一段时期我非常拮据，我觉得我得做些什么。我苦思冥想，想找一个可写的主题。夜里我梦到这个故事，它仿佛是一件特殊的礼物，更奇怪的是我常常梦到故事，不久以前我曾经梦到另一个故事《奥拉拉》，所以，现在我手头有两个我梦到的可写的故事。"

在史蒂文森所写的故事中，《奥拉拉》常被人忽视，其实，它与《化身博士》有一种内在的相似性。这个故事肯定是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而不是属于故事的发生地西班牙。就如同《变形医生》中的伦敦更像是爱丁堡的街头，或是史蒂文森自己的世界中的一个城市。

2 ◎ 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英国作家，格林母亲的表兄，他对格林的创作影响很大。

奇怪的是普通世界中的史蒂文森，在他自己的世界中常常像是个陌生人，他自我的故事让他本人迷惘不解。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奥拉拉》的毛病是它听上去很不真实，但是问题是，什么才算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马克汉姆》是真实的，《奥拉拉》是虚假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化身博士》这个例子中，他甚至过分到把初稿扔进火里去。

我有几部短篇小说就使用了我自己的世界中的材料。在《梦见陌生之地》中，我记录了我在那个世界中是一个麻风病患者，在瑞典接受治疗。小说发表时，唯一增加的内容是最后那一声枪响。另一个故事《罪恶之源》，发生在19世纪的德国，醒来之后我带着一丝愉快的微笑，没有做任何改动，故事就从我自己的世界进入了普通世界。

我们称之为梦的东西有着另一面，邓恩在《时间的实验》中做过有趣的披露：它们包含着未来以及过去的碎片。我曾经写到过，我七岁时，一天夜里，我梦到一起沉船事件，那夜正是泰坦尼克号遇难之时。九年以后，在爱尔兰海我也见证了另一起沉船事件。[3]回顾我长长的记录梦境的历史，不止一次，我所梦到的事件几天后果真会在普通世界里发生。他们大都很琐碎，不值在此一记，但是我确信邓恩是正确的。

我与亨利·詹姆斯在我自己的世界中的会面完

3 ◎ 格林的这个梦详见导读。

全出乎意料，而且非常奇怪，所以，我把它放在第二章里，题为《我所认识的几位作家》。与一般传记作家不同，我觉得没有必要在年份和时间上亦步亦趋，所以，我早年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4]在一家旅馆卧室里的会面没有我最近与詹姆斯的会面那么重要。(我知道那天如果我弄醒约翰·保罗二世的话，对他对我都没有好处，我们天生就不喜欢对方。)

这本书中没有我生活中情色的一面，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不希望牵连那些我曾经在自己的世界中爱过的人，虽然我没有力量阻止传记作家们或是记者们在普通世界中写到她们。这本书中另一所缺是噩梦。这里记录了战争和危险，但是它们不像我童年时常常出没在婴儿室外走廊里的那个女巫，直到最终我转身面对她，她才消失。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在海地和越南常常感到恐惧，但是从来没有极度的恐怖和噩梦。也许因为无论在我自己的世界还是在普通世界中，我的恐惧中总有着一些冒险和愉快的成分。

4 ◎ John Paul II，1920—2005，波兰裔教皇，1978—2005年任职，曾经遍访世界各地，为结束冷战做出贡献，重申保罗六世的保守政策。格林并不喜欢这个教皇。

# 幸福

那是 1965 年，我决定在一次即将到来的补缺中为自由党再拉些选票，我选择了小镇赫登[1]。但是去那里的站台不在维多利亚火车站的主站，那是一条名为赫登线的支线，有它自己的入口。我猜想它大概是一条很古老且充满趣味的铁路线，果真如此。

第一列离站的火车有着精致漂亮的车厢，大约是一百多年前的火车，但是它不去赫登。第二列火车去那里，但是非常拥挤。乘客们都非常友好且愉快，这让我吃惊。他们对我表示欢迎，并且在拥挤的车厢中为我腾出位子。他们都穿着怪异的服饰——爱德华时代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所经过的车站更让我着迷。在一个宽阔的站台上，一群孩子在玩大红色的气球；另一个车站像希腊神殿的遗址；还有一段铁轨变得很窄，火车开过一个用垫子做成的隧道。

我感到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感觉到过的幸福，我

1◎ 这个小镇并不存在。

们所经过的离奇有趣的房屋中开始出现灯光，在夜晚的这个时刻，我渴望回到我所爱着的女人身边。

火车停在一家小古董店旁边，我听到一个乘客说："所有的男人都在喝酒玩牌呢。"

我和一对年轻的夫妻(女的漂亮但有些神经质，她的丈夫很英俊，头发拳曲，长相大方)很快就如同老朋友一样。我说："我在伦敦生活了五十年，从没听说过赫登线。我每天都可以走这段旅程，永远不会厌倦。"

女子说："有件事你得注意——如果你在这里过夜的话，不要让他们把你送到小旅店里去。"

"这里没有宾馆吗？"

"它们也一样糟。"

我决定放弃拉选票的事。我所渴望的是看看赫登。我原本打算晚饭时回伦敦，所以，我出站前去问了晚班火车的时刻表。我担心它已经离开，这样我得住进一个糟糕的小旅店里去。但是情况还不错，最晚一班火车是晚上十点二十五分。

那女子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她会带着我去城里逛逛。我说："首先你们二位得与我喝杯酒。"我能看见酒吧里满是笑闹的人们。"你不是滴酒不沾的吧？"我问。

"不是。"女子说。

"那你就选择一家最好的酒吧吧。"

同时，我的心中充满了那种无法解释的幸福感。希望有一天我能再回到这个只存在于我自己的世界中的小镇赫登。

# 我所认识的几位著名作家

奇怪的是，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没有活着的作家。看来我有缘幸会的作家只有在死后才能进入我秘密的世界。

## 亨利·詹姆斯

1988年4月28日，我发现自己与亨利·詹姆斯同在一艘令人非常不愉快的开往波哥大的航船上。船是在午夜以后起航的，我们手上拿着行李，在漆黑的码头上摸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伟大作家的决心和我对他的作品的仰慕，我早就打道回府了。[1]

让事情更糟的是一个官员的高声叫喊和恐吓声——他在黑暗中，没有人能看到他——他大叫道："无票上船者罚款一千美元！"争着上船的人群很拥挤，几乎无法向他出示我们的船票。

船上也没有坐的地方——我们勉强挤进水泄不

1◎ 格林一直很推崇詹姆斯的作品，1939年，他曾经参加过《旁观者》举行的一次书信比赛，比赛的内容是要以一位名作家的风格给政府某机关写一封关于汽油限量供应的信，格林模仿的就是詹姆斯的风格并且获得头等奖。

通的走廊里，乘客大多数是妇女——但是亨利·詹姆斯一点都不抱怨。船在某一处停了几分钟，有一些乘客下了船。我对詹姆斯说，我们也可以趁机逃脱。但是詹姆斯压根不愿意。“我们必须坚持到底，”他说，“这是为了科学研究。”

## 罗伯特·格雷夫斯[2]

一天晚上我在路边与罗伯特·格雷夫斯会面，这次经历很让人愉快。我曾于1923年在普通世界中与他见过面，他当时住在牛津附近。他依然如当时那么年轻，很高兴与我再次见面，并且提起我们曾经在意大利前线见过面，那次会面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告诉他我一直很欣赏他的诗歌，即使是在20年代，我一直珍爱着他的第一本诗集，《火盆之上》。

我问他：“你是否记得我的那本糟糕的诗集《咿呀四月》[3]，您对其中的一首诗曾有善言？[4]”然后我又开玩笑地说：“现在在拍卖会上，我这本书的价格比您的第一本诗集还要高。”

## 让·科克托[5]

1983年，我在一个晚会上和让·科克托会面，这让人又惊又喜。我很坦率地告诉他，我原以为他的眼神会很冰冷，但事实上它们很善解人意，也很充满温

2 ◎ Robert Graves, 1895—1985，英国诗人，曾任牛津大学诗歌教授。1933年7月，格林读了格雷夫斯1929年出版的自传，他在7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开始读格雷夫斯的《与一切道别》，真是极大的乐趣。里面充满了轶闻趣事，让人的创作灵感大发。”

3 ◎ *Babbling April*，出版于1925年。1925年3月6日，在给母亲的信中，格林写道：“我打算称它为《咿呀四月》，每年四月从山坡上下来，像一个傻瓜一样，咿咿呀呀，播种花草。”

4 ◎ 当时已经名声大振的格雷夫斯曾经对格林的诗句“你离开我之后，我会重又幸福／幸福得如同无知无觉的石头”大加赞扬。

5 ◎ Jean Cocteau, 1889—1963，法国艺术家，能诗善画，也曾创作小说、戏剧、舞剧和电影。

情。他醉醺醺的男朋友后来也来了。

## 福特·麦多克斯·福特[6]

与福特·麦多克斯·福特交谈，我想向他表达我对他的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的仰慕。他说他从未写过这样一本书。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这本书的书名，所以，我就到书架上去找本他的著作，希望其中能列举他其他著作的书名。我找到了两本他的由伯德列·黑得(Bodley Head)出版的著作——其中一本是我从未听说过的文集。上面没有列出他其他著作的书名。突然(有好几次我差点说《丧钟为谁……》，但都欲言又止)我记起了那本书名——它叫《有人不为之》[7]。

我们在很美丽的乡间散步，经过一条小河时，他告诉我圣母马利亚的一个传说。圣母站在一个山坡上面，弯腰托起好几英里外这条河中快要淹死的一个人。

“但是这里的地势很平呀。”我说。

“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里的地势经过那个旧磨房到闸门处是倾斜下去的。”有人对我说起过管闸门的那个女人——她烧得一手好菜，并且对当地历史了如指掌，她希望把她的知识传授给儿子们。

我们开始穿过田地——我有些紧张，因为地里

6 ◎ Ford Madox Ford，1873—1939，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编辑。1932年7月10日，格林刚刚读完福特的一部新小说，他在日记中写道："读完了福特的小说。真是本好书。从技巧上来说，是一本'很可爱'的书；他对复杂的叙述时间的处理比康拉德的还要好，几乎可以称为'天才'，但是这样的书是批评家所不看好的，他们只喜欢那种保险的文学风格，例如查尔斯·莫根，除了写得还算漂亮外，没有任何独创性，就像去年的落叶那样死气沉沉。但是福特的作品却像一只跳蚤那样充满生命力。"1962年到1963年间，格林曾经为Bodley Head出版社编辑了四卷本的福特文集，他在序言中写道："在我们这个世纪，除了詹姆斯之外，没有其他作家如福特那般对文字精益求精。"

7 ◎ *Some Do Not*，福特出版于1924年到1928年间的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外两部是《天堂不再》(*No Mor Parades*)和《直立者》(*A Man Could Stand Up*)。

有一大一小两头公牛，它们对我们的行动好像很感兴趣。我慢慢折回到大路上，回头看到那头小公牛爬到了福特的肩膀上，他对此满不在乎。

我走到闸门处去等候他，我能闻到一股饭菜的香味，那个女人正在和一个邻居说话。那个闸门在一个小镇的入口处，福特赶上了我，那女人说她推荐汤和鱼。我们说要到小镇上去买一瓶酒。她说她可以叫她的儿子去，她的儿子穿着一件古代农夫穿的工作服，但是我们坚持要自己去。我们临走时福特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这里的男人不喜欢穿任何过膝的衣服。"

### 艾略特[8]

有一天，我正在为一次诗歌比赛准备作品，我刚刚写了一行——"美丽让罪行变得高贵"——T. S. 艾略特在我背后打断了我，他批评道："这是什么意思？罪行怎么可能高贵？"[9] 我注意到他的嘴上长出了小胡子。

### W. H. 奥登和伊夫林·沃[10]

把这两位作家拉到一起是一种很奇怪的境遇。我所属的一个游击队帮派打败了另一个帮派，但是

8 ◎ T. S. Eliot, 1888—1965，美国诗人，批评家和剧作家。1935年，英国诗人赫伯特·瑞德（Herbert Read）请格林去与艾略特共进晚餐，格林当时在一封信中写道："这让人觉得害怕，就像是单独与亨利·詹姆斯吃饭一样。"四十五年后，格林在回忆录《逃避之路》中重新说起此事，他说："这就像是接到柯勒律支的邀请信，信中说，华兹华斯也会来，其他没有旁人。"

9 ◎ 艾略特的这一段话一直让格林铭记在心："大多数人只有一点点生命力，要唤醒他们的精神是一项极大的责任；只有当他们完全被唤醒时他们才能真正为善，但是同时，他们也就被赋予了为恶的能力。"格林曾经在文章中多次引用过这段话。

10 ◎ Evelyn Waugh, 1902—1966，英国作家，格林的好友。两人都是天主教徒，但是沃比格林更虔诚，更传统。他们的政治观点很不同，但是这不妨碍他们成为一生的好友，他们写过许多文章互相评论对方的作品。

那一帮的首领奥登却逃跑了。我们仔细搜寻他藏身的那片灌木丛。因为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所以我用一把厨房菜刀武装自己。他突然冲将出来,向近处的一所房子飞奔过去。他已经被伊夫林·沃击中,伤口还在流血。

我追上他,把菜刀扎进他的身体,但这好像丝毫没有伤害他,相反,他开始与我进行一场文学辩论,奇怪的是,辩论的内容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第二天晚上我发现自己与奥登同在一个晚会上,这次的谈话内容我能记得。我表示我更愿意住在英国,而不是美国,因为英国文学比美国文学丰富。莎士比亚让所有其他作家都成了小矮人,小矮人们是不会相互嫉妒的。美国文学因为没有这样的巨人,所以就滋生了嫉妒。

奥登回答说他对生活在美国还算满意。虽然他不是科学家,但是他在大学的科学院中有一个教职。他给人的印象是慵懒之辈,身体喜欢往后仰靠在椅子里。

我说:"如果你能发明科学上的一个什么小定律,那该多好,这样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奥登数码'了。"

我们的女主人起身离开,她说:"请随便饮用酒水。"我们俩都认为我们应该选一大瓶威士忌,瓶子

越大，就越表明我们对女主人盛情的感激。

## D. H. 劳伦斯[11]

麦保罗公爵介绍我认识了劳伦斯。他比我想象的要年轻英俊。他对我的作品评价不错。

## 萨特

我曾经与萨特进行过一场讨论。我记下了各种要问他的问题，我想尽量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向他道歉说我的法语不够好，有时候辞不达意。但是萨特友善地说："你的法语很不错，"他又说，"只是我一句都听不懂。"

然后他的态度变得很亲切，他提起我的一本由罗伯特·朗坊(Robert Laffont)在法国出版的书，此书的英文题目是《布莱顿硬糖之起源》[12]。这是一本用棕色油墨印成的孩子气的手稿的复制品——里面的角色主要是动物——插图是比阿特丽克斯·波特画的。萨特对她的插图很欣赏，但是对于我的文字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 索尔仁尼琴[13]

1976 年的一天我遇到索尔仁尼琴，与我同去的

11 ◎ D. H. Lawrence, 1885—1930，英国作家，格林对他的评价并不很高，觉得他的长篇小说中只有《恋爱中的女人》最好，其他都一般，但他认为劳伦斯的短篇小说和诗作都是上乘之作。

12 ◎ *The Origin of Brighton Rock*，此书不存在。《布莱顿硬糖》(*Brighton Rock*)，格林的长篇小说，出版于 1938 年。

13 ◎ Alex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苏联小说家，曾参加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74 年被驱逐出苏联，定居美国，197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人说他正想要编辑出版一本新杂志，我建议说他前六期应该向索尔仁尼琴约稿。这人很无礼地回答说他无法忍受索的小眼睛和他伪善的道德高调。

在另一个场合我为索尔仁尼琴安排了一个晚会，他好像更是以画家而不是小说家而知名。晚会是在我莫斯科的寓所里举行的[14]，寓所挂满了画，走廊上也不例外。他迟迟未到，我怀疑他是否能得到前来赴会的许可。我把门微开着，表示我们不害怕。我也不知道他是否会喜欢这个晚会，因为周围有这么多喋喋不休的女士们。

一个矮壮的大胡子男人来到门口，我认出他是克格勃的。我以为我们惹了麻烦，后来我看到索尔仁尼琴与他在一起，衣着很不合身。那个大胡子男人还带着几个孩子来，送来了画家以后，他转身下楼。我追上他，出于礼貌问他是否要喝一杯茶。他说不，但问我能否给他的孩子们一些糖块……几天前我刚刚给我的孙子们买过一包糖，我从里面取出几块给他们。突然他对墙上的画感了兴趣。"它们真可爱。"他说，我一时觉得他要因为渴望和怀旧而哭泣。我带他来到走廊，给他看一些其他的画。我想指给他看一幅索尔仁尼琴的大画，想告诉他他的囚犯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但是那张画突然不见了——我只能找到一张小的。

14◎ 格林曾经于1957年、1960年、1986年、1987年去过莫斯科，他20世纪70年代不曾去过那里，也不可能在那里有个公寓。

我有意没有带他去那个挂满了新艺术[15]作品的房间。

## 埃德加·华莱士[16]

我只与华莱士见过一面，那是在一次晚会上，他说他更喜欢自己关于澳大利亚的小说，但是这些小说并不成功，因为它们得罪了英国读者。我问起他的精装本的版权，他说他的出版社科林斯(Collins)正要拍卖这些版权。我们一起离开晚会，他开玩笑地问我是否散布过有关他和 E. M. 福斯特发生性关系的谣言。我否认了，并且说，我以为他和哈密什·汉米尔顿的关系才是真正的故事。

15 ◎ Art Nouveau，1890—1910年间流行于欧洲和美国的一种装饰艺术风格，以曲折有致的线条为其特色，主要表现于建筑、市内装饰和插图艺术上。

16 ◎ Edgar Wallace，1875—1932，英国惊险小说作家。

## 三 特务工作

在普通世界中，我曾经在英国情报六局坐过三年办公室[1]，相比起来，我在我自己的世界中为情报六局进行的特务工作要有趣得多。奇怪的是，我在普通世界中认识的十几个人中，只有两位进入了我现在所写的世界。所以，《国家机密法》可能也控制着那里。我所经历的最为冒险的要算我在德国的任务，那更像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而不是英国情报六局工作。

那是一间家具很富丽堂皇的客厅，戈培尔坐在一把镀金的椅子上，房间里还有其他几个人，所以我站在一个大理石的壁炉旁伺机行事。我携带着暗杀戈培尔的致命武器——那是一根香烟，它的烟气一经吸入，就能将人迅速地置于死地。

我尽量向我的目标靠拢，手持着香烟，想让冒着烟的一头接近他。我渐渐失去了耐心，把香烟的一端

1 ◎ 格林的间谍活动，详见导读。

直戳向他的鼻孔，然后逃离客厅。我希望毒气能很快生效，一团混乱会推迟他们对我的追踪。

街上很空荡，我向右转上另一条街——然后，我意识到别人可能从窗子里看到我，我又折回去，为了不被人看见，尽量沿着墙根走，然后向左转。我穿过好几条小路，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了大路上，因为我接到的指令是到北站去乘一辆火车。我看不见士兵或是警察，他们可能就在前头等着我。

我想要转进一个公园里去，因为那里有长长的通道，但是我还是遵守了命令，刹那间火车站就出现在我眼前——那是一个很小的火车分站。我找到了接头人，一辆火车已经开进来。我买了两张到终点的火车票，但是很快意识到我犯了个大错，因为火车的终点是沃平[2]。到沃平的火车票当然会暴露我作为英国特工的身份。沃平前面那一站是边境，我敢肯定他们会在那里逮捕我。但是我们还是安全到达了终点，否则我也不会在这里讲这个故事了。

∽

我获悉一些有关金·费尔比[3]的新材料。他征募了海明威，让他收集有关香港难民的资料。海明威手头非常拮据，这个工作每周付他五英镑，这正是他的家人所急需的。

2 ◎ Wapping，英国南部的一个小镇。

3 ◎ Harold (Kim) Philby，1912—1988，双料间谍，曾为英国情报六局特工，但同时也为苏联提供情报，1963年叛逃到苏联，获列宁勋章。格林与费尔比的关系，详见导读。

∽

1980 年我在一个很盛大的晚会上遇见一位俄国大使，离开前我与他说了话，我问他是否愿意读一篇我写的批评英国情报六局的文章。他答应了。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叛徒——我觉得他阅读此文对两边都是件好事。

∽

一次我坐飞机去达喀尔，我在飞机场上给英国情报六局在那里的代表发了电报，告诉他我第二天早上到达，当时，飞机场上有些混乱。从达喀尔我要转机到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4]，那里的代表是特雷弗·威尔逊[5]，上次世界大战时我就认识他，他也与我同在越南待过。我正巧听到电话串线，有一个官员在电话上要一张我的照片——据说中国新闻社能够提供一张。我安慰自己说："他们的照片会让我看上去像一个中国人。"

∽

在伦敦，我和其他一些人在一个大房间里工作，那个房间像我在《泰晤士报》做编辑时的办公室[6]。我正在调查一位双面间谍，他与一个名叫塞基的德国间谍有牵连。有人告诉我英国情报六局的头头 C[7] 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当着许多同事的面直接给他打电话，这让我很自豪。

4 ◎ Freetown，二战期间格林就是在那里为英国军事情报六局工作。

5 ◎ Trevor Wilson，格林好朋友，天主教徒，二战时曾一同与格林在英国军事情报六局 Kim Philby 手下工作，50 年代他是英国驻越南河内的领事，是他向格林介绍了越南，带着格林去逛越南的鸦片馆和妓院。后来在越南的法国政府怀疑他是英国军事情报六局派驻越南的间谍而把他驱逐出境。

6 ◎ 格林于 1926—1930 年间在《泰晤士报》任编辑，这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所以一直印象很深。

7 ◎ 英国情报六局的局长都是自称为 C，因为 MI6 是 1911 年由 Mansfield Cumming 上校建立的，当时 Cumming 对他的手下人一直自称 C，后来就成了习惯。

我的顶头上司与我20年代在《泰晤士报》工作时的编辑部主任乔治·安德森[8]长得非常像，他对我说："我怀疑他是否会和你通话，他刚刚要了一杯红酒。"但是C确实与我通了话，而且一上来就感叹上星期《旁观者》和《新政治家》两本周刊上的文章恶语伤人。我对他说："如果他们不能证明事实的话，我们就要起诉他们，对这个星期的文章也一样处理。"

C下楼来看我——他是个小个子男人，身材瘦削，态度和蔼，戴着单片眼镜。我的另一位同事——长得很像我在《泰晤士报》工作时的编辑部副主任莫德上校[9]——也来参加我们的谈话。我重述了在那星期的《新政治家》中，一篇文章说C的前任把写给外交部部长的机密文件留在桌子上任人阅读。

ഗ

1965年6月，我回到西非进行特务工作。在火车站我的行李被偷走了，小偷是一个我错以为是行李员的非洲人。我去办公室找站长，他是个英国人，一位典型的殖民官员。我问他："能和您说句话吗？"他粗暴地回答："现在不行。"

我非常生气，坚持要和他说话。我知道他不喜欢我，因为我在这个殖民地中的地位很不明确[10]。一个非洲人被带到我的面前，他穿着长长的白袍子，我说

8 ◎ George Anderson，1878—1951，苏格兰记者。格林刚刚开始在《泰晤士报》工作的第一个星期，对安德森非常不喜欢，以后的三年几乎爱上了他。在《一种生活》中，格林这样描写他的第一位上司："他是一个年长瘦小的苏格兰人，脸上血色很好，又有一种简洁的幽默，喜欢冷嘲热讽，新来的编辑总得拼命工作才行。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当起了小学生。每天下午五点半的到来总是很让人欣喜，因为时钟一敲到那个点上，酒吧就开门了，他就会从衣架上取下他的黑色圆礼帽，下面半个小时他就消失在他最喜欢的酒吧里了。"就像格林自己，安德森严厉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种比较害羞的性格，其实是非常平易近人，是能交为好友的那种人。他自己也是位诗人，而且非常鼓励年轻人写作，年轻的格林总是不停地在写东西，这很让他高兴。

他肯定不是小偷，因为他和我乘坐的是同一班火车。我问他是否注意到什么。就在那时，我从眼角看到一个和小偷一样穿着格子衬衫的人。

“就是他。”我说。但是当他转过身来时，我才发现他是一个消瘦的白人。

∽

那年的下半年我在土耳其为英国情报六局工作，我惹了很大的麻烦。我要求增加工资，这带来了一连串有关我的调查。他们开始小心地问我一年买酒要花多少钱？我所有的酒都是在飞机场的免税商店里买的，所以，我能出示的价钱低于两百英镑，我想这让他们觉得可疑。

一位穿着制服的盖茨将军刚从伦敦调来，他在我们平时闲坐的大客厅里踱着方步介绍他自己。我的情妇和我在一起，她很漂亮，穿着件很昂贵的毛皮上衣。我说：“问题不在于我是否乱花钱——如果我不干特工打道回家的话，我能赚更多的钱。”

我感觉到他们怀疑我有变节行为，将军最后走到了我的面前，他冷冷地伸出两根手指。他说他要给我们读一个名单，上面列出的是那些工作不能让人满意的人。

为了表达我不屈不挠的态度，我起身离开，我注意到我的情妇还在和我的一个同事聊天。将军要当

9 ◎ Colonel Maude，格林曾在《一种生活》中称他：“一个很有礼貌的人，非常高大，瘦削，留着柔软的金黄色的小胡子。”

10 ◎ 1942 年，格林在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从事间谍工作时，常常感觉到自己身份不明确，他不属于殖民地的办公室，不属于商业部，他的名字是挂在警察总局的，但是他又很少去那里上班。

着她的面开始讲话，这让人奇怪。也许将军以为她是我的夫人，已经经过了严格的审查。

一个女人拦住我的去路："你要到哪里去？"

"出去买东西。"

那女人满面怀疑地看着我的情妇，她大概在琢磨我工资这么低，怎么养得起这样一个情妇？她说："埃及向我们发了个请求，他们要你去那里工作，因为你对开罗很了解。"

"这就奇怪了，"我说，"我对开罗一无所知。我只是在那里换过一次飞机。"看着这个女人，我觉得英国情报六局肯定是想在那里把我给谋杀了。

我决定在土耳其申请政治避难，我去了移民局，但是他们拒绝帮助我。我请他们慎重考虑一下，我告诉他们我已经花了五百英镑贿赂他们的头目，我给他们看了证据。

事态平息下来后，我作为英国情报六局的特工被派往法属的一个热带城市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工作。一个我称之为 M 的高级官员来检查工作。我有些不友好地说他是那种典型的特工人员——"一个狡猾的商人和一个少校的杂交品"。

如同平常一样，我的工作就是要让别人觉得我很忙，我们给 M 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旅馆里。有人举手与我们打招呼，这给我一个机会，我对 M 说："他是这里的殖民地长官，我在西贡就认识他。"

"他当时是不是我们的特工？"

"他那时应该是吧。"

我接着说对于我们掌握的这个城市的建设情况,这人可能会很有用处。

“法国人正在建造这个城市吗？”他问我。我建议说我们可以晚上一起开车出去,去看看这里的一个名叫西瓦纳的欧洲区。

ഗ

在另一个场合，我在朋友L的帮助下打点行李,L与我在同一个特务机关里工作。我说我应该带一些很薄的衣服,因为我的任务会要求我直接从美国飞往萨摩亚群岛。L说:“你会有时间大肆采购一番的。”我因他们派给我这个任务而骄傲且兴奋。在检票口我出示了机票。“费城8号。”空中小姐说,我觉得她的脸上有一丝怜悯之情。两个男人上前来,要搭我的车去飞机场。我能感觉到一种危险,但是我又没有理由拒绝他们,而且,我也确实想接受这个挑战。他们与我同时离开大楼,一左一右走在我身边,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一点都记不清了。

ഗ

1980年1月,金·费尔比秘密到伦敦来看我。他看上去与我记忆中的很不一样——他有些鬼鬼祟祟,贼眉鼠眼,我有些失望。他带来一篇他为《旁观者》写的文章,写得还真不错。他从哈瓦那搭乘一艘英国船回来,我问他难道不担心在船上被逮捕吗？——他含糊其辞地告诉我说他现在已经没事了。但是他临走时仍然接受了我的建议,让我走在他前面。他看到有个人从一个房间里来到走廊上,这人很危险。

∽

我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在德国做间谍，我们打扮成德国军官的模样。我们对这一使命很掉以轻心，逃离时，我们乘坐的是一列经过瑞士边境的火车。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要求我们出示证件，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不安。我的同事比我的级别要高，对她说我们的证件都打在行李中了，她接受了我们的借口，只是用铅笔在我们的车票上写了75这个数字。但是到了边境处我们遇到了些困难，我们应该出示护照——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掌管护照的官员是一个傲慢的家伙，显然不像年轻女人那么容易对付。但是，他那长相丑陋的中年妻子是站在我们一边的，而且，在家里肯定是她掌权。她简单地告诉他说，护照已经被检查过了。

∽

我的哥哥雷蒙德[11]和我一起在汉堡进行反纳粹的间谍工作。我们当时住在一个旅馆的七楼，旅馆的一个雇员给我们捎来口信，说警察原本要来搜查旅馆，因为他们怀疑这里有异常情况，但是这个雇员已经说服了他们放弃搜查。我们觉得还是应该离开。但是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两个粗鲁凶暴的警察冲进房间，他们要我们出示证件。我不清楚雷蒙德会找什么借口，但我知道英国护照会完全暴露我们的身份，

11 ◎ Raymond Greene，1901—1982，格林的二哥，医生，而且以登山运动著称。兄弟俩年轻时充满竞争，详见导读。

12 ◎ John Hayward，1905—1965，格林好友，学者，批评家，曾经编过《企鹅诗集》，《藏书家》杂志的主编，人长得奇丑，而且残废得很厉害。

所以我就等着看他会说什么，同时，我也假装寻找我的证件。也许确实是雷蒙德想到了这个计策，我们抢下他们的枪，猛击他们的头部，把他们的尸体塞进一个壁橱里，然后离开。

我们唯一的希望是乘飞机逃离，但是如果我们去乘一般的飞机的话，他们肯定又要看我们的证件。私人飞机需要支付昂贵的价钱，但是雷蒙德知道应该与谁联系。为了不被发现，我们快速弯腰经过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坐满了人——显然都是政府雇员们。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一个瘦小佝偻，一只手弯曲瘫痪的人——有些像我刚刚去世的朋友约翰·海沃德[12]——正在读书。我们从容地坐在椅子上，尽量制造出一种一切正常的效果。雷蒙德提出我们要租一架飞机，但是，很长时间那个人对我们不理不睬。但是他突然开始行动，他带着我们跑过一道机场的通道，来到一架直升飞机前。他的一个手下过快启动了螺旋桨而受到他的训斥。我先爬进去，雷蒙德跟在我后面，然后是我们那个一只手瘫痪的飞行员。我们直飞上去，我看到整个城市在我们下面——我们安全了。

# 四

## 政治家和政客

为了礼貌起见，我对这两类人不加区分，因为政治家也可能是政客。在普通世界中，我遇见过好几位政治领袖，除一个外（吴庭艳总统），其他的我都很有好感——胡志明[1]，丹尼尔·奥尔特加[2]，阿连德[3]，卡斯特罗[4]，密特朗总统和戈尔巴乔夫[5]。但是他们很少造访我自己的世界。

1◎ Ho Chi-Minh, 1892—1969,1954—1955 年任越南总理, 1954—1969 年任国家主席。格林在 50 年代曾多次去过越南, 1954 年那次曾与胡志明见面。

2◎ Daniel Ortega, 1946—, 1985—1990 年间任尼加拉瓜总统。80 年代, 格林曾三次去尼加拉瓜, 1987 年, 奥尔特加总统授予格林最高独立文化勋章, 因为他"支持尼加拉瓜的民族权利, 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

### 威尔逊先生

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是 1964 年，威尔逊一家刚吃过晚饭，首相坐在他的铜床架上放松休息。他与我说话，仿佛是进行演讲一样，说他要对贫民区进行一次大清除。我想要消一下他的政治气焰。

“你如何安排那些居民们的住处？”我问他，“如果这里是热带，你可以让他们住帐篷，但是这里是英国，而且冬天快到了。”

“我会让他们临时住在公共建筑里，如市政厅之类。”

“你觉得他们会满意吗？现在他们几家使用一个厕所，在你的新政策下，他们会几百人使用一个厕所。”

我记不清他的回答是什么。

## 戴高乐将军

对于戴高乐将军我只有很短暂的印象，在普通世界的二战期间他曾在伯克汉姆斯特住过一段时间，那里是我的出生地。

我正在分发限量分配的面包，我上前递给他他的一份。我问他：“将军，您想要面包皮还是面包屑？”这时，我看到我手中的面包实在所剩不多了。“还是两个都给您吧。”我说，把剩下的都给了他。

## 赫鲁晓夫

虽然赫鲁晓夫侵略了匈牙利，但是在普通世界中，我总是对他持有好感。在古巴危机中，他在与肯尼迪的讨价还价中占了上风——交换条件是美国不再入侵古巴，苏联不再向古巴提供防御性核武器，反正这些武器最远只能打到迈阿密。在一次联合国

3 ◎ Salvador Allende, 1908—1973, 1970—1973 年间任智利总统，试图在智利建立一个具有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1973 年死于皮诺切特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1971 年和 1972 年，格林两次去智利，第一次去后，他在给情人凯瑟琳的信中谈到阿连德，说："我很喜欢他，他和费德罗［卡斯特罗］不一样。"第二次去，他也受到了很隆重的接待，这次，格林与阿连德已经成为好朋友。

4 ◎ Fidel Castro, 1926—，1959—1976 年间任古巴首相，1976 年到至今任古巴总统。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格林曾六次去古巴，为他的小说《哈瓦那特派员》做研究，拍电影，为各种报纸做采访。他写了许多支持古巴的文章，所以被古巴政府视为朋友。1967 年，格林受《星期日电讯报》之约再次去古巴，格林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英国大使为他准备了道别的晚宴，但是宴会还没有开始，卡斯特罗派人

的会议上，他用鞋子大敲桌面，我喜欢他的这种作为。1964 年和 1965 年,我曾在我自己的世界中与他相会,也许因此我对他颇有好感。

我第一次与他会面是在萨伏伊饭店，与另一群俄国人一起,其中有一位柴可夫斯基先生,普通世界中,我曾经在莫斯科见过他,他当时是《外国文学》杂志的主编。赫鲁晓夫看上去情绪很好,健康,放松。他的两位客人因什么问题而大声争论，这让他觉得很好玩。我们一起讨论了在英国拍摄电影筹集资金的办法,并说起发行商的坏影响。我说这种困难在俄国不会存在,但是赫鲁晓夫说俄国的电影往往会超支,所以常常会被拖延六个月，拍摄人员要等着政府官僚为他们增加预算。他非常热情,请我第二天与他共进午餐。

另一个场合(因为我对那顿午餐毫无记忆),我在一个晚宴上与他坐在一起，直到晚宴快结束时他才与我说话,他说我的盘子上剩了许多鸡肉。“这是留给厨房里工作的人的,”我说,“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应该相信慈善。”

“不是罗马教廷的那种慈善。”他微笑着回答。

也许因为他对我们的这次对话有所记忆，我们又在一次晚宴上相遇了,这天是星期五,他看看我的盘子,我在吃牛肉。他笑着评论道:“你在星期五也吃

来接格林.格林与卡斯特罗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大使非常嫉妒.因为他总共还没有与卡斯特罗说过两句话。格林对卡斯特罗一直非常喜欢而且很景仰。格林在古巴得到的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不仅可以任意使用一辆车.还有一架军用飞机供他使用。他可以在古巴任意旅行.但是有时他抱怨他们给他看了太多的农场和新学校。

5 ◎ Mikhail Gorbachev，1931—，1988—1991 年任前苏联总统.80 年代.格林应戈尔巴乔夫之邀访问前苏联，他们见面时.戈尔巴乔夫握着格林的手说：“我已经认识您许多年了。”

肉？我以为你是个天主教徒呢。”

我们最后一次会面时，他正亲自处理去苏联的签证。他注意到我所填写的职业是作家，他说他希望我能写一些关于他们国家的文章。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非常清澈，非常蓝。等我回到我的朋友们身边时，我对他们说：“你如果很近地看他，他有一张很漂亮的脸，一张圣徒的脸。”

后来我发现我对他的看法在莫斯科得不到普遍的赞同。有一天我在克里姆林宫外，那里聚满了人，宫前支起了一个讲台，人们等着他们的领袖们出现。在另一个讲台上，一个年轻人开始对着公众说话，他开着赫鲁晓夫的玩笑，并且模仿着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赫鲁晓夫从口袋里取出大把卢布撒在地上，表示卢布毫无价值。

奇怪的是，我自己的世界常常要受到普通世界的影响。J.W. 邓恩可能会在他的《时间的实验》中这样阐述：当我梦到赫鲁晓夫有一张“圣徒”(死去的人)的脸时，我已经预感到他将要下台。1964 年10 月15 日，我是在萨伏伊宾馆里听到苏联大选的广播的——九天之前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曾在同一宾馆中与赫鲁晓夫共进晚餐。

## 奥马尔·托里霍斯[6]

在一次逗留巴拿马时，我发现已经成为我的好友的奥马尔·托里霍斯不在那里，这让我很惊奇，因为我们有约在先。最后他总算来了，我注意到他改变了许多。我带了我的女儿作为翻译，但是他已经学会说一些英文。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很无趣的英国大兵，名叫丹尼斯顿将军。还有一些其他人也来凑趣——有几位美国人，包括一个制服不整的滑稽的士兵，他借给我一本他出版了的日记，破烂不堪，我根本不打算阅读。我在那里是为了要警告奥马尔美国的一个阴谋诡计，他们要强制他离开巴拿马。美国人计划要煽动混乱，从而赶他出去，这样巴拿马就会像加勒比海的其他岛屿一样，变成美国用以对付中美洲的军事基地。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让奥马尔听明白这一阴谋。

## 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7]

在 1965 年 11 月，我与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在他牛津的家里共度了一个让人很不愉快的周末。我不喜欢他的圆滑，他的外交官的举止，还有他的丝绸睡袍（虽然与我自己的几乎没有区别），他的丝绸衬衫，上面用淡蓝色的线绣着“霍姆侯爵”，这是一

6 ◎ Omar Torrijos，1929—1981，巴拿马将军，1968—1978 年间任巴拿马总统，1981 年因飞机失事而丧生（许多人认为那不是事故，而是谋杀）。托里霍斯是卡斯特罗的朋友，托里霍斯也知道格林向来站在反对美国的立场上，所以，1976 年，他邀请格林访问巴拿马，并为他买了头等舱的机票，以后四年间，他又去巴拿马四次，这期间，他写了一系列文章。1981 年托里霍斯飞机失事时，格林正在打点去巴拿马的行装。1983 年格林再去巴拿马，到达托里霍斯飞机场时，格林说：“看到那些巨大的死去的字母纪念着他的名字，我的悲伤远远大于高兴。”同一年，他被授予巴拿马最高级国家勋章。格林于 1984 年出版了《熟悉将军》（*Getting to know the General*）回忆他们俩的关系。

7 ◎ Sir Alec Douglas-Home，1903—199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63—1964 年间任英国首相。

个非常奇怪的错误。一个印度朋友给我带来好几条关于阿拉哈巴德的激进分子的动乱的消息，我给他看了，他坚决反对我到印度去，因为“那个地方无可救药”。

我住在他家的第二天晚上，我从一个晚会上跳舞归来，已经是早上四点。我极少跳舞，一位老朋友先是教我华尔兹，后来又教我探戈，非常不成功。我回到霍姆家时，发现他的卧室的灯仍亮着，男用人正在清扫地板，大吊灯坠落下来，满地碎片。

“幸运的是这盏吊灯没有砸在你的头上。”我说道。

“这还用得着你说吗。”亚历克爵士说，口气里有种冷冰冰的满足。

我的睡衣刚被男用人洗过，正在晾干，我冲过去取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知是如何发生的)，亚历克爵士的睡衣被我用透明胶带给粘住了。

也许是因为如此，我离开这所房子走向三一学院，在宽街的拐角处大雨倾盆而下。我肯定是迷路了，因为我发现自己站在一个被大水包围着的炮弹坑里。几英尺外好像是地面，拉尔夫·理查森[8]正巧在附近，他自告奋勇去试一下地面，但是他却消失在水下面了。我能看到几英寸下他的头顶，他从水里浮上来，抱怨水太冷了。我最后还是设法跳到了干土的

8◎ Ralph Richardson，1902—1983，英国戏剧电影演员，曾经在《安娜·卡列尼娜》、《玩偶之家》中担任主角。1959年，他在根据格林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哈瓦那特派员》中扮演角色，1964年，他在格林的话剧《刻雕像》中担任主角，此剧很不成功，格林怪罪理查森，详见导读。

地面上。

我往前又走了一程,亚历克爵士过来与我同行。他肯定是听到了我离开的声响，但是很快我们俩又都陷进一个坑里。整个情景如此怪异,我开始记录下所发生的一切，但是我唯一能找到的纸是亚历克爵士随身携带的一英寸见方的卡片，用来书写显然太小。但是在外交部这种纸好像很平常,也许是哈利法克斯爵爷发明的，因为在其中一张上我看到印着他的名字。

总而言之,这样的周末我不想再重复。

## 爱德华·希斯

有一次,我与另一个首相爱德华·希斯度过了一个夜晚，很令人愉快。希斯问我有关智利的情况,我向他描述了萨尔瓦多·阿连德,并且说了我对其政府中的共产党员们的好印象。

我借给希斯我的新小说的打印手稿，那个晚上他断断续续把手稿读完了。

我们去一家酒吧，一个老人向希斯说起他在军队里的儿子,说他多么希望儿子在过节时能回家来,希斯介绍他自己说:“我是爱德华·希斯阁下。”他的这种介绍让我觉得很古怪有趣。他问了这人他儿子的部队编号,但是老人记不起来了。希斯让他第二天

9 ◎ David Selznick, 1902—1965，美国电影制片商。

10 ◎ Yuri Andropov，1914—1984，1982—1984 年间任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11 ◎ Alfred Edward Housman，1859—1936，英国诗人，拉丁文学者。

给他的秘书打电话，他会酌情安排。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希斯，这出乎我的意料。

希斯正要任命一位驻苏格兰的大使，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他问了我，我也拒绝了。但是当我在报纸上读到没人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时，我去找他，告诉他说我愿意接受这个工作。

他看上去很疲倦，对我抱着怀疑态度。我解释说我起先拒绝他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但是我会尽力而为。作为友谊的象征我们同去一条满是泥巴的河里游泳，为了表示我对新工作的热情，我建议说我们应该在苏格兰举行一个世界纺织品交易会。他回答说，戴维·塞尔兹尼克[9]有一次告诉他说这样的交易会从长远来说可能会有些好处，但是上次的交易会摧毁了许多当地小企业。

## 尤里·安德罗波夫[10]

大约在我与赫鲁晓夫见面的七年之后，我遇见了当时克格勃的首领尤里·安德罗波夫。他刚刚生过一场大病，在去斯德哥尔摩参加解除武装和平大会的途中经过伦敦。他请我替他作笔记，我视之为殊荣。我喜欢他，他的身材非常高大，右手有些问题，常常会让人担心地抖动。我记得他告诉我他对 A.E. 豪斯曼[11]的诗作极为敬仰。

## 密特朗

1983 年 12 月，我和密特朗总统在伦敦有个短暂的会面。他正穿过海德公园去派定顿火车站。我告诉他我实在不喜欢希拉克，我正要加上说我很不喜欢吉斯卡尔·德斯坦[12]时，吉斯卡尔过来与我们同行。

## 菲德尔·卡斯特罗

1984 年 6 月我去古巴拜访卡斯特罗。我们一起散步，友好地聊着天，我们停在一个正在哭泣的可怜的男人面前。他刚刚在他亲手挖的小小的墓穴中掩埋了一个孩子。

卡斯特罗试图宽慰他，对他说现在他的孩子不会再受任何痛苦了。但是那个人并没因此而得到安慰。我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他马上停止了哭泣并且握住了我的手。他说："我能感觉到你是那种相信人死后还可能有着什么的人。"

## 胡志明

去拜访胡志明主席，我发现他非常谦恭，他向我解释他上次拒绝了我的拜访的原因，因为他确有难处。他邀我去他总部周围的乡间散步。我们必须对美

12 ◎ Giscard d'Estaing，1926— ，1962 年创建法国独立共和党，曾任财政部长，1974—1981 年间任法国总统，主张法国"加强威慑力量"，建立"邦联"式的欧洲以及缓和东西方关系，倡导"南北对话"、"欧洲对话"。

国轰炸机时时睁大警惕的双眼。一架直升飞机接近我们，我怀疑那是美国人的，但是原来它是“我们”的。它降落下来，一个年轻漂亮的欧洲女人从飞机里出来，她独自走开了。“她没有危险吧？”我问胡志明。他对她大叫：“回来，你不知道我手下的人会想对你做些什么。”

## 奥立弗·克伦威尔

在我住着的公寓外的街上有许多嘈杂声——部队的号令等等，这可很不同寻常。我打开广播，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没有结果，因为还没有到播送新闻的时间。我出去，看到正在街上走着的奥立弗·克伦威尔。我意识到他曾一度被人描写成一只螃蟹投下的影子。我没有想到会看到他，因为这一刻军队正在投票赞成或反对他对查理一世处以死刑的决定。他坐在一群人中，开始与他们说法语。他说查理其实可以说是被君权神授的教条给处死的。如果没有这个教条的话，那么妥协还是有可能的。投票的结果出来了——只有一个老军官投票反对克伦威尔。克伦威尔说：“他只想震动神殿，而不是摧毁神殿，这将带来灾难。”

# 五

# 战争

回到伯克汉姆斯特以后我才得知，英国政府允许美国政府在凌晨四点空降四百个伞兵，他们将占领整个小镇，目的是为了捉拿我。那时已经快到午夜时分，我千方百计想找一个能躲藏的地方。我与两个很友好的警察核对时间，一个说也许美军们会遭到一些抵抗。

“不会的，”我争辩道，“他们的表现会非常出色，他们还可能会给孩子们带来气球。”

我回到我的房间里，想处理掉那个肯定会背叛我的护照。空降提早到午夜时进行了，我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已经被逮捕。我对那个看管我的美国便衣说：“等我从这里出去，我会狠狠地揍你一顿——我还从来没有打过一个警察呢。”

一个声音从我身后传来：“你真的以前从来没有打过一个警察？”我回过头去，看到我的老朋友克劳

1 ◎ Claud Cockburn, 1904—1981, 格林自幼的好友，英国记者，因亲苏倾向而有争议，小说家伊夫林·沃的表弟，出生于中国。

德·科伯恩[1]，他也被逮捕了。

我们从窗子里看着美国的军队。我暗暗希望他们会因抢劫强奸丢尽脸面，但是让我失望的是他们的行为无可挑剔。

∽

1965 年 2 月，空炸之后，德国伞兵降落到我所居住的伦敦的那个区。我和一个朋友试图开车逃离，但我一时疏忽，留下了一封泄露间谍机密活动的信。逃离的途中我们遇到两个德国士兵，但是他们没有要我们停下。但是随即我们看到其他士兵向我们走来，我们想要往回开并转弯，但很明显，这个错误引起了我们旁边的士兵的怀疑，我们被逮捕了。他们显然掌握着有关我的所有材料，包括一张用秘密照相机拍摄的我和一个德国人在一家旅馆中会面的照片，我记得我曾于 1924 年在占领区见过这个德国人。他们还有一盘录着我们的声音的磁带。现在真到完蛋的时候了，在酷刑室里我只能听天由命，从理性上说，我又有一种好奇心，想知道我能承受多久。他们还有一张我全身的 X 光照片，这对他们也会有帮助。

∽

1965 年 6 月 23 日，德军大举入侵，他们从伦敦南部大面积进入。我和一个朋友合用一架重型武

器——迫击炮——从他们的侧翼进行游击战。我们用这架迫击炮轰炸了德军的一个据点和好几百名士兵,一个军官向我们投了降。我们讨论下一步该如何行动,德国军队究竟是要进攻伦敦,还是要掐断伦敦和西部的联系?我们决定坐火车,后来我们意识到火车会开过德军占领区,在那里我们会被检查,但是为时已晚。

一个年轻的德国军官上来见我们,我用一把左轮手枪顶住他的脊背,命令他到厕所里去。我们想要夺取他的制服(我的同伴曾经用这种办法逃脱过)。但是门口还有一个德国兵,他的脸上露出胜利的表情,因为他已经拉了紧急停车的把手,火车停靠在一个明亮的弧光灯照耀下的站棚里。

突然,我从整个情景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旁观者。我站在棚子外面,看着一个人——我的朋友——怀抱着迫击炮冲将出去。他登上了一驾由一匹高头大马拉着的空马车,马车往前冲去,一时跃入空中。第二个人——显然是我自己——出来在马车后狂奔。

S

1966年,德国入侵之后六个月,内战爆发。我正在我的家乡伯克汉姆斯特,刚从公园散过步后回到镇上。我看到到处都散发着传单,内容显然是一次军事行动的密码。我记起我曾告诉过一个要好的女朋友我要离开英国到法国去生活,她开玩笑地对我说:"你会回来参加内战。"

接近车站时我看到天空上布满了许多架小型飞机和降落伞,颜色和传单的颜色一样。我快速走到城堡街,我发现许多降落的伞兵们跟在我身后,他们挤满了整条街。好像是法西斯们要接收此地,一

排士兵沿路过来,冲突不可避免,因为法西斯们是不会让步的,我希望我们的部队也不让步。最后我们的部队用刺刀挑死了没有武装的领头的法西斯们,这是一种大屠杀,我对这种残酷性毫无准备。

我躲进一所房子里,在那里我看到了当时的首相威尔逊。那里没有人想知道外面战争已经开始。威尔逊看上去很虚弱,担心,犹豫不决。他唯一的行动是到另一个房间去,不再被人打扰。

ᔕ

我曾在俘获希特勒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时刻让我非常自豪,我在一个火车站等火车时,看到两个男人下车。其中一位是德国情报部的将军,当我看到他的同伴时我敢肯定那是希特勒,虽然他的小胡子没有了,而且他的脸上有着更多皱纹,也更有人情味。我对着站在我周围的人大喊:“希特勒,希特勒还活着!”

那两个人走进一个地下通道,大家看着我,好像我发疯了。但是我继续大喊,那两人的逃亡之路被阻断了,希特勒回头愤怒地看着我。我们走到站台的一头,坐下来交谈了许久,谈话内容我已经记不得了。另外有几个人过来帮助看守住他,一队士兵前来把他押走了。

ᔕ

欧洲被德军占领,我要与一位反抗组织的领袖会面吃中饭,他曾亲手杀死过六位德国士兵。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我希望你并不赞同他的做法。”

我穿着城里人的衣服,戴着顶软帽走在乡下的一片开阔地上,我觉得很惹人眼目。一些德国士兵在操练,一个德国军官走在我后面。我担心他们会叫我停下来。我还看到一些民兵在操练。

在一个小镇的边上我惊讶地发现那里有一个海关关口，我无法避开，一个黑人士兵拦住了我，另一位负责的人上来问我有没有什么要申报。我说："两百根香烟。"他把香烟盒子打开，检查了里面的香烟，把他们退还给我，然后指示他手下的人说，如果香烟是"优雅适当"地申报过的话，就可以过关。所以，我前去吃那顿我认为是"危险"的中饭。

∽

我发现自己回到了马来半岛紧急状态的时期，这是我1951年时在普通世界中经历过的[2]。我正在躲避中国游击队，英国人要把他们轰炸出来，所以，我也可能成为英国炮火的牺牲品。这些轰炸员们使用一种很独特的系统，他们用电灯照亮地面，活着的人能给暴露出来，然后他们就投放炸弹。我伏在地上，我身边的一只灯泡马上亮了。我把它扔到黑暗里去，然后爬走，但是一旦我停下来，另一只灯泡又亮了。要躲避炸弹简直是不可能。但是最后不知怎么我还是逃走了，我加入了另一群没有正式编号的英国人中去寻找游击队。

∽

当普通世界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时，我只有九岁。但是，我自己的世界中的1914年却非常不同。

大战一开始，英国军队就一败涂地，法国陆军元

2◎ 1951年初，格林在马来西亚，当时正是英国人所称的马来西亚的"紧急状况"时期，共产党游击队则称这段时期为"痛打走狗"的时期，"走狗"指的是那些仍然效忠英国殖民者的人。

3◎ Wilfred Owen, 1893—1918，英国诗人，其诗歌充满反战情绪，表现对战争的愤怒和对战死者的哀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前夕死于战场。

帅无条件投降，他和另一位名叫胡里亚的元帅一起被擒成了俘虏。他们的夫人们被允许与他们同住在囚禁之处，这对他们的士气大有帮助。胡里亚元帅的夫人还给他带去了一种电子仪器，这样他可以"有所事事"打发时间。在这样的惨败之后我们如何还能最后取胜，实在让我不解。

ᔕ

这是我第一次在我自己的世界中变成另一个人，我是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3]。我穿着军官的制服，头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钢盔。我独自一人待在战壕里，对着我所爱着的一位姑娘的照片朗诵我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是《奇冯镇》，我想那是我所在部队控制着的一个地方。我大声朗读着，这首诗是这样的：

想象，我亲爱的，这个浅浅的战壕，
一个无法攻破的堡垒
这一夜以及无数的夜

突然，一种对于无休无止的战争的疲倦袭击了我的全身，我开始哭泣。正当我——其实是威尔弗雷德·欧文——哭着时，有一个声音说："德国人刚刚在这一段和那一段都投下了毒气弹。"

# 六

## 危险和恐惧的时刻

我刚刚在海地的王子港度过了很危险的一天[1]。我和我的朋友特立弗·威尔逊在一起，他曾经是英国情报六局的特工，我上次见到他时他是河内的领事。我们俩一着陆就立即被逮捕了。看管我的黑人警察特别喜欢阅读主角叫班比的少年读物。我随便翻阅了一本，那页描写了班比正要被天堂王母诱惑，描写夸张并且充满情色。

我许诺此人我将为他搞到全套十七本小说，他迅速让我坐在一把残疾人的椅子上，在我头上盖上一块白布，把我弄出了监狱。而且我也设法救出了特立弗，我们快速顺路跑去，很快到了英国大使馆所在的街道，想到那里去寻求庇护。大使和大使夫人刚刚野餐回来，他们的态度冰冷，不感兴趣，这让我觉得很受伤害。他们以前在圣多明哥时我就认识他们。当然，大使是永远不想搅入任何麻烦的。

1◎ 格林曾经三次去过海地，前两次是 1954 年和 1956 年，那是在独裁总统杜瓦利埃统治海地之前，1957 年杜瓦利埃上台后，在海地实行将巫术和血腥高压相结合的政策，建立私人卫队镇压异己，臭名昭著。格林决定铤而走险，1963 年 8 月，他第三次来到海地，海地已经与他记忆中的完全不同，充满饥荒，反对总统的人不但要被处于死刑，而且不许收尸。格林后来依据他三次海地之行的经验写出《喜剧演员》，对杜瓦利埃的独裁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还有一次我在海地时，我正在旅馆的厕所里大便，有人告诉我说一个海军上将和一个将军正等着见我。我很快上完厕所去见他们。他们的制服和上面的装饰很滑稽可笑，但是他们看上去很诚挚。他们告诉我说很快这里就会有一场革命，“你和你的朋友们最好尽快离开，如果你们注意到什么异常情况请赶快躲起来。你们有鞋子——鞋子可以当成贿赂品。人们非常需要鞋子，他们会把你们藏起来。”

“那您呢？”我问那位将军。

他的回答充满了尊严：“我将死去，没有人会把我藏起来。”

重读60年代所记录的我自己的世界里的生活，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回到海地，我仿佛是在玩那种玩命游戏俄罗斯轮盘赌[2]，我曾经在普通世界中玩过一次这种游戏。

1966年11月，我发现自己很不情愿地在海地王子港的街上开车，与我同行的是彼得·格伦维尔[3]，在普通世界中，我们曾经为把《喜剧演员》[4]改编拍摄成电影而一起工作。此书曾经受到过“医生爸爸”[5]的谴责。彼得也意识到了我所感觉到的那种危险。周围还有其他几位游客，在博物馆中我们遇见了奥罗弗森旅馆[6]的老板塞茨，在写作《喜剧演员》时，我曾经住在他的旅馆里。他与彼得打招呼，同时背对着

2 ◎ Russian roulette，赌时在左轮手枪的六个弹孔中仅装一枚子弹，然后转动旋转弹膛，举枪对准自己的头并扣动扳机，所以，有六分之一的机会赌者会被子弹击中。格林玩此游戏，详见导读。格林的第三次海地之行充满危险，几乎也是玩命游戏。

3 ◎ Peter Glenville，1913—1996，英国电影演员、导演和制片人，他曾于1952年导演过格林的第一出话剧《起居室》（*The Living Room*），后来是根据格林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喜剧演员》的导演和制片人。

4 ◎ *The Comedians*，出版于1966年，1967年被改编成电影。小说出版后，格林一直觉得自己的生命会有危险，杜瓦利埃可能会派杀手暗杀他。所幸的是没过几年，杜瓦利埃就死去。

5 ◎ Papa Doc，真名弗朗索瓦·杜瓦利埃（Francois Duvalier，1907—

我。他说："你知道因为他，总统的私人卫队没少给我惹麻烦。"[7]

在楼上我又遇见两位熟人——一个是位医生。他们看到我都非常惊讶，我越来越想快点离开。

外面的院子里有几辆汽车，一个老妇人站在离我们的车不远的一辆车旁边。我以前曾经在太子港的街上看到过她。"那肯定是'医生爸爸'的夫人。"我说。果然，总统自己出现了，他们一起开车离去。我用双手捂着脸，我非常害怕。彼得坚持安静地坐在他车子的方向盘前吃一个硬硬的白煮蛋。

车子终于启动，我们发现去博物馆的路被一根装在大转盘上的木棍挡住。彼得出去要推开木棍，但是对面就是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他说只有接到总统的命令木棍才能被推开。这次我们可真被困住了，幸运的是后面的事我记不起来了。

∽

那是 1972 年，伦敦的许多房子都被炸弹摧毁[8]。在我的寓所里，我和一个朋友走上楼去时，我注意到有一个小罐连在暖气片上，又通过一个玻璃管接在电源上，这立即引起我的警惕。我的朋友拆下玻璃管，我下楼到街上，把它拿给一群警察看。

他们中的一位检查了玻璃管，他说里面有炸药，足够炸掉整个大楼。他们进了房子，我为他们的生命

1971)，出生于太子港，早年的职业是医生，故有"医生爸爸"的绰号。1948 年任海地卫生部部长，1957—1971 年间任海地总统，建立持有特权的私人卫队"通顿马库特"(Tontons Macoute)，并依靠将其神话的巫术实行独裁统治，1964 年宣布为"终身总统"。他统治期间，海地太子港上空一直飘着一面旗子，上写"我就是国家"。

6 ◎ Hotel Oloffson，海地著名旅馆，用红木建造，格林曾经住在这里，并在《喜剧演员》中以这个旅馆为场景。

7◎ 格伦维尔1965 年开始着手准备拍摄《喜剧演员》，当时，小说本身还没有出版，所以，1965 年 12 月，他去海地勘查实景时，还没有什么危险。他拍摄了奥罗弗森旅馆的许多照片，他甚至与杜瓦利埃总统安排了会面，因为他作为电影导演的名气，总统为他大开方便之门。但是 1966 年 1 月，塞茨手持刚刚出版的

小说《喜剧演员》前来找格伦维尔，说："这本书是大使馆给我的，里面都是关于我的旅馆，这可要给我惹大麻烦了。"格伦维尔二话没说，马上去旅行社订了下一班离开海地的飞机票。这时，又有一位军队的官员拿着份《纽约时报》来找他，报纸上有格林的大幅照片，《喜剧演员》的封面和摘选，军官向他询问此事，格伦维尔假装不知，因为他知道，如果海地官方发现他已经买了此书的电影版权，而且就是为了电影才来海地，那么他将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而且，大使馆的人已经告诉过他，如果他被投进监狱，大使馆根本就无法保护他。军官走后，格伦维尔马上去飞机场，提心吊胆地等了几个小时后，直到飞机起飞后他才放松下来。后来，这部电影的外景都是在非洲拍摄的。

8 ◎ 格林三四十年代在伦敦的家在二战中受到德军的直接轰炸而寸瓦不留，那天晚

安全担心，因为大楼里可能还有第二颗炸弹。果然，一只手提箱爆炸了，细小的尖锐物向四面飞去，如同阵雨一样——虽不危险但是很扎人。

∽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房间里，房里有一只自由的飞来飞去的鹦鹉，它突然飞到天花板上。我向与我在一起的同伴解释说："我有恐鸟症，就像我妈妈一样。我根本无法触摸羽毛，我不能留在这个房间里。"我蹲伏在隔壁一个小黑屋里，但是鹦鹉从我身后飞扑而过，差点碰到我的脸。

在这个房间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但是它们都是长着软毛的友好的小动物。突然有人把一个又肥又大的蜘蛛塞进我的裤子里，我能感觉到它抓住了我的阴茎。这可比鹦鹉要更糟糕。

∽

1983年1月，我在墨西哥[9]，与一个被军队追击的游击队帮派有牵联。我和一个同伴与大部队脱离了，当我们经过一片丘陵地带时，在一条浅战壕前有人向我们开枪。

我的同伴没有回答，他朝空中放了一枪，这时有一个年老的男人从战壕里站起来向我们挥手打招呼，我认出他是我同伴的父亲。然后他向前跑来，但是受伤跪在地上。

肯定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再能记起来时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走在一条大路上。有一男一女赶着一辆马车朝我们这个方向过来。我看见那个男人胸前挂着一支新式步枪。等他们接近我们时，我把他的步枪抢了过来，他们转了弯在路上消失了。我敢肯定他们会告诉追赶的人我们在哪里。我的同伴去转弯处看他们是否离我们很近，然后他向我挥手叫我往岔路上走。

我能看到一批军队向我们追来。我的同伴挥手叫我往左拐，我往左边的路上看去，那里也有一群士兵逼近我们，第三群士兵从路上向我们迎面开来。我们被包围了。

我决定扛着步枪一直往前走，希望他们不会认出我。他们从我身边经过，并没有开枪，然后我听到了子弹上膛的声音——他们随时都会开枪。我们走着的路上有着黑白相间的条纹，我想——“白色意味着生存，黑色意味着死亡”。

我肯定生存下来了，因为我很少梦到死亡，可能只有一次我梦到过自己的死亡——那次死亡将是这本书的终结。

上他在情妇家过夜，所以幸免于难。他的妻子维维恩后来说：“是格林的不忠救了他的命。”

9◎ 1938年，格林曾去墨西哥报道天主教徒被迫害之事，后来写成小说《权力与荣耀》以及游记《无法之路》(*The Lawless Roads*)。他非常不喜欢墨西哥。

# 七 一点宗教

某种宗教常常要侵入到我自己的世界里，其次数频繁让我惊奇。我这里写道“某种”，因为我向来不喜欢别人把我归类于罗马天主教作家。毕竟，我的小说《权力与荣耀》（也许是我最好的一部书）是遭到圣职部的谴责的[1]，而且，希南红衣主教[2]前任的那位西敏红衣主教[3]也曾激烈地批评过我的作品。所以，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也不是那种传统保守的天主教徒，这就很正常。

我在这个私人的世界中遇到了三位罗马教皇，在普通世界中我只遇到两位——庇护十二世[4]和保罗六世[5]。幸运的是我和约翰·保罗二世在我自己的世界中见面时，他正在睡觉。

约翰·保罗二世是一位喜欢旅游的人。我不能肯定是在哪个国家的哪个旅馆中我们正巧同时在那里。虽然我并不喜欢他，但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要

1 ◎ *The Power and the Glory*，出版于 1940 年。关于此书遭圣职部谴责一事，请看导读。

2 ◎ Cardinal John Carmel Heenan，1905—1975，1930 年被任命为牧师，在二战中常为 BBC 工作，所以又有“广播主教”之称，1963—1975 年间任西敏红衣主教，格林好友。

3 ◎ 指红衣主教格里芬，Cardinal Bernard Griffin，1899—1956，他于 1943 年被任命为西敏大主教，1946 年被晋升为红衣主教。他对《权力与荣耀》的谴责，请看导读。

向他忏悔的强烈愿望。那天已经很晚了,我在他的卧室门外犹豫了很久,拿不定主意是否要敲门。然后我伸手去拉把手,门自动开了,教皇在床上酣睡。那张在枕头上的脸和我无数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一样充满着超凡魅力。我站着俯视着他,犹豫着是否应该叫醒他。以后的情景我记不住了。我想我大概是带着我未说出口但可能无关紧要的忏悔打了退堂鼓。

我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另一次会面令人不愉快。1984 年,我们一起在梵蒂冈的花园里散步。他一开始很友好,后来就变得很没耐心。我们停在一男一女两组正在玩牌的人前。他给了两位赢家一人一块佩鲁贾巧克力,他们虔诚卑屈接受巧克力的态度让我觉得反感,仿佛他在给他们施发圣餐一样。

1987 年 7 月,我从报纸上得知这位教皇要追封耶稣为圣者,这让我很震惊。我觉得这个人如果如此自鸣得意以为他可以赐予耶稣以荣誉,他肯定是疯了。正巧在那时他来访问安提贝斯,有一天我在城墙处从他身边经过时,他正跪在那里祈祷,注视着大海。经过他之后我意识到他跟在我的身后,我放慢了脚步,希望他可能和我搭话,这样我可以向他表达我对他所建议的赐封之事的态度。但是他从我身边走过时什么都没有说,转弯进城去了。他穿着一条很脏的白裤子和一件绿色的套衫。这样的衣冠不整让人

4 ◎ Pope Pius XII,1876—1958,意大利籍教皇,1939—1958 年间在位,因对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持中立态度而遭指责,严禁天主教徒同共产党合作,宣布圣母升天是天主教的确定教义。

5 ◎ Pope Paul VI,1897—1978,意大利籍教皇,1963—1978 年间在位,发表通谕主张教士独身,反对节制生育,广泛到各大洲旅行,呼吁开展国际合作,保障世界和平。

觉得他很可怜，我第一次对教皇心生怜悯之情。

教皇约翰二十三世[6]是我很敬仰的，我只与他见过一次，那次会面的情景很古怪。那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教皇正在为大海感恩祝福，这是一种很古老的仪式，半当中他走进齐腰深的水里，头戴着他的三重冠。可惜那里有三个不守规矩的英国人在游泳，他们联合起来向教皇泼水。他们是——我一直犹豫是否要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其中两人现在已不在世——南汉普顿伯爵，肯尼思·克拉克爵士[7]和雷蒙德·莫蒂默[8]。因为我和后二位很熟悉，仪式结束后，教皇把我叫到一边，要我对他们进行一番训斥，为此，他还在梵蒂冈借给我一个房间。现在二十四年以后，我已经不记得我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是我肯定对他们严加训斥了，因为他们的行为实在让我震惊。

教皇保罗六世是我在普通世界中认识且喜欢的，我记忆中的那场宗教仪式和我笔记中的很不同，我二十四年前的手书有时很难阅读。这场宗教仪式正在进行过程中，地点是在罗马，但是那个宫殿前的大广场更让人想到维也纳，而不是罗马。狮子也确实是其中的一部分吗？还是我的笔记在欺骗我？在笔记上，我似乎记录着狮子在那里追赶孩子们，我得承认我不知道它们是在捕猎食物，还只是天真无邪地玩耍。另外还有一些高大的石头的雕像，他们都刻着奇

6 ◎ Pope John XXIII，1881—1963，意大利籍教皇，1958—1963年间在位，1962年召开第二次梵蒂冈会议，致力于基督教统一的事业，主张东西方和平共处。

7 ◎ Sir Kenneth Clark，1903—1983，英国艺术史家，以研究达·芬奇而著名。

8 ◎ Raymond Mortimer，1895—1980，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和编辑，曾任《新政治家》的文学主编。

丑无比的红衣主教的头，他们在广场上移动，后面跟着一个修女，修女不停地敲击他们的头部，以此证明他们是石头。最后是教皇保罗的布道——但布道是从一只骡子的喉咙里吐出的，它高悬在天空中，我只能看见它的头和长长的伸展出去的喉咙，这个会说话的管子就如同一个大怪物一样。

等我回到住处，我发现梳妆台上有一顶镶着宝石的皇冠——这当然是属于教皇的——我非常想轻率地试戴它一下，但是我又担心教皇随时会进来。

在那以前，我曾有一次要比通过骡子头更接近教皇保罗六世。一次在罗马一个教堂的典礼行进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走在他身边。他看上去很累，而且精神不振。我告诉他他的工作太辛苦了，又说我们都很爱他（这种话是我永远不会对他的后任说的[9]）。眼泪从我的眼中滚落下来。等我们走到圣坛时，那里有一排给我们留着的空位子，我觉得我在教皇身边的时间已经超出了我所应得的，我犹豫着是否应该仍坐在他身边，但是很快就有人给我解了围。

“给圣者休找个位子。”有人大叫道。回过头去，我看见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人，脸上笑容愉快。我很高兴地起身给他让位，虽然我压根就不知道圣者休究竟是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便是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所有的圣者也都是死去的。

9◎ 指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10 ◎ Crowborough，英国东南部的一个小镇，格林的父母亲晚年住在那里。

ᔕ

一次，我与我母亲在我父母住的克劳伯罗镇[10]参加弥撒，我们在前排找到了座位。牧师在两个助手的陪同下吟诵万福马利亚的那段祈祷。他们小步走上圣坛，每一条线前他们都停一下。我突然意识到牧师和他的一个助手的手上都拿着点着的香烟，这让我既愤怒又厌恶。然后他转身面对教堂里所有的人，说有关圣母处女生子的争论，罗马教廷很快就会做一个支持或是反对的决定，他又说不管决定结果如何，他都希望不起乱子。然后他走到通道上，与离去的人一一打招呼。

我义愤填膺。我下定决心如有机会的话，我要告诉他我对他的看法。我悄悄溜到门口，他正忙着与人交谈。我希望他能过来和我打招呼，我等着——我的借口是等我的母亲。牧师没有和我说话就转身回到教堂里。我跟上了他。他拥抱一个高高的男人，仿佛是挂在他的肩膀上，我最终鼓足勇气开口，告诉他他多让我恶心。“难道你能等上三分钟才吸烟吗？”他笑着反问我，脸上带着一种高傲自得的表情。

ᔕ

今天晚上的弥撒上有一个丑陋且肥胖的女人做牧师的助手。她把一杯茶放在圣坛的圣餐杯旁边，给人的印象是牧师不仅是在把酒变得神圣，也是在把

茶变得神圣。我非常愤怒，弥撒后与牧师激烈地争论,他看上去是一个软弱且无知的人。

ഗ

我从来就不喜欢演讲，更没有能力讲述任何宗教的题目,但是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却发现自己在向一批人解说我的理论，这理论是关于上帝和人的进化,以及上帝和撒旦的身份与特征。

后来,这个理论被写进了《荣誉领事》中[11],如下：

> 我所相信的上帝肯定对所有的邪恶也对所有的圣人负责任,在他示与我们的形象中,既有黑夜的一面也有白天的一面。当你说起恐怖与悲惨,伊多尔都，你在说上帝的黑夜的一面。我相信,上帝的黑夜的一面会渐渐衰退,就像你的共产主义的社会,阿基诺,我们就只会看到仁善上帝的简单的白天的一面了。伊多尔都,你相信进化论,虽然有时好几代人会集体退化成野兽。进化是一场漫长的奋斗和受难的过程,我相信上帝也在经历这场进化,而且可能比我们更痛苦。[12]

ഗ

有人告诉我说,如果去参观以色列的话,我应该去以马忤斯[13],从《圣经》成书年代到现在,这个小村

11 ◎ *The Honorary Consul*，出版于1973年,故事发生在阿根廷,书中有一个角色原是一位神父,后成为游击队领袖兼绑架者,格林通过他阐述了关于"上帝和邪恶同为一体"这个理论。

12 ◎ 伊芙·克罗伊塔原注：在一次和我的交谈中,格林描述了这段话如何从他的梦中进入了他的小说,所以,为了读者的兴趣起见,我把此段话录于此。

13 ◎ Emmaus，以色列古镇,《圣经·路加福音》中说耶稣复活的那天下午,有人看见他和两个门徒行走在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路上。

14 ◎ Nazareth，古镇名，现在巴勒斯坦地区北部，是耶稣以及他的父亲约瑟夫，母亲马利亚的家乡。

子几乎没有改变过。约瑟夫在那里遇到了马利亚。我问："但是为什么他要从拿撒勒[14]去那里呢？"

那人回答我说："也许是因为税收的关系，后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俩才一起去了伯利恒。"

∽

那是1973年1月，我从报上得知我被任命为西敏大主教。我非常惊讶，感觉上又有些模棱两可。我知道我并不是合适的人选，但是几天后我将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参加皇室的活动，这个念头又挺吸引人。我还发现在这个皇室庆典中，他们会给我所有的亲属每人两个座位。

那时我已计划离开伦敦，但是我对我的情妇说，我觉得我应该留下来接受我的礼袍和主教法冠，而且应该熟悉我的工作。首先我得当上牧师才行，为此，我去向我的前任希南红衣主教请教。我出门时，正巧碰上红衣主教他本人。

我告诉他对我的任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酸酸地看着我，告诉我说："你的任命刚刚宣布时，就像扔了一颗炸弹一样。我得把一切向你交代清楚。"

我和他一起回家。他已经雇用了一位私人侦探准备有关我的材料，里面有些照片，也包括那个穿着寒酸，没受过教育的私人侦探和他的证人在一起的镜头。

"谁是伯顿夫人？"红衣主教问。我回答说我根本

不知道这个名字。也许私人侦探指的是一个很久以前曾经是我的情妇但是现在已经死去的女人。“他至少应该挖出近期的什么人。”我说。

红衣主教也和税务局的人交谈过，他们说我通过把钱汇往国外的办法偷税漏税。这确实让我心神不安。他们会重新审查这件事吗[15]？他的材料中还有一个我侵入私人领地的神秘故事。想了许久后我记起来我曾经想搬到乡下去住，我与我的出版商一起去看过一块地，觉得可能在那里造一座房子。材料越来越离奇，也离真相越来越远。最后我和红衣主教一起大笑起来。他总算松了一口气，觉得我被任命为牧师的喜剧已经没有危险，可以继续进行。

∽

躺在床上，我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我决定完全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开始相信佛教。在我做此决定的刹那，我觉得耶稣离我很近。在黑暗中他的轮廓隐约可见，他看上去很不情愿失去我。我的信仰至少恢复了一半。

∽

我读了一本有趣的犹太人关于耶稣的书。书中把耶稣的一生和一个比他早的犹太人莫斯克的一生相比较。莫斯克的结局和耶稣非常相似。耶稣知道莫斯克的故事，所以，他大约知道自己会以同样的方式

15 ◎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格林雇用了美国会计师托马斯·罗管理他海外版权的收入，这些收入直接汇入瑞士由罗管理，这样格林就不用在英国交税。1964 年，罗的公司倒闭，他因涉嫌经济罪而等候审判，审判于 1967 年开庭，一年后罗被判六年监禁。格林虽然失去了许多投资，但仍因此事而受牵连，必须很快离开英国，否则也可能会有因逃税而被逮捕的危险。1966 年 3 月他接受伊丽莎白女王的会见并受皇封时，是得到税务部特许回英国一天的。

死去。莫斯克也同样预计到自己的死亡，但是他的认知是基于预言，耶稣的认知是基于莫斯克的历史故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斯克是一个更伟大的人物。

这本书中的另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尼克登莫斯的故事。他爬到一棵树上避难，拒绝下来，他害怕和耶稣说话，因为耶稣身边有两个守护着他的“粗野的加利利人”[16]。

ᔕ

教堂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这个派别的牧师们特别重视圣保罗，几乎把他放在耶稣之上。人们可以在出售宗教物品的商店里买到这个教派的象征，那是圣保罗的陶瓷半身塑像，他有三只手臂，每只手臂上都长着一个头。这个教派在西班牙非常盛行。

也有人反对这一教派，领头的是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写了一本批评此教派的著作。有一天夜里很晚了，有人打电话给他说需要紧急忏悔，他们决定在某个地点会面，那是在城市另一边的一个教堂。他出发去那个教堂，但是渐渐他心生怀疑，是否有人在跟踪他？他转身回家去了。

回到他的住处，他发现整条街都着火了，不仅是他家，而且还有建立那个教派的其他四位牧师的家。

ᔕ

16 ◎ Galileans，耶稣和他父母都来自加利利省，所以，此词也用作是对基督徒和耶稣的贬称。

17 ◎ Archbishop David Mathew，1902—1975，他与哥哥格文思·麦休(Gervase Matthew)牧师都是格林的好朋友，他也是格林女儿露西·卡罗兰的教父。格林的《权力与荣耀》，是题献给格文思·麦休的。格文思阅读了《权力与荣耀》的初稿，并且给了格林许多建议。后来，在圣职部对此书进行查禁时，大卫·麦休帮助格林起草了回信，信中说因为《权力与荣耀》已经出版十余年，所以任何修改都得由出版社进行，为了表示自己愿意帮助圣职部的诚意，信中还附上了所有出版社的名称和地址，圣职部可以直接和它们联系。

大主教大卫·麦休[17]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在普通世界中当圣职部对我的《权力与荣耀》进行查禁时，是他给我的许多建议拯救了我。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关于他的葬礼的记录非常奇怪。

1964年12月我参加了大卫·麦休的葬礼。整个仪式非常离奇，我和一个朋友坐在教堂的楼上，楼下的人们窃窃私语，甚至是格格发笑，这让我觉得气愤。我想对他们大声呼喊："大主教是我的朋友，他现在已经死了。"我的伙伴小声对我说："你看那个牧师，他千方百计不笑出声来。"我觉得这一切真奇怪，我正要把这一切归于悲痛的歇斯底里，另一个牧师抓住圣坛的一头，快乐地笑着，不一会儿就把圣坛像推桌子一样地很快推到教堂外面去了。在一阵欢乐的气氛中，整个葬礼结束。

现在，许多年后，重读这个段落，我问我自己，难道生命的结束不应该总是如此来庆祝吗？

# 八 与皇室的简短交往

## 利奥波德国王[1]

1964年一天晚上，比利时的国王利奥波德打电话给我，要我给他一些建议。他正在准备一个关于比利时历史的大展，这个展览将在世界上的各个首都举行。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关于刚果的那段不幸的历史。我建议说他应该根本不提此事，但是我们俩对我的回答都不满意。

然后我建议说他应该坦诚布公，承认他的曾祖父[2]所犯下的罪行（我不能肯定我是否把辈份给搞清楚了），以及比利时政府的错误。“也许你可以把这些和其他国家所犯下的罪行相比较，包括我的国家，例如阿姆利则大屠杀[3]。”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我的建议。

1 ◎ 指利奥波德三世，Leopold Ⅲ of Belgium，1901—1983，1934—1951年在位。

2 ◎ 指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 of Belgium，1835—1909，1865—1909年在位，他在刚果建立殖民地，掠夺橡胶和象牙等自然财富，残杀当地百姓，实行惨无人道的统治。死后由侄子艾伯特一世（利奥波德三世的父亲）继位。

3 ◎ Massacre of Amritsar，阿姆利则是印度北部城市，锡克教圣地。1919年4月13日，英国军队在那里向没有武装和平示威的印度百姓开枪，死伤无数，被称为“英国最为耻辱的一天”。

## 伊丽莎白女王

1966 年,关于我参加在白金汉宫接受皇封的仪式一事出现了一些混乱,日期有所改变,通知到来时我正在刚果。也不知为什么我的秘书对白金汉宫扯谎说我从来就没有收到通知。等我按照改变了的日期来到皇宫时,一个官员把我叫到一旁。

“告诉我实话,”他说,“你的秘书没说真话,对不对?”

“对,”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在刚果。”

我们经过女王的身边,她正坐在她的宝座上。我停下来准备和她握手,她对我微笑着说:“现在还不行,这样违反常规。”我在排着的队伍中丢了位子。

为了消磨时间,我们来到花园里,那里有许多主教们,还有一些孩子坐在桌边吃小面包和冰激淋。一个小时后我们回到里面。我觉得肚子很饿,女王肯定也饿了,她挑了个位子坐在桌子旁边吃一个小面包。我有些失望,因为她用我的原名亨利称呼我,我向来就不喜欢这个名字。[4]

在那之前两年,完全出于偶然,我发现自己在温莎城堡的一个宗教仪式中坐在女王的旁边。主持仪式的教士在宣讲一段非常荒谬的说教,我发现自己

4◎ 1966 年 3 月 11 日,伊丽莎白女王在白金汉宫会见了格林,他因著作等身而受皇封。但是格林并没有因此而欣喜若狂,离开白金汉宫时为了躲避摄影记者们,他用报纸遮住头。

5◎ 在格林记录此梦的原稿中，接下去的是这样一句话："下面发生的事情我就无法描写了，因为一个人不能给他自己犯的罪作证，而且这可是叛国大罪，但是对于我这个罪犯来说，没有其他任何罪行能让我更得到满足。"究竟是什么罪行呢？读者只有自己去猜想了。

6 ◎ King Ibn Saud，沙特阿拉伯国王，阿拉伯部落领袖，统一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1932 年创建沙特阿拉伯王国，1932—1953 年之间在位。

有大笑出声的危险。我能看到女王也一样。她用仪式的程序单盖住我的嘴，掩藏我的笑。然后菲利普亲王进来了，他穿着童子军团长的制服，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但是我必须把我的座位让给他，这让我有些不满。我走开之前女王对我说："我实在受不了他的笑法。"[5]

## 伊本·沙特国王[6]

我在西敏区的一条小街上与伊本·沙特国王相遇，他穿着长袍，戴着墨镜，他刚刚把他年轻的情妇送回到一家烟草商店前，因为她的住处就在楼上。他对她非常殷勤周到，他倒着走回他的出租车，眼睛却一直盯着楼上的那扇窗子，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一位不知名的公主

我发现自己的同伴是一位年轻的公主，她的父王在一个被许多哨兵包围着的城堡里奄奄一息。他的死亡也将威胁到公主的生存。突然从他房间的墙那边传来一些声响，听上去像是一声长长的口哨，然后是一声叹息。"这是人死去时的声音。"我对她说。

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哨兵们知道国王已死，所

以,城堡里立即奏起了欢快的音乐。

我说:“你必须在那些守望的哨兵得知前逃离。”因为外面正是黑夜,我试图把电池装进手电筒里,但是电池都太旧了而且都已经没电了。“没关系,”我说,“已经快天亮了。”

我从窄小的窗子看出去,能看到下面的哨兵们。重要的是她不仅要躲过哨兵,她也得躲过其他住在城堡里的人。一开始我们还算成功,我们发现我们在一片草地上,那里是一个古老的修道院的遗址。我们走过遗址,但是那里有一些旅游观光客,我听到其中一位说:“她肯定是公主,我能认出她的头发。”

我在遗址外追上公主,我对她说在哨兵得到消息之前,我们必须离开此地,越快越好。“把你的贝雷帽脱下来,”我对她说,“不然的话他们会说你就是戴着贝雷帽的那个人。”我想我们是逃脱了,因为其他的事我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九

# 写作的工作

在我自己的世界中,写作所占的比例很小。有一次,我梦到一篇题为《良心的地理》的短篇小说,是关于一个住在加拿大的女人——她是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她要去意大利与丈夫团聚。她打电话给她的主教,要求主教允许她使用避孕药,主教告诉她应该凭她的良心做决定,所以,她就吃了避孕药。等她到了罗马后,那里的道德风气完全不同,她开始觉得吃避孕药问心有愧。这个故事应该是个喜剧,所以,在地理的良心上它还应该有第三个转折。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这个故事的想法不错,但是在普通世界中我一直没有找到所必需的第三个转折。

我也曾有过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主意。场景是一幢古老失修的大房子,故事从一个房间发生到另一个房间,但总是避开阁楼,直到读者开始怀疑阁楼里究竟有什么?只有到了最后一章我们才能看到阁楼

里面。阁楼里堆满了破碎的报纸，把这些报纸拼凑在一起，读者最后才发现这部小说写的究竟是关于什么。

唯一进入普通世界的，是这部小说的开头。

## 在阁楼里

我不知道我所选择购买的那套带着家具的公寓除了我自己以外还有谁会喜欢。但是当电梯到达顶楼时，我看见了门上的裂缝，仿佛是整套公寓伸出手来欢迎我，它好像在用吱呀嘶哑的声音对我说："能再次在这里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为数不多的几位朋友根本无法理解我这个新朋友。他们所见的只是我的住处的年久失修：铰链没了，天花板上有裂缝，洗手池漏水，暖气片没有热气。厨房的零乱丝毫不影响我，因为我自幼喜欢吃的许多食品现在都能买到罐头的。我仍记得我在这里度过的第一夜，还有那夜我做的梦。那个梦，就像其他许多梦一样，有记忆没有保留住的许多空隙和通道。有时我想，记忆是否常常是个心肠慈善的审查官，所以，等我们睁开眼睛时，即使是噩梦，最为可怕的部分也都被删掉了。

ᔕ

如同在普通世界中一样，在我自己世界中的写作也有着噩梦般的一面。1983 年 5 月 3 日，我开始修改我的《熟悉将军》[1]的打字稿。我觉得这本书糟透

1 ◎ *Getting to know the General*，出版于 1984 年。

了，里面充满了啰嗦冗长毫无意义的句子。

第二天晚上我在修改《吉诃德阁下》[2]，我意识到其中一大部分非常无聊。我决定把这一大段都给删掉，这样一来整个结尾就得修改，阁下必须死去，这本书就不可能有其他样式的结局。

ᔕ

1965 年 6 月，我在排练一出戏剧，剧本是我从一本很糟糕的翻译作品改编而成的。1964 年，我曾在普通世界中出任过演员—导演这一角色，当时，我参加了《刻塑像》[3] 的排练工作，那出戏的导演是彼得·伍德[4]。这次，伍德仍是导演，主演是拉尔夫·理查森。理查森仍然充满了他惯常所有的那种夸张虚假的和蔼可亲，而且什么都得听他的。他一直想要重新使用已经被我修改了的古老的直译，他在剧本上做了许多记号，但是又不愿意给我看。有一刻他炫耀地戴上他爱德华风格的帽子，在黑暗中发着磷光。对于这整个排练我越来越觉得厌倦且恼怒。我告诉伍德，理查森所扮演的"侦探"这个角色的台词翻译实在是非常糟糕。他不同意，我意识到他和理查森会很快合伙扔开我的翻译本，所以，我告诉他两天后我就要到法国南部去。他们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我重复道："两天后，我会非常高兴地在圣保罗的汶斯[5] 的哥伦布多尔饭店里吃午餐。"

2 ◎ *Monsignor Quixote*，出版于 1982 年。

3 ◎ *Carving a Statue*，格林剧作，创作于 1964 年，先是在布莱顿上演，1964 年 9 月 17 日开始在伦敦的皇家剧院中上演，但是非常不成功，可以说是格林最大的败笔，详见导读。格林做这个梦时，正好是此剧上演之时，梦中可见他的焦虑。

4 ◎ Peter Wood，英国导演。

5 ◎ St Paul de Vence，法国南部的中世纪古镇。

ᔕ

鬼使神差，有人说服我出版那两部被我自己枪毙了的小说，《行动之名》[6]和《黄昏流言》[7]。我坚持自己写前言，解释我禁止它们出版的理由，并且证明它们有多糟糕。我还是非常担心，想象着批评家们会如何从它们中取乐。我想到要禁止平装本的发行，但是显然为时已晚。

ᔕ

1973年5月5日，我经历了一种令人非常不愉快的情景，谢天谢地这种情景从未在普通世界中发生过。我正在写一部新小说，我把其中刚写的关于情爱的一段文字给我的秘书，让她打字成草稿，但是她打的草稿中充满了空格——让人读起来非常吃力。更糟糕的是，当我把这段文字大声念给我所爱的那个女人听时，我意识到这些文字是多么虚假，多么煽情，多么纵容。她也知道我所写的是多么糟糕，这让我更愤怒。我把草稿扔到一边，振振有辞地说："你这样打断我、批评我，让我怎么继续读给你听？这只是草稿而已。"

但是我知道整本书无可救药。我说："我希望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就死掉。为了养家糊口我必须得出版这本书。"我想到了玩命游戏俄罗斯轮盘赌。我最近真的买了一支左轮手枪吗？还是我在做梦？我的情妇想安慰我，但是她只能把情况弄得更糟糕。

6 ◎ *The Name of Action*，格林的第二部小说，写作于1929—1930年，出版于1930年10月，总共只卖掉两千本。详见导读。

7 ◎ *Rumour at Nightfall*，格林的第三部小说，写作于1930—1931年，出版之后只卖出一千二百本，评论也极糟糕，详见导读。在这个梦中，他显然是希望这两部小说从来就没有出版过。

# 十 舞台和屏幕

直到现在，那次很奇怪的经历仍然如同报纸头条新闻那样印在我的脑海里 ——“查理·卓别林[1]自杀了”。一开始是关于查理之死的谣传，我在一个坐满了人的电影院里，等待着他们随时会宣布这条新闻。我甚至有些害怕这条新闻将给观众带来混乱。然而，后来这条谣传被否定了。我的公寓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有人扶着查理进来。他看上去奄奄一息。他服用了毒药，但是喝得不够多，他躺下来时做了个手势告诉我他喝了多少。毒药是装在一只罐子里的。我问陪同他的人要那只罐子——我说，“可能有一天对我会有用。”看着查理奄奄一息真是一种折磨，但是情况突然好转——他一下子恢复了健康，离去时根本就不用有人搀扶。

ഗ

1984 年 1 月，我去看一出经典的戏剧，《槌球比

1 ◎ Charlie Chaplin，英国演员。格林第一次与卓别林有联系是 1952 年，当时正是美国麦卡锡反共政策的高压时期，卓别林在一次演讲中用了"同志们"一词，所以被驱逐出他住了将近四十年的美国，美国最高法官下令说，如果卓别林敢返回美国，将立即被逮捕。格林当时正在好莱坞商洽有关将他的电影写成小说一事(因为格林大学时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他去美国的签证也屡屡遭到拒绝，最后是美国最高法官特批才许入境)，他并不认识卓别林，但是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卓表示支持。信中盛赞"您的电影

赛》[2]。我的位子在正厅前排，我有些紧张，因为几天前，男主角保罗·斯科菲尔德[3]在开场戏中一不留意，把槌球打到了正厅的观众席中，把一位观众的一只眼睛给打得直流血。然而，这个晚上没有发生类似不幸的事。我发现我自己在聆听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戏的内容是三个正面临期中考试的学生去一个老学者的家参加一个晚会，每个人的举止都会受到评判。三个人中的一位很害羞，那个老学者非常友好，他逐步引导那个害羞的学生——其实是帮助他成长为一个大人。对话非常流畅幽默，我觉得好像是我自己编写出来的。

ᔕ

1965年5月，我很积极地参与了一部无韵诗历史剧的制作，出演的是理查德·伯顿[4]和伊丽莎白·泰勒[5]。我发现他们二人都比我所想象的要更好相处。泰勒比我想象的要更漂亮，而且也更会演戏。

这出戏的首场演出是在坎特伯雷的露天剧场里，以大教堂为背景。伯顿首先做了开场白，然后我的朋友亚历克·吉尼斯[6]扮演的发疯的国王上场，好像是亨利四世。吉尼斯忘记了台词，伯顿即兴朗读了一首诗给他遮掩，诗里所描写的是“这个洞穴般的帐篷的休息处”。当观众们意识到他在做什么时，他们都发出了同情的笑声，吉尼斯朝四周看看，说：“我忘

总是对弱者，对地位卑贱者充满同情，对那些恃强凌弱者进行批判”。信中还称卓是“英国人最骄傲的儿子”，并说，“在伦敦，支持您的信会堆成金字塔，在那里等候您。”后来，两人相识并成为好朋友。50年代末60年代初，格林曾经为卓别林的自传润色。

2 ◎ *The Game of Croquet*，这出戏并不存在。

3 ◎ Paul Scofield，1922—，英国演员，以演出莎剧《李尔王》、《奥赛罗》等而著名。1956年在根据格林的小说《权力与荣耀》改编的同名话剧中扮演那位威士忌牧师。

4 ◎ Richard Burton，1925—1984，英国演员，最早以演出莎剧而闻名。1967年在根据格林小说《喜剧演员》改编的同名电影中扮演主角。

5 ◎ Elizabeth Taylor，1932—，英国演员，1967年在根据格林小说《喜剧演员》改

编的同名电影中扮演主角。格林对她的评价是她不会演戏，人也很难相处，而且，她表演的所谓性感与格林想象中的性感正好相反，1967年4月6日格林在给他的情人凯瑟琳的信中描写泰勒"面部漂亮，身材极差，声音庸俗"。

6 ◎ Alec Guinness，1914—2000，英国演员，早年以演出莎剧《哈姆雷特》、《麦克白》而著名，电影包括《桂河大桥》、《日瓦格医生》等，曾在多部根据格林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扮演角色，例如1959年的《哈瓦那特派员》和1967年的《喜剧演员》。

记台词了。"

我非常生气，我感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嫉妒伯顿。我从我的前排座位上倾身往前，对他说："你这个混蛋！"他看着我，面部表情很惊讶，很受伤害。伯顿泰然自若，但是那个晚上的演出取消了。

首场演出推迟到第二天晚上。我希望戏剧评论家们能够在坎特伯雷等一个晚上，但是第二天剧场中的座位空空如也，吉尼斯随心所欲，虽然有一台电视摄像机在那里，伯顿仍然把演出当作是彩排，随意打断其他演员。真是糟透了！

ഗ

1965年下半年，我和彼得·格伦维尔打算一起拍摄一部电影，电影是根据一个发生在19世纪墨西哥的故事改编的。彼得想和我一起去骑马，他替我找到了一匹小黑马。但是我不喜欢骑马，所以他就一个人练习，绕着圈子骑。

我们的剧本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清白的主角，德鲁，与另一个叫豪腾的人一起，在一次银行抢劫案后被警察追捕。有一个镜头，他们把马匹拴在一棵仙人掌上休息，这种仙人掌在墨西哥被称为是"枝状大烛台"。彼得认为这个情节给电影的拍摄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但是我向他保证说，拍一部关于墨西哥的电影，里面没有仙人掌，就如同拍一部关于巴黎的电

影里面没有艾菲尔铁塔一样。他只需要从墨西哥城往南几英里就能发现这样的仙人掌。

德鲁这个角色看到枝状大烛台时会吟唱这样一首儿歌:“烛台端来照亮床,大刀飞来砍头忙。”就在这一刻,一队警察出现在地平线上。

ᔕ

有人请我在一出将在北非一个小剧场中上演的戏剧中扮演一位在弥撒时自杀的牧师。但是我这个角色没有对话或道白,剧本对我的行为也没做任何解释。

我打算即兴表演。

我上场时另一个牧师正在说道,他告诉教徒们说,不仅水和酒是神圣的,弥撒所用的一切工具也都是神圣的,例如圣杯和圣餐碟。我大声叫道:我根本不在乎他妈的这些东西,“我是一个牧师,我要自杀。上帝呀,因为你不再爱我。”

第二天我进城,问两个非洲人我是否成功地震动了观众。他们告诉我观众确实很震动,现在人们仍然在谈论此事。他们无意间告诉我,圣奥古斯丁[7]以前曾经住在这个城里。

ᔕ

我在伦敦西区和鲁道夫·丘吉尔[8]一起散步,他建议我帮助他写一部关于他父亲的电影剧本。我告

7 ◎ Saint 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基督教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395—430年间任罗马帝国北非领地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教区的主教。

8 ◎ Randolph Churchill,1911—1968,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记者,二战中任英军情报人员,1960年和1967年出版过两本他父亲的传记。

诉他这种剧本往往容易流于陈腐。关于这个题目，我有一个更独创新颖的设想，题目为《一个伟人》。故事写的主要是些虚构出的小人物们，表现丘吉尔情感的那些转折关头——例如欧洲胜利日和他最后的病痛——如何改变这些人的生活。他喜欢我的提议，他告诉我说他会争取得到女王的合作。

ഗ

有人请我导演一部根据易卜生的戏剧改编成的电影，但是我一点都没做准备。我没有考虑过镜头的角度，剪接等等。拉尔夫·理查森在里面扮演主角，有人警告我说他有意要让我第一天就遭到解雇并且当众受辱。

理查森把我介绍给剧组成员——大约有二十多个人坐在一张长桌子前，他们正在吃茶点。我一上来就犯了个错误，我向他们道歉说我没有经验，他们嘲弄般地大声叫喊着表示同意。我想，只要我能把这第一天的拍摄应付过去，到晚上我可以研究剧本。

拉尔夫的一句话给了我灵感。我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拍摄，首先拍外景，拍到你的单片眼镜在门口的地上。我们把镜头摇上去，看到你在楼上的一扇窗子里大声咒骂——就用你惯常骂人的话。"

但是，顺利开始后不久，我们就开始争吵。他说他要到他的经纪人那里去抱怨。"你在恐吓我吗？"我说。

"对的！"

"我不会向任何人诉苦，"我告诉他说，"但是我会用马鞭子把你

的脸打开花。"[9]

ஃ

我近来在读一本关于埃弗里曼[10]的舞台剧的剧本，在一个紧要关头他做出要用原子弹摧毁世界的重大决定。我感觉到这个场景应该这样来处理：他做这一决定的关键时刻感情不应该夸张，他的道白应该非常平静、沉着——应该几乎不引起观众的注意——但是为了更有戏剧效果，在他那句简单的道白后，应该有一段很长的间歇，然后是引人注目的灯光效果，可以用灯光打出一个巨大的鸟类的影子。

ஃ

卡罗尔·里德[11]告诉我彼得·乌斯蒂诺夫[12]想请他执导话剧《李尔王》，彼得·乌斯蒂诺夫自己要演李尔王。我对他是否能胜任这个角色抱有怀疑，虽然有一些场景我觉得他会演得很好——例如在雷电交加的荒地上的那场戏。

我们讨论此事时我正躺在床上，卡罗尔警告我说乌斯蒂诺夫会给我送来早餐。他到来时头上顶着一条床单，他先把托盘放下来，然后才把床单取下。他长出了雪白的胡子，这胡子让他的脸变得很柔和，圣洁，甚至有些伤感。他开始朗诵一段长长的道白——"恳请您，解开这枚纽扣"那段，我原先认为他会非常糟糕，让我惊奇的是他实在很出色。

9 ◎ 此梦做于1965年7月18日，也是在格林最不成功的剧作《刻雕像》在伦敦上演之时，理查森在剧中扮演主角。详见导读。

10 ◎ Everyman，15世纪英国道德剧《人性的呼唤》(*The Summoning of Everyman*)中象征人性的主人公。

11 ◎ Carol Reed，1906—1976，英国电影导演，1947年开始和格林合作，执导由格林编剧的电影《堕落的偶像》(*The Fallen Idol*，1948)和《第三个人》(*The Third Man*，1949)，后者非常成功。后来，里德又执导根据格林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1959)。

12 ◎ Peter Ustinov，1921—2004，英国演员，父母亲为白俄裔，他最著名的角色是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系列侦探小说改编的电影中的大侦探波罗。他曾在根据格林小说《喜剧演员》改编的同名电影中担任角色。

13 ◎ *The Potting Shed*，格林剧作，创作于1957年。

∽

1973年，我写了一个剧作，这个剧本让我的头脑非常混乱，这个剧本与《制陶工棚》[13]很相像。彼得·格伦维尔激烈地批评了这个剧本，所以我开始修改。我非常清楚这个剧本的不足之处。其中有一段是男主角跪着进行长篇祈祷，我把场景改为他坐在他的浴缸的边上，而且打算把那长篇累牍的祈祷大幅缩短。但是让我惊讶的是，那段祈祷只有两句长。我突然意识到整出剧其实非常短，我一下子灵感大发，开始添加新的台词，并且在剧终又加上新的一幕。

# 十二 旅游

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相信我所做过的旅行与在普通世界中的同样多。两个世界中的旅行都充满了戏剧性，但是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乘坐的是速度最快的飞机。

## 西非

1965年，我仿佛刚上飞机，就来到了塞拉利昂[1]——它已经不是在战争年代我曾经很熟悉也很热爱的那个殖民地了，而是属于独立非洲的一部分——我的小女儿在那里接受死刑审判，因为有人听到她批评总统。

没有辩护律师交互讯问证人，而且我也听不懂他们所说的部落语言，闹不明白究竟是腾内语，克鲁语，还是伊瓜苏语？一个男人站在法庭前面进行演说，他半当中停下来与我握手。我认识他，我记得

1◎ 1933年格林第一次离开英国远游，是和表妹一起去利比利亚，那时他们就经过塞拉利昂。二战期间，格林曾被英国军事情报六局派往塞拉利昂担任特工。

2◎ 指瑞典女演员安妮塔·伯约克(Anita Björk)，1955—1958 年间与格林是情人关系。格林的《梦之日记》的原稿中是把名字写出的，这里删去。此梦的具体日期是 1964 年 10 月 13 日。

二十年前，我曾经用一块石头打破过他的头，但是他一点都不记仇。我们互相很有好感。他是一个酋长，他的名字叫腾巴，我希望他能承担起治理整个国家的任务。

在审判休庭时我想尽办法也没能找到一个辩护律师。我希望能向法官申诉，因为我女儿刚刚到这个国家才几个小时，她所说的一切肯定都是跟我学的，所以应该是我在法庭上受审。结局肯定是万事大吉，因为我女儿现在活得很好。

## 阿拉伯半岛

60 年代的某段时间，在一天夜里我在离阿拉伯半岛不远的海上巡航，那里离内陆的奥伯顿城堡的遗址不远。据说在这一带的海岸上隐藏着所罗门国王不为人知的宝库。城堡遗址的上方闪着神秘的光亮，传说如果你说出你所爱的人的名字，一道光线会落下，直指藏宝之处。我轻声说了一个名字(一个瑞典名字[2])，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难道是因为我爱得不够吗？

不管怎样，我还是说服了船长我们应该去搜查遗址。我们得申请搜查许可证，还得保证我们只保留搜到财宝的百分之一。船长说这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百分之一到底是多少。但是在我

们刚要开始寻宝之时，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到来，他说他有寻宝的专利。我们告诉他我们有优先权，他说那毫无意义。他的文件说，美国政府会重新修建奥伯顿城堡以供人旅游，作为回报，美国政府拥有首先勘探的权利。与美国政府是没有争执的余地的。

## 中国[3]

1964年11月，在那个我仍喜欢称之为北平的城市里，我有幸采访了中国的皇帝。我和我的朋友迈克尔·梅耶[4]一起旅行，他是易卜生的翻译家和传记作家，但是他却不是一个好旅伴，因为他总是不断头疼，也不停地生其他一些小病。

我穿着一件运动上衣，很不合时宜。我向皇帝道歉我的服饰不够正规。皇帝让我很惊讶，他半跑半滑来到房间里，他是个瘦小的老人，穿着黑色的燕尾服，但是没系领带。他的身后跟随着一批穿着传统服装的官员们，寒暄之后，他们开车带我们到北平的街道。突然皇帝没有做任何解释就离开我们，过一会儿后我们听到他在我们身后叫我们。我们还来不及叫出租车掉转车头，他已经坐着另一辆出租车来到我们身边并且回到我们的车上。

我对北平的街道和城墙看够了，就建议说因为迈克尔从来没来过中国，我们能否去农村看看。“我

3◎格林曾于1957年4月随一个代表团到过中国三周，当时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因为他们的行程完全是安排好的，没有自由活动的空间，而且，格林非常不喜欢与他同行的几位学者，所以，格林对这次中国之行印象并不好。1985年5月27日，格林为《时代周刊》撰文谈及近三十年前的那次中国之行，文章的题目是《花丛中的一根草》（*A Weed Among the Flowers*）。据说，格林每到一处，都要说：“我只想要两样东西，一是可以和一个漂亮的女孩睡上一觉，二是能够抽口鸦片。”这让中国方面的人非常震惊。而且，格林还问起过他们的男导游中国避孕的情况，男导游回答说避孕在中国很普遍，政府也很支持的。格林请男导游替他买些避孕套，导游回答说：“这个我做不到，因为我不知道您的尺寸。”那次中国之行，格林还受英国外交部以及天主教会之托打探有关胡

风集团和天主教徒的情况，但是这两项任务格林一项都没有完成。

4◎ Michael Meyer，格林的好朋友，他们曾一起在世界各地旅行，但是他从未与格林一起去过中国。

记得在一片稻田中间，有一个围绕着寺庙的小村子，非常漂亮。”

皇帝又离我们而去，一个年老的官员问起我上次的中国之行，我想给他看我拍摄的一些可爱的彩色照片，但是我发现我的笔记本里夹着的都是赤身裸体的饥民的灰色照片（还有几张是警察的暴力行为，被我很快藏起来）。我又没有办法不给他看，我想如果我告诉他这些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可能会把效果减到最小。我就说："这些照片都是那年大旱时在京都拍摄的。"

## 叙利亚

1865年6月，我发现自己在叙利亚，那里正发生着一场残酷的大屠杀，甚至连孩子和婴儿都不放过。我曾经在大马士革的一个斋日上看到过类似的情景，但是没有这么厉害。与我同行的有一群人，我觉得到街上去是不明智的，但是我的意见被推翻了——据说对外国人来说没有危险。街上的男人们手上拿着刀子走来走去。后来我们坐下来吃晚饭，一个女人过来，手上拿着的大盘子里放着一个婴儿，她把婴儿切开，就像打开一只手提包一样。

## 澳大利亚

那年7月我在澳大利亚旅行，在普通世界中，我只在悉尼待过一天，除此之外，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我开的车子陷进了一条小河里，四个人来帮我把车拉出来。我一开始觉得很感激，但是有一个人开始提起“拯救”的费用，他说我欠他们八十镑到一百二十镑之间。他肯定是一个横行霸道惯了的人物，我有些害怕。最后我付给他八十镑，他勉强接过钱，他对英国人的仇恨很明显。我知道我是无法在这样的国家里继续居住下去的。

## 利比里亚

1965年是我旅游极多的一年，在去了澳大利亚之后的两个星期，我发现自己在利比里亚为《泰晤士报》做采访。三十多年前，在我与其他人所共有的世界中，我曾经和我的表妹芭芭拉一起步行穿过利比里亚[5]。它的首都蒙罗维亚的变化很大。我发现自己住在一个真正称得上是奢华的饭店里。我的目的是要采访政府的几位要人，我向人询问如何安排这些采访。“很简单，”他对我说，“把这活交给你的秘书就行，她能做安排。”她确实安排了一切，把所有的要人都邀请来一同与我会面，只有总统除外——其实我

5◎ 1935年，三十一岁的格林和二十三岁的表妹芭芭拉一起开始利比里亚之行，那是格林第一次离开欧洲，去一个遥远、陌生、离奇、危险的地方，目的是为了寻找探险的经验，也是要为一本新书寻找灵感。1822年，美国一个慈善组织从当地酋长那里购买了土地，成立利比里亚，安顿那些获得了自由的黑人奴隶们。所以，芭芭拉说，那里的黑人所说的英文有美国口音。格林与表妹的这次旅行历时三个半月，其间，格林曾重病一场，差点丧生。这次旅行让格林亲身体验了非洲的原始、野蛮、疾病和落后，同时，这样一个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大陆也对格林充满了诱惑和吸引力。这次旅行后，格林出版了游记《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

很高兴不与总统会面，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仇恨我，他是杜瓦利埃医生，后来成为海地的“医生爸爸”。

那个月里，我又去了次西非，那里有些村民非常仇视白人，情况很危险。有人建议说白人应该去和村民们谈判，负责谈判的人应该不带任何武器。我自告奋勇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虽然我的心中也很害怕。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个男人，有人问我有什么资格，我说我向来喜欢非洲人。村子里的局势一触即发，但是谈判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离开时，遇见一群修女，她们很高兴见到我们。

**苏联**[6]

一天夜里，我和四个同伴一起走在莫斯科的街上，一辆克格勃的车子开来，吓跑了我的同伴们，只剩下我独自一人。我觉得最好还是直接去问克格勃的官员们如何去欧洲饭店。官员说：“上车，我们送你去。”到了饭店后，有人给副官拿来一把很高的椅子，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是个侏儒。我问他为什么夜间不许人上街，他回答道：“我们要保证街道的安全。”我说：“如果不允许任何人上街，那这安全是为了谁呢？”他认为我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会考虑此事。

6◎ 因为格林一直反对美国，所以，人们也就认为他有亲苏倾向。格林曾经多次去苏联。

## 古巴[7]

有人开车带我经过古巴的边境。在那里的一个办公署中我和一位政府部长交谈。带我去那里的朋友对我保证说他们会给我一辆车,这样我能向南行。但是我对于古巴的革命已经厌倦了，不愿意去冒这个险。部长一如既往很不合作。我的朋友说所有的牧师都离开了，现在农村全部由妇联干部们掌管——这些女人们都长得非常漂亮,但是这太可怕了!我告诉部长,我写过许多支持古巴革命的文章,但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帮助。他闪烁其词地说:“但是你看到的可比我们要多。”“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牧师喝醉酒。”他指的是我上一篇文章中写到的那个人物——在回家的飞机上我遇到的那个牧师。

## 南非[8]

我在南非时，一份南非荷兰人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关于警察拷打审问我的文章。所有的人对我都表示同情。我脱下左手的手套给他们看我被打折的手,但是我拒绝控告警察折磨了我。“他们只是对于我的回答很生气。”我说。我对自己这种宽容大度的态度很骄傲,但我也暗暗高兴别人把我看成是英雄。

7◎格林曾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多次去古巴,是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好朋友,写过许多支持古巴革命的文章。

8◎格林曾于20世纪70年代去过南非,当时正是南非种族制度的高峰时期,格林与一些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见面,包括他在这个梦中提到的作家勒若。

"是一个女人打折了你的手,对吗?""实话告诉你,我只记得两个男人。也许有女的在那里,但是对所发生的一切我记不清楚了。"我想给我的朋友,一个我所欣赏的小说家艾蒂安·勒鲁[9]捎一个信,告诉他我在开普顿。但是我又不想给他惹麻烦,所以我想用一个叫凡丹[10]的名字,他可能会认出这就是格林。

9 ◎ Etienne Leroux,1922—1990,南非作家,格林的朋友,农场主,60年代以创作先锋派小说而出名。

10 ◎ Vendant,英文"绿色茂盛"之意,格林的"Greene"与绿色"green"相似。

# 十二 阅读

我刚刚阅读完我的朋友，工党政治家乔治·布朗新翻译的《圣经》，这给我很大的乐趣(我在许多段落上做了记号)。我特别喜欢他对于圣歌的处理，因为这些歌总是让我觉得厌烦。乔治只保留了它们的一些片段，所以他们给人一种阅读纸草残片上的断章残句的好奇有趣的感觉。

ᔕ

在阅读鲍斯威尔[1]的作品时，约翰逊[2]的一句关于放屁的评论让我觉得很有趣。

“大教士们把屁藏在长袍下面，直等到这屁可以算做是女士们放的；女士们则要等到她们的屁可以算做是大教士的屁。”

ᔕ

一个很拥挤的晚会，大家都在自取食物和饮料。我去和克劳德·科伯恩打招呼，他正在和一个姓格雷

1 ◎ James Boswell，1740—1795，苏格兰作家，著有《约翰逊传》。

2 ◎ 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书编纂者，编有《英语辞典》、《莎士比亚全集》等。

厄姆的年轻作家说话，他们在讨论关于乔治·奥威尔[3]的话题。我说《1984》是一本很糟糕的小说，如同他其他的小说一样糟。只有他的散文还不错。

∽

一个名叫布伦登的耶稣会士的牧师就我对教皇的一些批评来与我谈话。我们见面时我问起他和诗人爱德蒙·布伦登[4]有没有亲戚关系，诗人是我的朋友。"没有！"他说，并且对布伦登的诗作做了很轻蔑的评论。他说布伦登已经大势已去没有花头了。

我回答说，因年龄渐老，每人都会这样，布伦登毕竟著作等身，他承认说《午夜溜冰者》[5]确实是首好诗。我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最后一句是"透过玻璃愤怒地观望"那首诗的题目，我开始翻阅他的诗歌全集，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首诗。

∽

有人给我看了萨谢弗雷尔·西特韦尔[6]的一本书，书中他说他和夫人之所以移居肯尼亚，是因为我曾经写过他们什么。他们在那里忍受着强烈的孤独，但是他们又下不了决心回来。有一句可怕而又真实的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孤独无法与人分享——它只会成倍增加。"

∽

我的出版商，汉尼蒙（Heinemann）的弗里尔

3 ◎ 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1984》。《动物庄园》出版时，格林曾经写文章对奥威尔进行支持，但是两人命中注定不会成为朋友。奥威尔无法忍受格林的天主教的思想，1948 年《问题的核心》出版时，奥威尔曾在《纽约客》上撰文谴责此书，一年后他又说格林是"带有左翼共产党倾向的天主教徒"。他还曾在 1938 年撰文指责科伯恩的新闻报道受共产党的控制。

4 ◎ Edmund Blunden，1896—1974，英国诗人与学者。一开始，他是格林的弟弟休的老师兼好友，后与格林逐渐熟悉并成为朋友。格林认为布伦登安静、谦逊、害羞、乐于助人，1932 年 12 月布伦登在书籍协会（Book Society）推荐格林的小说《斯坦布列车》为每月一书。50 年代他任香港大学英文系的主任，曾经多次与格林一起抽鸦片。

[7]，开始赞扬 C．P．斯诺[8]的小说，这实在令我惊讶。他说它们享有国际声誉，我表示异议，我说在法国，几乎没人知道他。而且，他的文风也非常荒唐。弗里尔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有一个人物“搞”了或是“干”了他老婆。但是我无法动摇他让人费解的仰慕之情。

ഗ

我想从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儿童诗园》[9]中选读一些诗歌给我的小儿子[10]听（在我们所共处的普通世界中他已经不再是孩子）。但是我找不到这本由珍妮特·亚当·史密斯编写的那本诗集[11]，我知道我在巴黎和安提贝斯的家中各有一本。我只找到一本插图很糟糕的选集，里面没有收入我喜欢的那些诗（包括我想读的那一首，其中有一句是“一种无法宽恕的罪过”）。我儿子很喜欢那些插图，这就更让我因找不到那本诗集而失望。最后，在他走了以后，我才在壁橱里找到了我想要的那个版本，但是为时已晚。

ഗ

我和一个法国朋友一起在巴黎散步。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那是一个非常维多利亚时代的巴黎。我们来到一个集市上，市场的外围有许多旧书店，中心有许多人在手工制书：有的摊子正在排版，

5 ◎ *The Midnight Skaters*，布伦登著名诗作，收于他的《诗集》。

6 ◎ Sacheverell Sitwell，英国作家，1897—1988 作品有诗集《格兰德河》，散文集《一日一夏》，艺术评论《南方巴罗克风格艺术》等。他和他的夫人从来就没有移居到肯尼亚去。

7 ◎ A.S. Frere，曾任 Heinemann 出版社总编，格林好友，格林早期的许多作品都是由 Heinemann 出版，直到弗里尔因与出版商不合而离开 Heinemann，格林也离开这个出版社，以后的著作主要由 Bodley Head 出版。他由 Bodley Head 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喜剧演员》就是题献给弗里尔的。

8 ◎ C.P. Snow，1905—1980，英国的科学家与作家。

9 ◎ *A Child's Garden of Verses*，出版于 1885 年。

10 ◎ 弗朗西斯·格林，Francis Greene，出生于

有的摊子正在装订。我在一家旧书店前停下来，我非常欣喜地发现一捆捆用绳子扎着的旧的《河滨杂志》[12]。一切都有些破破烂烂，但是这样的书店正中我意。在一捆中混杂着一本尼尔逊七便士系列的书——我想作者是布思·塔金顿——可惜这本并不是我想收藏的。但是，我找到了一本迪克·多诺万的书，可以增加进我所收藏的维多利亚侦探故事里，还有一本我所不知道的作家写的侦探小说。但是让我失望的是店主人说他店里的书只供借阅，不做出售。我继续逛市场，但是其他的摊子上主要都是参考书。

ഗ

最近，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的母亲读诗给我听——那些我小时候曾经喜欢，长大之后反而忽视了的诗歌，现在它们仿佛都有了新的意义。其中一首是罗伯特·布里奇斯的诗："你去何方，壮丽的船，白色的风帆拥挤一团……"

1936年。格林的大女儿露西·卡罗兰出生于1933年，两个孩子幼年时格林常在外旅行，二战时他们与母亲一起住在牛津，1948年，格林与妻子正式分居，所以，格林花在两个孩子身上的时间很少。维维恩曾抱怨说格林对他的孩子们似乎毫无兴趣，但是弗朗西斯后来回忆说二战期间他们住在牛津时，格林每次来看他们，总是要带着他与姐姐去大街小巷散步，而且玩一种"左，右，直行"的游戏。弗朗西斯21岁生日时，格林带他到前苏联旅行，他对儿子大加赞赏，并且很自豪地说："虽然他的脸上长着青春痘，但是街上的女孩还是会回头多看他两眼，这真让我高兴。"

11 ◎ 由Janet Adam Smith编写的史蒂文森的《诗集》(*Collected Poems*)出版于1971年。

12 ◎ *The Strand Magazine*，1891年创办，1950年停刊，以刊登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故事而出名，也曾刊登过吉卜林，毛姆，H.G. 威尔斯等人的小说。

十三 科学

## 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我读了一本非常有趣的著作，作者是一位女医生。她认为她发明了治疗一种致命的肠胃病的办法，这种肠胃病往往由一种叫做富格尔的病菌引起。她自己就饱受富格尔病菌的折磨，所以，她把这种病菌注射进黄蜂的身体里，然后让这只黄蜂蛰自己的肚子，她被治好了。她去询问一位做医生的朋友，朋友问她真的相信她被治愈了吗，她承认她也是半信半疑。但是他还是鼓励她继续研究下去。又有两位病人被治愈，第三位死去，第四位又被治愈了。她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但是又有两位病人死去了。医生朋友建议说治愈与否全靠病人自己的心理作用，要看病人究竟相信到什么程度。她因为这些坏结果和她自己的半信半疑而非常沮丧。她的丈夫自告奋勇帮助

她，他被注射了富格尔病菌，然后又接受了被黄蜂蜇的治疗，他的英勇行为得到了回报——他被治愈了。

## 太空

一个朋友给我看了两样东西，它们从天上掉下来，打通了他家的天花板。一件是一个圆圆的石头，可能是天然而成；另一件是一个白色的很帅的头颅骨，嵌在一种白色的如同大理石般的物质里。这件东西肯定是类似人类的智能者雕刻而成。这证明了在太空中确实有智能生物存在。

# 十四 爱情？

1965年7月，我度过了一个令人伤感的夏日的夜晚。我和一个女孩订了婚，但是她的母亲非常不喜欢我，盼望着我们这段感情快点终结。我们的神经不断受到侵扰，因此而大吵一场，再加上女孩的自尊，我把这场争吵推到极端，那个女孩要与我分手，我接受了。她母亲满面得意地听着我们吵架，然后就把女孩带到楼上去了。

我觉得既伤感又内疚，我知道我对最后结果所感到的轻松不会持久。房子里面正在开一个晚会，那个母亲又出现了，手挽着女儿，她瘦小虚弱得随时都要呕吐出来。她母亲对我说快去找个什么器具来，我找到了只花瓶，女孩呕吐在花瓶里。我感觉到可怜、内疚和爱，我第一次意识到她有多么爱我，意识到我所失去的是什么。

在客人当中有一位是亨利·摩尔[1]，我离开房间

1 ◎ Henry Moore，1898—1986，英国雕塑家。

时向他道歉说我没有早些认出他，因为我太沉浸在我的争吵之中。我离开了房子，和女孩的哥哥一起出去散步。他对我们俩都很同情。我们遇到她的父亲，我一直很喜欢他，我向他恳求道："我并不是一个十足的坏蛋，对不对？"他微笑着安慰我。

等我回到房子里时，那个女孩也在那里。一切恢复原样，我们也和好如常。

# 十五 一次小报复

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曾有过一次小报复，它就如同在我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中的报复一样，让人觉得甜蜜。这个小报复非常特别，因为它是我始料不及的，那是在1988年11月20日下午。

当时我正要离开我在巴黎的公寓，我的妹妹伊丽莎白和她的一个朋友突然来看我。我请她们去附近的一个平常挺安静的小咖啡馆坐一会儿。这天咖啡馆里的人比往常要多，我正犹豫着是否要进去时，伊丽莎白声音尖刻地问就近坐着的一个正在写着笔记的男人："你总是戴眼镜吗？"

"不是。"他回答道，声音很惊讶。

"你能把它摘下来吗？"

他摘下了眼镜。我妹妹说："对了，我肯定认识你。"她对我解释说："他是一个律师，曾经在四起诽谤罪中指控你。"

1 ◎ Green—绿
Greene—格 林
Screen—屏幕.

“他赢了吗？”

“最多每次都不超过几百镑。”

咖啡馆中所有的人都侧耳倾听着。

“您就是绿先生？”那男人问。

“我的名字是格林，”我告诉他说，“不是绿先生，但是我想你会认为这两个名字都是屏幕。”[1]

# 十六 我的犯罪生涯

我发现自己和一个女人一起参与了一起谋杀案，我们把尸体藏在一辆货车车厢里——从一个方向走过去的行李搬运工看不见尸体，但是别人还是能看见。我们开始逃离现场，但是回过头去，我看见已经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

在火车站口有一个关卡，但是我们安全通过了。在火车站广场的出口处还有一道关卡，那里有人排着队。守卫正在打电话，可能是有人警告他出现了谋杀案。我推挤着过了关卡，但是我的同伴被拦住了。

我快速走在街上，在第一条岔路上转了弯，这条街通向另一个火车站，我在那里和我的同伴会合。她也成功地骗过了守卫。我告诉她我们最好乘上第一辆离站的火车，去哪里都行。一辆火车正在启动，我们没买车票就爬上了火车，后来又从检票员那里补了票。我们发现这辆火车开往马恩河上的某个地方。

“这个地区可真够阴沉沉灰蒙蒙的。”我的朋友说。

“没关系。”我说，“如果我们留在巴黎的话，他们只需去搜查一个地方，现在在马恩河上他们要搜查成千上万个地方，而且，我们很快就要到东方去。”

不幸的是，在车厢里，就在我们后面坐着一对爱管闲事的夫妻，那个男的正在阅读一份报纸，里面有一篇关于这个谋杀案的文章。我的朋友戴着一顶非常惹人注目的尖头帽，我担心这会出现在报纸上。我叫她脱下帽子，把它团放在我的膝盖上。

与我们同车的旅客还在喋喋不休地问我们问题。我告诉他我们在合写一本小说——那是部关于罪犯的小说。其实，根本说不上是罪犯，也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大的罪过。故事是关于一群行吟诗人，他们偷了鹿肉，又偷了柴火烧着吃。

∽

我和我的情妇住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警察因一桩抢劫案在追拿我。一些偷来的东西被藏在这个房间里。从窗口望去，我看见警察正在准备袭击我们。我下定决心要拒捕，突然整个房间里布满了长着蓝色翅膀的小鸟，它们飞前飞后如同一大群鱼一样。当它们开始降落在我的肩头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充满了恐惧和厌恶，因为我向来就害怕接触鸟类，后来我的恐惧消失了。我能感觉到它们贴着我的脖子，如同柔软的小猫一样。我的整个情绪改变了，爱取代了恐惧和挑衅，等到警察冲进屋子里时我束手就擒。他们允许我跟在他们后面，来到其他的犯人聚集的地方。我们都进了一辆黑色的马利亚车，在路上有一个犯人想用手铐攻击一个警察，我制止了他。

∽

1965年5月我偷了一件东西，虽然它看上去就像一小堆破碎的黑色花边，但其实它非常贵重。这如果被发现的话，我将要被关进监狱很多年。一个便衣女警察前来搜寻我的公寓，她虽然对我颇为同情，但是仍然很仔细地搜查。很长一段时间，我把那些小碎片藏在手心里，但是我担心她会来对我进行搜身。在她忙于别的事时，我把碎片藏在一盒糖块里，并使劲把它们塞进糖块的下面。不幸的是，她最终还是过来打开了糖盒子往里面看。我希望这盒子里漆黑一团，这样她就看不见里面黑色的东西。她看了许久，然后关上了盒子，搜查总算结束了。

我问她，现在警察是不是满意了，因为在我的公寓里没有隐藏任何东西。她同意了，但是我并不信任他们，因为他们可能随时会来突然袭击，于是我便使劲想一个更安全的隐藏的地方。也许我真的吸取了教训，因为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我没有再犯过偷窃罪。

## 十七 令人不愉快的经历

我有过一次令人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我发现虾从我的阴茎里顺着我的小便爬出来。在抽水马桶里大约有十二只虾,还有一只海螯虾。

∽

我与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妓女一起坐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小饭店里[1]。我怎么会选中这个妓女——难道是出于怜悯?我礼貌地和她说着话。我觉得她看上去不像一个妓女,我也希望她真的不是。我听到邻桌有人在提我的名字,但是我想方设法也听不到他们究竟在议论我什么。她肯定指望着我饭后回到她那里去,我该怎么办?我竟然告诉了她这是我最喜欢的饭店,我真是太傻了。我想,我下几个月不能再来这里吃饭了,因为她可能到这里来找我。

也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分头离开了饭店,我想过悄悄转向另一个街角开溜,但是我觉得这样

1 ◎ 格林与妓女的关系,详见导读。

做太不公平，太不善良，这时候我听到她说“喂”。我尽量向她解释那天下午我无法与她回家，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而且我也太累了。她问我是否有时间去街那头的一个教堂里看一个宗教艺术的展览，虽然我根本不想去，但是我还是答应了，同时，我把一百法郎塞进她的手里。

# 十八 会说话的动物

我自己的世界的一个迷人之处是动物和人类一样能说会道。例如，1964年10月18日的夜晚，我抚摸着一只虎斑猫，她用清晰的声音低声告诉我，那天她杀死了四只鸟。因为我不喜欢鸟，所以我假装生气地指责她，她颇为悲怅地回答我："但是你知道，我把它们卖了四十二法郎。"

∽

一只野性十足、汪汪直叫的小狗非常不欢迎我进房间。这让我既担心，又有些害怕。我转身背对着他时，我能感觉到它要咬我的脚跟。我对着他挥动着手指，大声责骂他，他躺倒在地上呜咽道："你要惩罚我吗？"我回答道："当然要惩罚你。"他因为害怕在地上吐了一堆泡沫。

∽

我住在海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只非常聪慧明

智的狗前来访问我。我以前曾经见过他和他的主人一次。他长着密集拳曲的黑毛。他自己打开门，进来躺在我的膝盖上。他充满渴望地问我："我是否比钻石跑得更快？" 钻石是一只猫。我说："是的。"

"我是否比……更快？"他提到另一条很老的西班牙种狗。

"是的，"我说，"但是记住他可是很老的狗呀。"

后来，他把爪子放在为两个人摆好餐具的饭桌上，并且悄悄伸向糖罐，我因此而责备了他，我轻轻敲打着他的爪子，他离开了房间，自己打开门并且把门关上。

ഗ

在米兰，我和我的朋友伊芙[1]以及她的塞特种猎狗桑迪一起，伊芙进了教堂，我转身找桑迪，一个过路人说他跟她进了教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跟她进去的是另一条狗。桑迪走失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很快就要离开米兰。我去了所有的大街小巷，叫着他的名字，越来越着急。最后有个人说："他在那里。"一只塞特种猎狗充满热情地跳跃着向我跑来。等我把他带回到饭店后我才注意到他的颜色不对。我又回到街上，呼叫着"桑迪！" 让我宽慰的是他总算回来了。他对我说："如果我带着一只手提包，里面放些可以乘坐出租车的零钱，那该多好。我走失了，可是我连饭店的名字都不知道。"

1 ◎ Yvonne Cloetta，格林最后一位情人，本书的前言作者。伊芙与格林同在安提贝斯生活，但是他们从未住在一起，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公寓，格林每天早上写作，伊芙中午时分会到他那里，两人一起去他们最喜欢的餐馆吃午饭，下午带着伊芙的狗桑迪出去散步或会朋友。每天伊芙在下午六点左右回自己的家之前，总是先要把格林的晚饭准备好。晚上格林则阅读或是修改手稿。

# 十九 疾病和死亡

我要去做背部按摩，那个按摩师——看上去是个美国人——注意到我的脊椎最下端的屁股上有两个黑点。他说这黑点必须得取出来，他使劲掐住一点，同时滔滔不绝地进行评述。他成功地拔出了一点，但是非常疼痛。我转过头去，心想他取出的可能最多像火柴头那么大，但是他手上拿着的是一只包在透明薄膜里的挪威海螯虾。

“它还活着吗？”我问。

“当然活着。”他说。

“我想我能感觉到它在慢慢吃我。”

按摩师因其努力而大汗淋漓，他擦着额头。“它并不吃你，它像一个植物，只是躺在你的身体里，就像躺在地里一样。”

他开始去拔第二个，这次更困难。他说：“它们会让你生肝炎，所以我可能是及时地救了你。”

他发出一声愤怒的惊呼，我想他把第二只的头给拉出来了，但是把身体留在了我的肉里。

ℌ

我的母亲去世了[1]，我们必须把她的尸体从床上抬起来，搬到另一个房间去。我不想帮忙，但是我必须帮忙；我不想看到她，但是我也必须看。她的身体又瘦又干，已经皱得缩起来了。搬运她时让她站立会更容易，她很像我许多年前死去的大姐。

在我搬动她时，我听到她的尸体说话了。她说："冷呀，冷呀。"我对其他人说她还没有真死，但是没有人注意我的话。我对母亲的尸体说我会生火，这样很快就不会冷了。尸体没有回答我，我的心中升起一种可怕的怜悯之情，好像人死了之后仍然会受到折磨。

ℌ

我和别人讨论关于死后消亡的恐惧。我开始告诉他们我的一个梦，梦中说，对那些相信的人来说，死后仍有着什么。在梦中，那些我爱着的人都呼唤我去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因为我缺乏信仰，我选择了完全消亡。一个巨大的如同熄灭蜡烛时用的锥形物将要降落在我的头上。

在后一次的讨论中，我争论道，无论我们信仰什么，我们都害怕完全消亡。

1◎ 格林的母亲于1959年9月22日去世，她去世之前两周已经处于无知觉的休克状态，在自传《一种生活》中，格林这样描写他的母亲："她去世前处于休克状态，没有什么能再打扰她了，我坐在她的床边看着她，她金雀花般的苍白的脸让我想到棺柩上躺着的大理石武士。我记起家里相册中的那个身材高挑、美丽安静的女孩，她穿着条长裙站在方头平底船上，纤纤细腰，戴着顶硬草帽。对这个女孩来说，这个平和的归宿也许正合适。"

在我自己的世界中，我发现自己在为一本题为《时间潮》的杂志的诗歌比赛写一首诗，当然不用说，那家杂志根本没有收到我的诗。诗是关于我自己的死亡。

从隔壁的房间里
电视在与我说话
关于病痛，风疹和草药茶
我的呼吸逐渐虚弱
就像薰衣草中的床单叠起
我的终结
如同儿时的茶点那般到来

# 附录 格林主要作品目录

(出版社和出版日期以初版本为准)

## 诗歌

*Babbling April*, Oxford: Blackwell, 1925 《咿呀四月》

## 长篇小说

*The Man Within*, Heinemann, 1929 《人在其中》

*The Name of Action*, Heinemann, 1930 《行动之名》

*Rumour at Nightfall*, Heinemann, 1932 《黄昏流言》

*Stamboul Train*, Heinemann, 1932 《斯坦布尔列车》

*It's a Battlefield*, Heinemann, 1934 《战场上》

*England Made Me*, Heinemann, 1935 《英国制造》

*A Gun for Sale*, Heinemann, 1936 《一支出售的枪》

*Brighton Rock*, Heinemann, 1938 《布莱顿硬糖》

*The Confidential Agent*, Heinemann, 1939 《机密间谍》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Heinemann, 1940 《权力与荣耀》

*The Ministry of Fear*, Heinemann, 1943 《恐惧部》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Heinemann, 1948 《问题的核心》

*The Third Man and The Fallen Idol*, Heinemann, 1950 《第三个人和堕落的偶像》

*The End of the Affair*, Heinemann, 1951 《恋情的终结》

*The Quiet American*, Heinemann, 1955 《沉静的美国人》

*Loser Takes All*, Heinemann, 1955 《输者必胜》

*Our Man in Havana*, Heinemann, 1958 《哈瓦那特派员》

*A Burnt-Out Case*, Heinemann, 1960 《精疲力竭的病例》

*The Comedians*, Bodley Head, 1965 《喜剧演员》

*Travels with My Aunt*, Bodley Head, 1969 《与姑母同行》

*The Honorary Consul*, Bodley Head, 1973 《名誉领事》

*The Human Factor*, Bodley Head, 1978 《人性的因素》

*Doctor Fischer of Geneva*, Bodley Head, 1980 《日内瓦的费医生》

*Monsignor Quixote*, Bodley Head, 1982 《吉诃德阁下》

*The Tenth Man*, Bodley Head, 1985 《第十人》(此书写于1944 年)

*The Captain and the Enemy*, Bodley Head, 1988 《上尉和敌人》

## 自传和回忆录

*A Sort of Life*, Bodley Head, 1971 《一种生活》

*Ways of Escape*, Bodley Head, 1980 《逃避之路》

*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Reinhardt Books, 1992

《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

**游记**

*Journey Without Maps*, Heinemann, 1936 《没有地图的旅行》

*The Lawless Roads*, Heinemann, 1939 《无法之路》

*In Search of a Character: Two African Journals*, Bodley Head, 1961 《寻找一个角色:两部非洲日记》

**戏剧**

*The Living Room*, Heinemann, 1953 《起居室》

*The Potting Shed*, Heinemann, 1957 《制陶工棚》

*The Complaisant Lover*, Heinemann, 1959 《殷勤的情人》

*Carving a Statue*, Bodley Head, 1964 《刻雕像》

*The Return of A.J.Raffles*, Bodley Head, 1975 《拉费勒的回归》

*The Great Jowett*, Bodley Head, 1981 《伟大的杰卫特》

*Yes and No*, Bodley Head, 1983 《是与否》

*For Whom the Bell Chimes*, Bodley Head, 1983 《钟为谁鸣》

**电影剧本**

*The Third Man*, 1949 《第三个人》

**短篇小说集**

*The Basement Room*, Cresset Press, 1935 《地下室》

*Nineteen Stories*, Heinemann, 1947 《故事十九种》

*Twenty-one Stories*, Heinemann, 1954 《故事二十一种》

*A Sense of Reality*, Bodley Head, 1963 《现实生活》

*May We Borrow Your Husband: And Other Comedies of the Sexual Life*, Bodley Head, 1967《能借你的丈夫吗和其他情爱喜剧》

*Collected Stories*, Bodley Head & Heinemann, 1972《短篇小说集》

*Collected Short Stories*, Penguin, 1987《短篇小说集》

The *Last Word and Other Stories*, Penguin, 1990《最后的话及其他故事》

*Complete Short Stories*, Penguin, 2005《短篇小说全集》

## 文集及其他

*British Dramatists*, Collins, 1942《英国戏剧家》

*The Lost Childhood and Other Essays*,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51《失去的童年及其他》

*Collected Essays*, Bodley Head, 1969《文集》

*The Pleasure Dome: The Collected Film Criticism 1935—1940* Secker & Warburg, 1972《喜乐宫：电影批评文集 1935—1940》

*Lord Rochester's Monkey: Being the Life of John Wimot, 2nd Earl of Rochester*, Bodley Head, 1974《罗切斯特爵爷的猴子》

*An Impossible Woman: The Memories of Dotterressa Moor*, Bodley Head, 1975《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

*J'Accuse: The Dark Side of Nice*, Bodley Head, 1982《我控诉：尼斯的阴暗面》

*Getting to Know the General*, Bodley Head, 1984《熟悉将军》

*Reflections 1923—1988*, Reinhardt Books, 1991《思考：1923—1988》

# 遭遇格林

余 斌

除去上高中的阶段，大学本科的四年算得上我读文学书的又一个饕餮时期，读的大都是外国文学的译本。老祖宗的书也读，比如《红楼梦》，本科快毕业的那段时间人文社推出一个新的版本，便又结结实实地读了一遍。但《儒林》、《红楼》那样的书，都是重温，即便没读过的，也不是读外国文学书那样的饕餮式的读法：读前没有那种强烈的期待，读时没有强烈的震撼，读后也没有天地色变，仿佛要换副眼光看世界。也别管是唐诗宋词还是明人小品，读后只觉沁人心脾的亲切与熨帖——倒好像在印证鲁迅的话：读中国书叫人沉静下去，读外国书则叫人想有所作为（大意）。

当然，读外国文学书那么激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没读之前就已经在等着被激动。那时候许多文学青年都和我差不多，求知上处在绝对的饥饿状态，

外国文学这一块尤其如此，就我个人而言，情绪酝酿之饱满，多少有些像“欧那尼之战”里那些准备为雨果揎拳捋袖的拥趸，来到剧院，就等着鼓掌叫好。

但是也并非所有外国书都如此，比如，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就并未让我激动不已。在我的阅读史上，格林的出现纯属意外：不是我去找他，当然，也不能说是他来找我，只好说是不期而遇吧。我对格林的接受基本上是业余性质，带有读其他外国书时不大多见的消遣性，“专业”性的阅读也不是没有，前几年就还给译林版《名誉领事》写过一篇导读性质的文章，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其时比诸其他当代外国作家，格林在我眼中不大上档次。

一

不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就是 80 年代初，我在《外国文艺》上读到格林一个短篇《永久占有》。这肯定是与格林最初的相遇。说《世界文学》与《外国文艺》是当时文学爱好者的《圣经》可能有点夸张，——从某个角度说，这两个杂志的影响恐怕还不止于文学，正像当时文学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了文学，我还记得同学间议论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刊于《外国文艺》？）时的兴奋——事实上订阅这杂志最初也只限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圈子里。印象中并非任何人走到邮局就可轻松订阅，像那时候的许多书刊一样，其身份在“内部”与公开发行之间保持着某种暧昧，至少《外国文艺》是如此。我得到开始的几期，都是熟人从上海寄来的。即使后来书店里可以看到，

这两种杂志也是一露面就很快售罄。

许多文革前出版的西方文学名著已然重新拿出来印,《世界文学》与《外国文艺》特异的诱惑力乃在于,它们仿佛引我们进入到外国文学的“现在进行时”。说“仿佛”,实因大体上并不存在真正的同步关系,像我那时醉心的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变形记》,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加缪的《局外人》、《鼠疫》,等等,等等,都是几十年前的作品,卡夫卡、加缪、萨特们,与我们中间隔着几十年的时间差。以今日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了解,也许不待查证发表的年代,仅凭书中的环境描写,也就知道写的不是当代的美国和欧洲,但我们一无所知,我对其中的时代也未留意,对于还生活在前现代背景下的人们,一战以后的西方文学就已经是和现在粘连在一起的“现代”。

我的印象里,上海的《外国文艺》较北京的《世界文学》更“现代”,从封面设计到内容都是如此,但《永久占有》是在《世界文学》上读到的。虽然此前也读过不少外国小说,《永久占有》还是给我一番“陌生化”的洗礼,若做横向的比较,那它所述,简直就像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因其时这边“伤痕”、“反思”一波接一波的,或隐或显,都在向我们宏大的历史和现实发话,格林那边则在给我们讲一个关于男女间的占有欲的故事。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男主人公那个已经分了手的前女友不断地给他写信,措辞看来无比得体且充满对二人的体贴和祝福,不经意间提示的却是她对男主人公的无微不知,以及过去那层关系的深层性质。格林绝口不提新婚妻子可能的妒忌,反是有几分夸张地写男主人公卡特的戏剧化的反应:那些信像定时炸

弹，说不定何时就会出现、炸响，而他被弄得神经紧张，像一头困兽。你可以说他很担心这些信在他和新婚妻子之间制造的裂隙，也可以说他对一起同居过十年的前女友太了解了，因太了解简直恨之入骨。我看到他在那里咬牙切齿、暴跳如雷就想笑，可惜他妻子不觉得可笑，她一直在为她的情敌行为的正当性辩护，最后发展到对卡特人品的怀疑。

照我习惯的方式，这小说就当导向对男主人公的谴责，谴责他的自私可笑，但"永久占有"这题目却将那不出场而以她如同紧箍咒般的来信显示其在场的前女友送到我们眼前，其缠绵包裹着的占有欲其实极富侵略性，有似温柔一刀。甚至那位看似深明大义的新婚妻子，格林写来也带着婉妙的暗讽。

倘以我现在的趣味，这里面我最能体味的，也许是格林不动声色的幽默，几十年前我也笑，不过这显然还不足以让我对格林另眼相看。在渴望启蒙的氛围中，幽默感好像也只能是局部的。的确是新鲜，不过当时《外国文艺》、《世界文学》上哪篇小说不让我们感到新鲜呢？

我记忆中更清晰一点的是《地下室》，收在一部英国短篇小说选里。主人公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因父母一段时间离家获"自由"而欢欣鼓舞，不料他的"自由"仍然是他一厢情愿的虚拟，因他仍得接受管家夫妇的管束，更糟的是，管家在家中偷情被太太逮个正着，争持之下，捉奸者被从楼梯上推下身亡，主人公恰恰看到了这一幕。

我对这小说的童年视角特感兴趣，沿着主人公的意识，成人世界充满骚动混乱，尤其显得难以接受。这个故事对我而言也成为生

活之残酷性的证据。开始时“小鬼当家”式轻松到最后死亡的出现，其中的震动不言而喻。他以为刻板严厉的父母挤占了他的那个空间可以短暂地获得，结果却是出乎意料地张见成人世界更令人惊悚、困惑的一面。想掉过脸去也不行，就像一个身体单薄的小孩竭力想关上一扇沉重的门，吃奶的力都使上了，就是关不上。印象尤深的是目睹惨剧之后惊恐地逃出去，逃出那个他弄不懂的世界，起先是怕路上的人把他截住送回去，过后迷了路又巴望有人领他回家，这时却发现没人理会他，直到他大哭出声。

有意思的是，这两天居然翻到了当年的读书笔记，里面恰有从《地下室》抄下的段落：“他从来未想到原来这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指他的哭泣引来关注)，你只要表示认输，承认失败，需要人家的怜悯，这就成了……”

根据引文前后我的议论，摘抄还并不是因为佩服作者对儿童心理的准确把握，而是与关于小说中可否议论的琢磨有关。也许当时文学界正在讨论这问题？大概吧。反正我以为“你只要表示认输，承认失败，需要人家的怜悯，这就成了”云云，不大可能出于主人公的意识，只能是作家就势(就人物当下心态之“势”)的“总结”与“提高”。后来我发现格林常来这一手：让叙述者的发挥渗入人物的意识，两相交融，难分彼此，获得某种意蕴的升华。当时我只是在推敲，这算不算是“议论”？若是，这样的议论够妙的，有何不可？至于“总结”、“提高”一类的字眼，出处乃在其时流行一段顺口溜，贬损某一类领导或秘书的，曰“戴眼镜，夹皮包；会总结，会提高”。当然我的拿来主义，是反其意而用之。

像这样又是摘抄又是用心琢磨的，足见对外国文学的虔敬态度。但我对格林并非特别倾心，甚至他的名字也是模糊的，提起来就说“那叫格什么姆”的，以便将他与写童话的德国人区分开来——渐生情愫是后来的事。我说不是我去找他，实因像萨特、福克纳、卡夫卡、加缪等等，都是认人头找上门去读。

仿佛无形中存在着一份必读书目的书单，而一段时间里必有某位外国作家是大热门，不读则有自弃于圈外之嫌。我那时候读书可以说是紧跟形势的，而格林不属于这“形势”。所以很长时间里格林对于我，就是几个孤零零的短篇，不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作家。而在读了他稍长些的作品之后，我对他的兴趣不升反降。

## 二

我不能断定读的是《一支出售的枪》抑或《炸弹宴》，也许都看过。情节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后者是个薄薄的小册子，此外就是好像出版者是往推理侦探里归类的。我对这类小说的态度，是居高临下与自卑的奇妙混合。一方面以为这不属真正的文学，供消遣而已。另一方面，福尔摩斯探案、阿加莎·克里斯蒂、松本清张、西默农都看过，却都看得如堕五里雾中，多数未终卷即弃而他顾。《东方快车谋杀案》也能把我看得晕头转向。既然涯岸自高，看不懂原也不必沮丧，不过侦探推理，人称“智力游戏”，从纯智力的角度说，人家看得津津有味你莫名其妙，有点说不过去，——岂不是说明你智商太低？

这块心病直到某次与一朋友同看侦探片出来谈了一通之后，才

算霍然而愈。这位老兄于侦探推理之类,也不大拎得清,那天出了电影院,两人对来龙去脉都不甚了然,平日在一处不大谈这些,在众人面前怕露怯,也都不懂装懂地蒙混过去。也是关系较近的缘故,他便试探性地问我片中的某处关节,这一问,眼见得他也不懂了,我便坦白,说没看明白。岂止是一处?这里那里,打不通关节处且有呢。二人讨论了一番,仍是难得要领,也就不再试图寻根究底。到最后干脆承认,这方面就是低能。服输、认栽,有时的确也可以有令人愉快的性质,二人好比不扮伪君子,做回真小人了,都有一种放下架子的轻松。与一人相比,两人也算人多势众,就敢反问:不懂又有什么大不了?有此一问,石破天惊,真有一种解放的感觉。

但这是后话,看上举格林小说的时候我还端着。一度以为侦探推理这道坎我迈过去了,让我产生此种错觉的,便是格林的小说。归为侦探的,我居然读懂了,从头到尾,似乎并不存在什么晦暗的地带。我怀疑我之看不懂侦探推理,与一开始受到柯南道尔的打击转而怀疑自家的智力,以后下意识取了"应试"的态度有关,好像看这类书就是在做智力测验,有点看不懂就紧张,一紧张就更闹不明白。格林的小说既或能做通俗小说的类型学归类,他也不是侦探推理方面的名家,我大概因此比较放松。此外格林除了曲折的故事之外,还一以贯之地提供他其他小说中固有的人性观察,逻辑推理以外的东西,那是我所熟悉且更感兴趣的。比起地道的侦探推理小说来,他的故事没有多少故布的疑阵,也缺少盘根错节步步为营的推演,我因此能够涉险过关也未可知。可以料到的是,带着格林给我的盲目乐观重返正宗的侦探世界,被打回原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按说格林让我建立了自信，即使后来被证明是虚幻的吧，我也该心存感激才是。事实上我的态度却近于忘恩负义，因他写侦探小说(且不说其中的似是而非)，似乎更有理由对他表示不敬。

“纯文学”这个概念，我是到大学以后才知道的，知道之后就以一种夸张的热情攀住不放，以当时的氛围，不去追求纯而又纯，等于在文学品位上甘居下流。力争上游同时也意味着清理门户，不断地将有不纯嫌疑者清理出去。何谓纯何谓不纯并无一条明确的界线，但大体上越是读不懂就越见其“纯”。硬着头皮啃下最难读的书，就有底气，大可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之概了。格林曾将他的小说分为“消遣作品”与“严肃的文学作品”两类，分明说他有一部分作品态度是很“纯”的，不过常在河边走，难保不湿鞋，还没读过他多少作品，我对他的判断已经有了，他也只能自认晦气。

即使他的“严肃的文学作品”，在我那个对文学过于严肃的阶段，也还是伤于好懂。好懂 = 通俗 = 俗，这是当时不少文学信徒不成文的公式。好懂与难懂的分界，一在是否包含晦涩艰深却又足以振聋发聩的哲学、宗教意味，“晦涩艰深”与“振聋发聩”意似相反而实相成，恰好对应着我们文学期待的一体两面，前者指陌生新奇因而难于索解，后者是自以为了悟之后须达到的启蒙震荡。萨特、加缪、贝克特、卡夫卡就能给我这样的震荡，比如《局外人》里的默尔索，坚称是阿尔及尔海滩上刺目的阳光引发了他的杀人冲动。这阳光于是穿透我的意识，照彻“存在”赤裸裸的“荒诞”。格林《问题的核心》里的非洲阳光也把主人公弄得很不适的，却哪里有直透“本质”的锐利？

那时的人盼着被启蒙的愿望如此之强烈，好像就等着承受当头一棒，格林担当不了当头棒喝的角色，虽说他的小说里不乏终极性的思索，却是包裹在故事之中，并非直指“存在”。这就要说到与一相联系的二：格林的小说不够“现代派”。我所崇奉都是不仅“现代”而且都是“派”的，至少我认定他们够“派”。“现代”的重要标志是摒弃写实，变形、象征，要不就意识流，格林则还在一笔一画地写实。19世纪的作家也就罢了，时代局限嘛，20世纪的小说家还来这一套，等于宣布自己与消遣性的作家同流合污。不仅如此，格林还颇注重讲故事，这差不多就等于数罪并发了。

——什么年头了，还讲故事？古典作家也讲故事，那是因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其时还搅在一起，混沌一团。故古典作家是应予谅解的，就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一干古希腊人未皈依基督教情有可原（但丁《神曲》里他们享受的就是与后来的异教徒不同的待遇），既然那时耶稣基督还没有诞生。格林生当现代派风云际会的时代仍然醉心于故事，只能说明他抱残守缺，未免太不“先锋”。正是写实、故事让他的小说“通俗易懂”的，所以前面的公式还可以补充一下：好懂＝写实＝故事＝通俗＝俗。凡专注于讲故事的，或有故事性与“纯”的指数，恰成反比。

我们对“难懂”的敬意也不独表现在文学的范围内，绘画、音乐等等，也是如此。也不能说越是看不懂就越是顶礼膜拜，但对那些也许看得云里雾里、晕头转向的书，确乎充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比如绘画，有次中央美院袁运生、袁运甫一干人在南师大美术系搞展览，好多人去看，袁运生的画，特别是自画像，让我激

动不已，远过于其他人的作品，因为变形的更厉害，更抽象，更远离写实。放到现在，没准我喜欢的还是袁运生的那些，不同处在于，现在或许是基于更具体的理由，那时则是基于抽象的原则。

我还记得班上有一同学好恶作剧，有一回不知是他自己在一张纸上乱涂了一番，还是从哪儿拣来了一张，总之他贴在墙上，说是现代派的画，一本正经招人来观摩，众人都不解，连正反也看不出来，却都一本正经地看，闷头使劲想看出点“意义”，谁也不往简单里想，什么幽默感之类，基本上是免谈。

这样的氛围对格林无疑不大有利。其实大学期间我就买了他的《问题的核心》，外国文学出版社的。也翻过，这是后来我最喜欢的格林作品，当时却没看完，以为不够“高级”。买这书并非因为对格林有特别的兴趣，当时买书，外国作家从优，买得本就多而滥，此外与《一支出售的枪》、《炸弹宴》相比，书名看去很哲学很“高级”，如此而已。可惜没看完就束之高阁。我和格林的真正相遇，因此整整晚了十年。

## 三

完整地读《问题的核心》已是 1990 年的事，非常地偶然。其时我父亲患肝癌住进了医院，发现时就已经是晚期，可以想象全家人那时的震惊。入院没多久，全家人就已开始二十四小时的轮流陪护。我通常是在夜里值夜班。最后的一个月，父亲肝区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夜里几乎不能入睡，也没有气力说话，起先我还常跑去找医生，后来发现他们也无计可施。记不清是何时开始注射杜冷丁，只记得

很快就不大管用。有几次父亲攥了我的手，喊我的名字，说："我痛啊。"我站在那里，靠得那么近，看他辗转反侧，表情痛苦，什么也做不了。那时我甚至有一股莫名的愤怒，恨医院，恨自己，同时也可以说并无明确的对象。待一阵疼痛过去，他又会昏睡过去。这时我会回到旁边的沙发上，陷在里面歇一阵，愤怒烟消云散，取而代之是一种无力感。我和父亲一向沟通地并不好，因为那场风波，关系一度甚至称得上紧张，自他入院以后，我便隐隐有一种罪感，那时为他能够情绪好一点，少一点痛苦，我想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是近在咫尺，什么也做不了，连替代他疼一会儿也不可能。就像你在向一个坠向深渊的人伸出手想拉住他，就是拉不住，眼睁睁看着下坠，下坠的慢镜头。

这种无力感在父亲明显地感觉到疼痛之前就有了。我不知道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医院的那种氛围让我读出了弥漫在格林小说中的无力感，抑或相反，是因为读了《问题的核心》让我对人的无奈的意识变得清晰和强烈起来。

在父亲病情相对平稳的那段时间，我在病房里租了张躺椅，放在病床旁边，以便他熟睡时可以躺一阵而有动静又因距离近较容易醒来。但事实上大多数时间我都就着沙发边的落地灯在看书。这种时候我挑了带去的书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得不看的书，比如为了备课，二是纯消遣的书，比如金庸的武侠或张恨水，另有一类性质特别，是读得很熟，随时可以拿得起放得下的书，比如周氏兄弟。格林的书哪一类也归不进去。有次急着赶往医院，无暇细择，随手从架上抄起一本就走。待父亲睡去后从包里取出来，却是《问题的

核心》,颇让人失望。但没有别的东西可看,也只好读它,夜深人静无法入睡又无事可为的时候,无物可读是可怕的。

出乎意料的是,一读竟读进去了。这小说想必喜欢格林的人都熟悉的:主人公斯考比原是个极守规矩的天主教徒,二战期间他在一英属西非殖民地服务,很尽责、于浮世名利无所求的一个人,循例升迁的机会失去了也不恼。但周围的世界却将他拖入烦恼之中,首先是与妻子之间的危机,为送精神压抑的妻子去南非度假,他向一叙利亚商人举债,即受制于人,其后主要是出于同情而非情欲,又与一流落该地的年轻寡妇海伦发生关系,待其妻归来,斯考比越发苦恼万端地挣扎于两个他所爱的女人以及自己的罪恶感之间,此外还因侍奉他多年的忠仆的被杀(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终至精神崩溃,服毒自杀。

我要拼凑这故事的梗概,意在说明那个时空与斯考比面对的困境离我是如何的遥远。但是西非小城的燠热的天气、烦人的雨水,还有刺目的阳光,连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仿佛都挤进我待着的病房里来,将我包围。接连两个晚上,耽读此书,居然读完了。我说“居然”,实因狼吞虎咽读书的阶段早已过去,不管是专业的训练还是年龄的原因,都已让我更倾向于细嚼慢咽,如此酣畅的阅读经验,很长一段时间里,极少有过,除非是读金庸,那是又一说,感觉是别样的。读一阵就避到病房阳台上去抽一支烟,并非为了提神,似乎也并不造成阅读的中断,看下面大面积的黑暗还有一些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格林的世界与之无关联,又似有关联。

后来知道,这部小说是被归入“宗教小说”的。格林本人是天主

教徒，笔下好些主人公都被赋予这重身份。他们都面对着一些信徒特有的问题吧？对此我毫无反应，一旦打上明显的天主教印记，我就觉得隔膜，唯当宗教问题转换成普遍人性问题时，我才能感同身受。好在至少是对于我，基本上不需要什么刻意的转换，——格林小说里充满“人性的因素”，不经天主教的“窄门”，我觉得我也能理解。也许这样的理解里漏失了些什么，但有些并非不属“问题的核心”的东西，我以为我捕捉到了，比如小说里的悲悯和无力感。斯考比深具悲悯之心，他是个有同情能力的人，在这一点上，他让我想到贾宝玉。鲁迅有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问题的核心》中，对超于个人的大悲有体悟的，也只有斯考比一人。惟有同情之心，才更意识到一己的无奈，斯考比并无拯救世界的宏愿，问题是他真切地爱妻子和海伦却一点不能提供真正的帮助，相反只能让自己陷入更深重的罪感之中。

有的时候，真正的阅读确乎需要一点机缘。卢卡契在狱中对卡夫卡大起共鸣即是一例。作为马克思派的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对现代主义的作品一向是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持峻急的批判态度的。后来他被东欧的极权主义者们捉将官里去，在狱中读他过去不屑一顾的卡夫卡，忽有所悟，大概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正像卡夫卡笔下的世界一样的荒诞。阅读和经验的重叠会比一切的概念和原则都更有说服力。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具体的对应关系，斯考比这样的人物离我也太远了，但我相信在那段时间，在医院里读格林，是我从此无保留地接受这位作家的重要原因。一旦当真进入某种想象性的体验，一切先行的僵硬要求，比如“哲理”、“深刻”之类，便即土崩瓦解，

或者你从那体验之中,说不定就感知了某种深邃。

病房中读《问题的核心》那次经历对我后来读格林的其他作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关键还不是这以后找上门去读了,而在对格林的理解就此打上了底色,不管读他哪一类型的作品,最后九九归一,总会读出在《问题的核心》里读出的东西。他将自己的小说分为"严肃的"和"消遣性的",还有更细的分类,比如"宗教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等等,或许"格林印记"在不同的类型中的分布不是等量的,但这对我不重要,我也从不在意其间的差别,除非打算写论文。

在我看来它们有着同样的格林印记,相较而言,题材的特殊性、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实在算不了什么。比如《问题的核心》是"宗教小说",《名誉领事》被归为"政治小说",《人性的因素》就题材而论,属侦探性质;《问题的核心》背景在西非,《名誉领事》在南美,《布莱顿硬糖》难得地让故事发生在英国本土……既然要自己去贴标签,当然也就各有用意,格林甚至还曾为一些小说标出了关键词,在《恋情的终结》,是"爱和恨",在《机密间谍》,是"信任和怀疑",在《权力与荣誉》,是"纵情放任",在《问题的核心》,是"责任和怜悯"。 但是在我的阅读中,都是打成一片,至少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事实上格林一方面给自己的小说归类,另一方面也在消除其间的壁垒,谈及那部颇为"侦探"的《人性的因素》时他就强调其非侦探的一面:"我想用非浪漫的手法来描绘作为生活方式之一的情报部门的工作,刻画每个人物更重要的内心世界。那里的工作人员每天去办公室上班,退休后拿养老金,跟其他任何职业——比如银行职员和公司经理没有

什么两样，既不危险，也不新奇。”

随格林进入到“更重要的内心世界”，身份、职业这些外在东西即失去了重要性。情报人员与神职人员，外加黑社会人物，也许是格林世界中距普通人最远的，然《人性的因素》、《权力与荣耀》分明让我们看到书中的主人公就其内心而言，与常人无异，不仅如此，他们的特殊领域甚至也可以呈现为“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这是格林的一大本事：他能让他笔下的特异世界（想想南美、越南、非洲）中的人物（不论如何特别）不失其特别性而又成为可以理解的普通人。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人性的因素”，而又皆关乎“问题的核心”。

我不知道这么理解是否与受到张爱玲的暗示有关。张在国语本《海上花》序中对中国章回小说有一点不满，即“缺少格雷亨·葛林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一直想弄明白格林在什么场合下说的这话，却没查到。但张肯定不会是无中生有，格林关于《人性的因素》的夫子自道可说已经为此语做了注。我并不觉得张爱玲与格林有太多的相似，在别处似乎也未见她表露出对格林特别的兴趣，读张而联想到另一英国作家毛姆要比联想到格林顺理成章得多，但就对表现“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之执着而言，两位小说家确乎心有戚戚。

## 四

将格林小说描述为一个悲剧性的灰白色的世界，又说读格林的小说有一种熨帖感，这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我的感受确实是如此。后一点来自格林的态度和引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他的态度是

悲悯和幽默的混合,他的方式则是在不动声色间引人入胜。

不知是否开始喜好格林恰在人到中年之际的缘故,我认定格林更是中年情怀的,虽则他的拥趸覆盖了各个年龄层次。这倒不在于他小说中予我印象最深又与他本人相近者都是中年人(比如《问题的核心》里的斯考比,《名誉领事》中的医生和领事,《人性的因素》中的卡瑟尔,《恋情的终结》里的男主人公),关键是他的感受方式大有中年意味,不是年轻人的情绪高涨,也不是老年人的看透世情,兴味索然。人到中年的体察,谙晓世情的观照,有讽刺而不剑拔弩张,入于尖刻;有同情而不演为戏剧化,绝不会流于滥情,涵容笼罩却又不乏敏锐。甚至格林的悲剧感都是有分寸的,读格林的小说因此如饮下午茶。下午茶大概算不上十足的英国国粹,却是英国风味十足。格林身上就不乏英国绅士味,不要看他老把背景放在远离英伦的边鄙之地,他的人物大多远非典型的绅士的做派,他笔底透出的却是绅士的气度:绅士的距离感,绅士的含蓄,绅士的平衡。

我不想把读格林的那种熨帖感尽归之于他的技巧,至少上面说到的那些是渗透到他的技巧当中去,或者说,和他的技巧打成一片的。他之对写实不离不弃显然是他葆有对读者亲和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对不显山不露水沉着地叙述一个故事的执着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的迷人之处,凡此,不当做刻意的选择而视为性情的自然延伸也许更合适。事实上,没有了他与他的感受方式、叙述方式之间的贴合无间,也就没了我们阅读的熨帖感,而恰好,他的方式是这样的。

格林的小说真的很好看。说到好看、故事、趣味,很容易扯出

“雅”与“俗”的话题。倘一定要拿“雅”与“俗”说事，那我们可以说，纯粹的雅人或俗人只是一种虚构，雅中见俗，俗中见雅的事例太多了。我的辩证法还没有修到雅就是俗、俗即是雅的无差别境界，有时候不免还是要分“雅”、“俗”。 大多数人身上大约都包容了从雅到俗的不同层次，对我而言，格林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即源于其小说同时满足了我的多种需求。

格林的小说有一种丰富性，包含了从“现象”到“本质”的诸多层次。他从来不会因为对“问题的核心”的执着而忘却这个世界的声色，不会为了严肃放弃对趣味的坚持，反过来一样。此所以越是到后来我越是发现，格林构成了我阅读趣味的一个基本面。说“基本面”，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会有寻找更纯粹、密度更大的“严肃”的冲动；有的时候，我会有得到更单纯更放松的愉悦的欲望。但那不是常态，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所需要的“严肃”和“消遣”，格林小说里都有了。所以如果不是像当年那样急于受教育，又不是百无聊赖地“杀时间”，而有了这样的意念：找部好小说读读吧，——那我就会去找格林，或者，格林那一路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他最佩服的两位作家，一是福克纳，一是格林。以我当初文学阅读上的势利眼，说不准早知有此一说，我会不会更早一些对格林刮目相看，拉美爆炸文学的领袖人物在80年代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可是有着至尊地位的。当然也未见得就会当作金口玉言，毕竟那时就知道，喜爱二流作家而写出了一流作品的例子，并不鲜见。悬在“个人话语”(即使是马尔克斯这样大腕的话)之上的是高雅与通俗、严肃与消遣的截然二分，文学上的“政治

正确”。格林不幸恰是它的受害者,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之所以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即因评委们认定他不能算是严肃的作家。天可怜见,他被提名足有二十次之多,一次次都是给别人当陪衬。

想来那些评委们和我过去的逻辑差不了多少。我实在应该更早就明白下面这个很朴素的道理的:写得好看不是罪。

# 入戏的观众

唐诺

我个人知道格林相当早，但真正开始读格林则相当晚，差了将近十年时光，看起来阅读一事也和生命中美好事物的光临一样，光是知道有时还嫌不够，还得仰赖一点点机缘。

结束这段知而未读踯躅时日的关键，只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那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我读到他一份访谈文字（只要有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个名字安于其上的任何文字，我从不会放它从我眼前没事走过去，多年以来，这已从习惯内化成某种本能了），被问到当代小说家他喜欢哪个时，马尔克斯的回答正是："威廉·福克纳和格雷厄姆·格林。"

30岁才开始的格林，当然，还有福克纳。

我很喜欢牢牢记住并跟人家讲这个阅读格林的简单经过，一方面是因为这确实是一趟不虚此行的

美好旅程开始，往后十几年断续读下来，我对格林的小说从未失望过；另一方面是，由此格林又变成我“阅读隔岛跃进”的另一个新跳板，由他的小说、由他的话语再次联缀到其他人、其他书，比方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当然，这书谁年轻时都念过，但因为格林它成了一部非得重来不可的新书了，这类的事在阅读时常有），比方说康拉德，或甚至写《来自寒地的间谍》、《镜子战争》的勒卡雷，勒卡雷是那种你傻傻遵循正统小说线索较容易错过的好小说家。如此，新的书新的人又会再牵扯出更多的人来，没完没了，这个宛如核分裂连锁反应的阅读经验，唯一的缺点是让你忽然贪生怕死起来，会不断跑出你坚持非读完才肯慷慨赴死的又一本书来。

“下一本书在哪里？下一本书就藏在你此时此刻正读着的这本书里面。”——我以为这符合了相当一部分的阅读真相。这本书和那本书之间，也许时间空间相去甚远，隔了几万里大洋或甚至更远更无以跨越的千年时光，但正如大导演费里尼讲的，它们仍可能做着相同的梦，担忧害怕相同的事物；或如阿根廷的盲诗人博尔赫斯所讲的，对相同的困惑一样发出询问。作为一个读者，你安静下来细细聆听，会听到书和书的以声相求，似在召唤同类，你不小心逮到其中一个，便可以像个聪明狡猾的猎人，你好整以暇，知道其他仍躲藏的如今只是假以时日的问题罢了。

正是书与书这样的奇妙联系，我们所赖以开启阅读的所谓机缘才成为可能——毕竟，单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或人名，往往不足以让你打开书本决志一读（谁不早早晓得一堆好作家、好书的名字呢？甚至还清清楚楚知道放哪家书店的哪个架子上），或即便勉强打开来，

却像调不到准确的频道般，怎么也接收不到书中的讯息。事实上，在书与书、人与人的有效联系之中，它所传递的除了名字之外，同时也必定携来了某种启示，某种不一样的观看角度和视野，或至少至少一个足以让你持续看下去的必要“支撑”，也许它就只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正如马尔克斯讲格林，或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说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是“整个 19 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之书”，但你真正接收到的讯息其实不单单只是这句话而已，因为讲话的人是马尔克斯或伯林这样你相信不疑的人，因为在此之前你读过说话的人一部部书，这一部部书仿佛在你心中堆积起来，把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化为高处之上的一根坚定的、有指示焦点的手指头（你是否同我一样，也想起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新马孔多村建造之前的那段话：“世界太新，很多事物还没有名字，必须伸手去指。”）你顺此登高得以望远，看到完全不一样的眼前风景，并由此找到进入之路，简单得像个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奇迹，并有点懊恼何以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就是没看出来。

这通常是阅读经验中最好的一刻。

下一本书就藏在这本书里，但这本书又在哪里？择书不如撞书，就格林吧，格林会是个很好的开始。

## 最会说故事的人

当然，每一个了不起的作家都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就像我们常讲天底下没任何两片雪花长得一模一样。然而，就算在如此认知

的基础之上，我们仍得再次强调，在所有的独特之中，格林真的是无以伦比，尤其就 20 世纪的小说发展实况及其限制来看，格林完成太多奇怪的事，少有人能像他那样。

首先，格林极可能是 20 世纪小说家中最会、也最专注于说故事的人，这里，我们讲的不只是他的小说数量，还包括他的小说实质内容。

从 1929 年出版《第二个自我》以来，格林整整写了 60 年的岁月，其中光是长篇小说就交出 25 部之多，其他还有短篇小说、剧本、自传、游记、诗集、论文集、报导文学、传记云云，非常吓人，对创作力，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力普遍陷于萎顿的 20 世纪小说（尤其是格林所从来的、开发过度的现代小说原乡西欧），格林的丰美是极其动人、极其醒目的。

格林不只写这么多小说，怪的是他还像 19 世纪伟大的写实小说家那样子书写——格林的小说视野宽广，格局恢宏，敢于碰触西欧小说业已遗失近百年的大题目，包括一场战争，一次政变或革命；而且格林始终执着于实相，认真创造人物，构思情节，让想象力在具体的世界之上奔驰，不躲不闪、不装神弄鬼，不在关键技穷之际莫名其妙地化成一道轻烟不见，就像你在 20 世纪小说中经常看到并为之气结的那样子。

格林的每部小说都是个好故事，这让他有余裕和自己的作品调笑——一度，格林把自己的小说分两组，分别标明为“正经小说”和“娱乐小说”，但这个玩笑没开太久就宣告放弃，原因很简单，即便由作家本人来分类，这两者也从未泾渭分明过，事实上，格林再阴黯再

严肃的小说都一样有着可堪读者享乐的好看故事和情节；同样的，再轻松再顽皮的作品，也都深沉专注，一句话，都一样是格林的小说。

其次，格林是最会写男女偷情的小说家，这方面，他的规格不只是20世纪，而是人类整个文学历史，没有任何人比他更会写偷情。

这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他的真实经验。格林于1927年结婚，并因此改信天主教，但他的婚姻和信仰都没因此安定下来，前者在他育有一子一女之后便宣告分居（天主教不允许离婚，因为他们直到今天还相信“神所结合的，人不能分开”），而改由长期的偷情来替代，至于信仰之路则更是无止无休的在怀疑中挣扎，这些我们都可从小说之中看出来。

不少人讲过，格林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总是次等的、陪衬性质的（“都只是鬼魂”），这话大体没错，但其实可以讲得更直接、更准确些，那就是，格林小说中的女性便只有在扮演情妇那一刻才焕发光芒——让我们说夸张一点吧，格林写男女偷情，几乎已届“至小无内，至大无外”的令人叹为观止境地，小从一句对白，一个看似自然的停逗，一个瞬间闪逝的失神，甚至一块晚餐桌上的无辜牛排（真的，见《恋情的终结》），其间都能层层叠叠地包藏着猜测、怀疑、嫉妒和怨懑等等奇怪的心思，而格林就是有办法把这琐细的男女之事搬上台面，联结上轰轰然的历史大事甚至成为关键，在《喜剧演员》中，男主人公布朗正是怀疑满口大话的琼斯少校上了他的德国大使夫人情妇，才借力使力把琼斯弄上山打游击，最终加剧了革命镇压，害死了琼斯，也让自己再回不去太子港，从而流落到多米尼加成了滑

稽的殡葬业者；在《沉静的美国人》中，英籍记者弗勒则因痛恨美国特工派尔偷走他的越南情妇凤，设计让这个年轻天真的美国人中伏遇害，丧生共产党之手；而更精彩的可能还是《麻风病人》，那位了无生趣、随着船走多远就是多远而流浪到刚果麻风病院的名建筑师奎力，误打误撞开车载送可怜的赖柯夫人入城验孕，却因为女人奇妙的心思，事后赖柯夫人一口咬定他是腹中小孩的父亲，因着一场不存在的、女人自我抚慰的想象偷情，被虔信天主的愤怒丈夫射杀。

相较起来，我们一直认为最会写男女微妙心思的张爱玲、钱锺书，原来是那么“文学”。

还有，也是比较无聊的，格林大概是和诺贝尔文学奖关系最纠缠也最奇怪的作家，他破纪录的被连着提名超过20次，却终其一生没能得奖。当然，这件事较丢脸的一方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那班人，意思是，长达20年以上的时光，他们的文学奖最终名单一直是可疑的、鉴赏力大有问题的。

最终，也是最特别的，格林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文学国度的创建者，这个国奉他为名，我们称之为“格林之国”。

## 格林之国的创建者

这里，我们先来读一段格林自己的话，那是《哈瓦那特派员》书中透过那位在哈瓦那卖吸尘器的小商人伍尔摩讲的：“我不会为我的国家杀人。我不会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国家、福利国家而杀人。我会因为卡特杀了某某人而杀掉卡特。为了家庭的恩怨

杀人，比为了爱国或喜爱哪种经济体制杀人理由更充分。我爱，我恨，都是我个人的事，我不会在什么人的国际战争之中扮演 59200 之 5(书中英国情报单位赋予伍尔摩的特派员编号)。”

米兰·昆德拉在谈欧洲现代小说时，把时间上推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说那时候小说是“人在无限大的土地之上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

## 好小说家应该有国籍吗?

当然，在现实之中小说家还是得有出生地点、有纳税义务对象，尽管不见得在意、喜欢、认同或效忠，但不容否认这很难完全逃离，在这层意义上，格林是英国人殆无疑义的；但是除此之外，小说家往往有一种更难以逃遁的隐藏国籍，可以完全无涉于象征国族的某个抽象名字、歌曲、旗帜乃至于意识形态，而就只是一方素朴的、有着生活现实质感的土地。对于和生活细节有千丝万缕联系需求、甚至倾向于在具象的人事时物之上书写的长篇小说而言，这一方土地和小说家本身的联系总是远远早于小说意念启动之时(没有哪个小说家是一生下来就打算或直接开始构思小说的)，因此，它和小说家的关系是浑然的、整体的，在理智选择之先且一先就是二三十年不可逆的时间，难以检视、难以在他日重建仿制，也就再难以替代。

长篇小说的书写因此总是农民式的书写，在同一方土地之上深耕密植，就像契诃夫和他的旧俄小城小镇与农村，巴尔扎克和他的封建巴黎，以及更清楚的，直接讲自己就是个农夫、只会在“一块邮

票大小土地上反复书写”的福克纳和他南北战争所在的美国南方原乡。

这方面，格林完全逆向行驶，他是个持续逃离家乡的人。

1934 年，也就是格林 30 岁之时，他徒步旅游了纳米比亚，据此写了《没有地图的旅行》这部游记，预告了他日后的出走生涯，往后，他的长篇小说便持续由行走的脚、凝视的眼睛和书写的手所联合完成：《权力与荣耀》是墨西哥，《问题的核心》是塞拉利昂，《沉静的美国人》是中南半岛，《哈瓦那特派员》是古巴，《喜剧演员》是海地，《麻风病人》是他自己所说“形状就像人的心”的非洲正中心的刚果，而晚期的《吉诃德阁下》则当然只能回转欧陆的西班牙云云。

这是“格林之国”之所由来，意思是格林小说足迹所及的全数土地的总和，由此组成一个虚拟国家，论这个国家的总面积，可能并不比殖民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之国的大英帝国小多少，但它不是通过欺骗、谈判、征战和杀戮所缔建起来，而是由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就凭着他的一身小说家本事，让这个国从伟大的文学地图之中熠熠浮现起来。

有关这个史无前例的小说之国，据了解格林自己并不见得领情，甚至，他还曾如此气急败坏地宣称：“我要高呼：‘这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中南半岛、墨西哥和塞拉利昂。我不但是小说家，还当过报社的特派员。我向你保证，躺在沟渠里的死小孩就是那副模样，尸体把运河的水都堵住了……’”

## 实体的道德景观

从格林这样几近是神经质的自卫之言中，我们并不难察觉，格林自己也很清楚，“格林之国”的说法既是赞誉，却也去除不掉某部分根深蒂固的深深疑惧，这疑惧一方面是文学技艺的，多少质疑着格林这样一地写过一地的奇怪小说书写方式；同时也是历史道德的，毕竟在西欧的书写者和格林足迹所及的这些“边缘国度”之间，一直更清晰浮现的毋宁是另一个非关小说的书写谱系，这是为期数百年时光之中由来自欧洲的行商、传教士、冒险家、军人和民族志者所连手完成的，深烙着帝国主义以我为准的罪恶印记。

我想，格林真正怕的是后者，所以他才如此刻意强调他的书写不谬。写实不见得是文学成就的判准，而且时至20世纪现代主义以降，甚至已不必然是小说书写的必要条件了，但在这里，强调写实，至少可以和数百年来以欧洲观点为中心，任意扭曲涂写其他异质社会的帝国主义书写传统划清界线。

只是，格林当然不会是在地者、农民式的写实，他终究是外来的人——这一点，写过格林评传的约翰·斯珀林讲得很好，他说：“格林描写的这些事实本身可能并不那么正确，但经过作者的挑选和组合，造成了所谓典型的‘格林风貌’。”“这也不单单是详细的描写(否则好的游记作家或新闻记者也写得出来)，而是像康拉德一样呈现出道德景观，描绘当地的情形和身历其境的人。”

道德景观，moral landscapes，我个人很喜欢这个说法，但我相信，格林远比康拉德担当得起如此说法。

外来者的书写,基本上总是一种宏观的、整体性的掌握,而疏漏于真实细节的理解和感同身受(因此,相当一部分所谓帝国主义的书写系源自于不了解的急躁和傲慢,而非全然心怀歹意),这方面,格林之于康拉德有着先天的优势——此一优势一方面来自于时间延迟的自然效应,格林出手的时间晚了几十年时光,意思是多出了几十年西欧之于这些遥远国度的累积理解;另一方面,这又是帝国霸权历经转移的几十年时光,让这些国家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于文化思维承受了不同的冲击而呈现着不同的轨迹变化,残酷的来说,这无疑提供了更丰硕的观看思省线索。

但仍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优势是格林自己。格林的位置远在康拉德左边,这让他一直比康拉德对当地的现实权力结构和道德景象有着更左翼的高度警觉和更左翼的持续关切,他笔下这些欧洲人也相对的身形更渺小、姿态更谦卑,他们不像康拉德那些带着家乡旅行、只停留在船上港边远远瞻望的航海欧洲人,而是背起行囊上岸,不回头探入内陆,和当地人一样的定居生活,一样承受那里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统治的全部风险、挫败乃至于最终不留情的迫害(较之于当地人唯一的可能优势只在于,他们终归拥有个不甚可靠的母国大使馆,让定居失败的最终逃逸尚成为可能)。因此,格林笔下这些国家是个个不同的,不同的统治者(墨西哥禁酒禁教的独裁政权、海地的杜瓦利埃医生和他戴墨镜的秘密警察唐唐·麻酷特、古巴卡斯特罗革命前的统治政府,或中南半岛上在地的外来的交错纵横势力等等),不同的客观历史线索,而不再是康拉德现代主义笔下,一个笼统存在的郁闷热带,一个欧洲人心灵的“异乡”,只负责扮演流浪

或寻道欧洲人命运之途上的某个试炼启示或救赎而已，甚或只是某个传说之中的、文学隐喻意味的暧昧国度，因着欧洲人的到来才浮现出地表，也因着欧洲人的再次转身离去而如海市蜃楼一般复归蒸发消失。

惟有在如此实存的国家和土地上头，才可能养活血肉真实的人，就像斯珀林跟着所指出的，格林小说中在地配角人物是可以脱离主角（欧洲人）而独立存在的，“格林之国把这个历史的转折点（意指殖民霸权转移）记录下来并且转变成神话，就像狄更斯笔下早期工业化的伦敦，或契诃夫笔下革命前的俄国。”

也就是说，landscapes，由高低起伏的山脉、河谷、丘陵、平野乃至于人为田园庄舍所建构起来的层叠地表总体图像，格林用的不是现代主义的文学布景搭建，而是用的真山真水，这样的道德景观，既是心志的，也是实体的，是文学剧场空间，也是历史真实空间，由此，格林完成了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已然疲惫老去的西欧小说再无力完成，或说再无力恢复的动人文学奇迹——格林把小说再次从昆德拉所说那种“只能低头瞪视自己灵魂”的窄迫凝视中解放出来，并放手把现代社会分工层叠、拦住人目光的烦人建物再次夷平为广阔大地，让久违的地平线再次重现，让失落的旅程再次整装而行，人的灵魂和私密命运不再必然隔离如孤岛，它仍然可能重新接回人类的总体历史之流，小说不再只能是弗洛伊德，只能是海德格尔，它还可以堂皇和列维－施特劳斯对话，和萨义德侃侃而谈，筋骨舒活，元气淋漓，好看得不得了。

在格林如此重现的广阔真实土地之上，就连现代小说失落已

久、早已让渡给新闻报导和通俗小说、好莱坞电影的说故事能力也一并回来了，重新生长——本雅明在1940年代黯然断言，说故事这项技艺久已失传，说故事的人，尤其是行商式走遍天涯地角携回远地故事的人早已消失，读格林的小说，让我们对此重生侥幸之心。

## 从老欧洲出走

狄更斯笔下早期工业化的伦敦？契诃夫笔下革命之前的俄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历史时间超过一百年的时光回溯，如果我们用小说书写意义的语言翻译出来，意思则成了，这是小说大叙事传统的寻回，而我们都晓得，那是人类历史上所曾经有过最辉煌且可能不会再有的小说世代，除了狄更斯和契诃夫，那时还曾经有过托尔斯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等等，都是最好的小说家，满满是今天排列出来仍最好看的小说。

从这个角度看，格林的出走，就不仅仅只是空间的挪移而已，让不同社会、文化、人种的大板块撞击出小说书写所需要的新火花；这极可能也该视为书写者的一趟奇特的时光之旅——格林一个一个重新涉过被欧洲人侵入、启动、纳入发展，并等于是绝望一场一场重演已知灾难的国家，这趟旅程系以这些历史发展时间不一致的挣扎中的社会一站一站排列起来。

1969 年在汉堡大学演讲中，格林说："小说家的工作是当魔鬼的辩护律师，为那些处在国法之外的人争取同情和相当的了解。"

格林一直是个实质的左派，是那种站权力反侧，大原则坚定不

移但实质生活细节充满同情，我个人最喜欢的真左派，但不真的如天真愚蠢美国人所相信的那样，是政治狭义的共产党徒（美国政府因此对格林甚为疑虑，很长一段时间不发他入境签证），他年轻念大学时是参加过共产党，但只待四个星期就跑了出来；另外，格林对宗教满满是省思、质疑、嘲讽乃至于并不留情的鞭打，尤其对人的罪恶和荒谬命运思索不休，但他仍一直是天主教徒，宁可分居并冒风险偷情而不脱离，也不以为有必要脱离——正如他通过《哈瓦那特派员》伍尔摩所讲的那番话，这些概念的、架空的，甚或只是标签意义的东西并不困扰他，困扰他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所回归的大叙事传统从来就是在实象和隐喻上书写，而不是抽象的语意上书写。

因此，有关格林何以一生浪迹天涯的猜测，那些左派政治理由的、罪恶驱赶宗教理由的，我想都太一厢情愿而且没太大必要，追根究底，格林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宗教者，而是个小说家，他的文学自觉和书写方式，较之于 20 世纪几乎已和职业身份完全重叠的小说家来看，的确是复杂许多，就像大叙事时代的小说书写者般延伸诸多的公共领域之中，但主体上，格林仍是个写小说的文学工作者。

因此，与其讲格林离开的是英国，不如说出走的是西欧——格林和大英帝国与女王陛下并没太大问题，事实上他还多少协助些情报收集工作以赚取经济待遇或仅仅是素朴的尽公民职责，当然，这也让他小说中经常有的情报工作书写栩栩如生，当代间谍小说大师勒卡雷因此对他推崇备至。

格林所出走的西欧，是文学乃至于文化意义的西欧，这个现代小说发生并绵密发展的原生地，几百年下来，像过度耕种的土地，已

不可避免地疲惫老去，而且还除魅殆尽，好的，坏的，神秘的，传统的，罪恶的，冲突的，信念的，理想的，什么都试过了，不新鲜了，也什么都拆穿了不再可信了——这是一块已然完成、已成定论到几近全然透明的小说土地，几乎所有的可能耕地已全数改建成博物馆和研究室，是坐而言的舒服养老地方，而不再是起而行的实践场域。

新的可耕沃土在拉丁美洲，在东欧，在亚洲和非洲，这些汉娜·阿伦特斥之为意识形态名词（非常有道理的讲法）、但一般仍沿用不疑的所谓“第三世界”，今天我们果真亲眼目睹还一直在生产好小说的地带，也恰恰是，没错，格林之国所涵盖的绝大部分国土。

## 当代卡珊德拉

但格林仍是个外来者，是个欧洲人。

我们把格林之国的行走和缔建说成是一趟小说的时光回溯之旅，当然是有漏洞的、可议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现代化进展并不真像比方说西欧发展理论（另一种被纳入帝国主义传统或称之为余孽的理论）所宣称的那样，会一成不变的重演、排队领圣餐般呈线性排列。固然，人们仍一直受制于大同小异的恶意、愚昧、贪婪、恐惧等等人性之恒常，这方面别说是才相隔百年的欧洲，就是万年之前的克鲁马侬人亦相去不远，然而，不同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结构、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长期黏着于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乃至于不同的历史故意和偶然机运在在都是有意义的，即便被欧洲人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蛮横地硬生生纳

入，它绝不可能乖巧整齐正如欧陆的昔日时光重现，也因此，格林的如此时光之旅，便处处是歧路的不知岔向何方和此路不通的断裂塌陷，途中的景象参差、破败、倾轧、诡谲、恐怖，满满是凶险，但也因此还可能有点希望。

更重要的是，格林并不真的是沉睡百年，因此毫无欧洲近百年这段历史记忆的人，在这些“新”土地之上，很多的发展迹象他似曾相识，甚至了然于胸，他记得陷阱在哪里，心知肚明致命的打击会从哪里悍然而来，美好的信念理想会在哪个阶段质变并被黯黑的力量所接收，人们诚挚纯洁的坚持和认真挣扎会在何时一切归于徒然——他和新土地的人们站在一起，休戚与共，内心并不无侥幸的希冀，但终究他记得最后的可能答案和收场。

年轻的土地，和一个孤独的苍老之人，这是格林之国小说终极困境，一种卡珊德拉困境千年之后的异地重现——卡珊德拉是古特洛伊王国的公主，太阳神阿波罗因恋慕她而给予她预见一切的能力，却因求爱不遂而咒诅她的预言无人肯信，于是，卡珊德拉知道特洛伊的最终命运，知道她眼前所有人的悲惨下场，她更知道巨大的木马不是战利品而是希腊联军的屠城诡计，但口干舌燥，世人闻此皆掉头。

## 永恒的异乡

阿根廷了不起的盲诗人博尔赫斯在他哈佛诺顿讲座的第六讲《诗人的信条》中温和地谈到，有些书得趁年轻的时候读，“因为如果

你已经到了发苍苍而视茫茫的年纪才来读这些书，这些书可能就不那么有趣了。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亵渎，如果我们想要享受波德莱尔或者爱伦·坡，我们就一定要年轻才可能得到，上了年纪才来读这些书的话就很难了，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要忍受很多事情，那时候我们就会有历史背景等等诸多考虑。”

当然，得趁年轻时做的事，不仅仅是读波德莱尔和爱伦·坡而已，还有恋爱、革命、理想，这些都要动用到信仰，而人年华老去率先带来的总是多疑，一种牵绊于太多经验细节的多疑，所以《圣经》中耶稣要亲口说：“你若不能回转小孩的样式，断不得进入天国。”

在格林苍老世故的小说中，少有干干净净的好人，因此有一种好人总特别醒目，古怪得几乎要从纸面跃出，那就是会让剧中苍老欧洲裔主人翁（这里我们可理解为就是格林自身）所欣羡甚至尊敬的、那种有着坚定简单信仰并据此孜孜矻矻工作的人，像《麻风病人》中的柯林医生，像《喜剧演员》中的马吉欧医生，或者来自美国（相对于欧洲的另一个年轻的国度），曾异想天开竞选过副总统，此番又想到海地推广素食的史密斯夫妇，但格林同时又忍不住一直口出讥讽之言，一种又温柔又懊恼自责的讥讽之言，伴随着老人爱怜却又以为不知死活的目光，心思极其复杂。这些心智意义上年轻的人，或许正是“格林之国”年轻土地的隐喻。

后来在暴力镇压中得其所哉死去的马吉欧医生，托人带给流亡多米尼加的主人翁布朗一封信：“如果你曾抛弃一个信仰，请不要抛弃所有的信仰。你必能找到一个信仰来取代你失去的信仰。”这样的话，在《沉静的美国人》中则出自于共产党员韩，他告诉主人翁英籍

记者弗勒:“人迟早得选定立场的,如果他还想当个人的话。”

很显然,格林是知道幸福何在的,但他却永远回不了头伸手去拿,就像老人不能再回转昔日的青春模样一般。而现实中更致命的极可能是,如果你哪一边都不想选也无法选时该怎么办?如果你现实人生的理解在告诉你答案总是以上皆非,就像你厌恶资本主义又不想加入共产党时怎么办?在这里,相当个人的获取幸福方式便成了一种更大的怯懦,更大的虚无。

这种老去不回头的年龄状态,于是可能不只体现于个人一己身上而已,而且也体现于人类的集体历史——尤其格林的小说,已然把个人的命运及其完成打开,和那个庞大又不随你意志而转的世界结结实实联结起来之后,这种“抛却记忆/操弄遗忘”的个人心理治疗方式、个人信仰归皈方式便失去了真实的救赎意义了。

百年之前,托尔斯泰写《复活》,书中幡然觉醒的地主涅赫柳多夫将人的重建最终解答,归于《圣经》的四大福音书,在那个犹可锁国,甚或关起庄园大门便可完整隔绝烦人世界侵扰的时间和地点,或许还差堪成立,但今天我们晓得,四大福音书的宗教性、道德性建议,完全解答不了政治学的问题,解答不了经济学的问题,也解答不了生态环保等等所有让人们持续受苦的问题。这个世界已变得太大、太真实,逼到人们眼前,因此,它反倒更像一出看不到结局、没有主要演员的荒谬剧,我们都只能是观众,最多上场两句台词就鞠躬下台的龙套,是滑稽而不是英雄悲剧的喜剧演员。

在格林全部的长篇之中,我个人最最喜欢的是,塞拉利昂那出把人一步步写入炼狱的《问题的核心》,以及海地如春梦一场的《喜

剧演员》,在《喜剧演员》的卷末,布朗读了马吉欧医生的信,他想的是:"我老早觉得自己非但没有去爱人的能力——许多人没有这个能力,连犯罪的能力也没有。我的世界没有高岗也无深渊——我看见自己在一个大平原上,行行复行行踯躅于无垠的平地上。有一度我曾有机会走出不同的人生方向,但是如今一切都太晚了。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耶稣会的神父曾经告诉我,考验信仰的方法里有一种是这样的:你必定随时随地地为它而死。马吉欧医生也这么想,但是琼斯是为了哪一种信仰而死的呢?"

没高岗没深渊,行于无垠的大平原之上,有基本地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老年期的标准地形,水流和缓不复切割之力——在格林之国每一个仍然年轻、满是峻岭深谷的土地上,格林总是提前看见这最终的图像。

就像昔日印度的一位老僧侣说的,当你老了,世界上不管哪里,你看起来总是异乡。